

K250.6

31

2:9

革命史资料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二·北京



A 716936

革命史资料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河北省滄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9月第一版·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₁₆，印张：7¹/₁₆，字数：168,400
印数：1—18,100册 定价：0.44元
统一书号：11224·100

目 录

谋略的较量

——回忆徐向前同志指挥晋中战役

.....乔锡章 (1)

阎锡山慌忙布防晋中——“我有办法对付他”

——调动敌军 初战告捷——再创战机 ——

运筹帷幄——驱敌入瓮——瓮中捉鳖——故人

重逢——徐总评论徐总

中共鄂豫边党艰苦年代创业纪实

.....李子健 (17)

回忆鄂豫皖边区的斗争.....梅少卿 (33)

鏖战大别山区

——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片断

.....陈 祥 (63)

红军歌

——《穷人歌》、《劝郎当红军》、

《送郎当红军》

..... (85)

在杭州国民党监狱里.....徐迈进 (89)

地下航道续记……………曹 达 (107)

朱剑帆和大革命以前的长沙周南女校

……………朱伯深遗作 (117)

谭祖尧、吴平地烈士殉难始末……龚灿滨 (142)

穿针引线

——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杨德华遗作 (148)

飞越长江 解放杭州……………金 冶 (164)

一枪未发 两战两捷……………陈阳春 (180)

综 合 资 料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 (上)

……………李国祥 张国琦 殷纯俊编写 (190)

谋略的较量

——回忆徐向前同志指挥晋中战役

乔锡章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徐向前同志指挥攻克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座孤城——临汾之后，又组织了晋中战役。当时，我先后在徐总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和第一兵团作战科任参谋，参加了他指挥的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在这几次战役中，徐总充分显露出军事战略家的指挥才能，他长于谋略，精于筹划，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敢于大胆出击，包歼大大优势于己的敌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无不为其指挥才能，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深深折服。

晋中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我军参战的部队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吕梁部队，太岳部队，太行部队共六万余人，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歼敌阎锡山部之赵承绶集团四个军，八个师，另两个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万余人，俘太原绥署副主任赵承绶以下八万余人，解放了晋中十四座县城，完全孤立并

包围了太原城。”（引自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

晋中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歼灭战范例。党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贺电曾指出：“……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阎锡山慌忙布防晋中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我军攻克临汾，阎锡山慌了手脚，急忙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布防“保卫”晋中，“固守”太原。阎锡山的作战方针是：固守点线，以攻为守；以一部兵力据守县城、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一副与我军周旋作战的架势^①。他认为，依照他现在的布防，即可“永保晋中，万无一失”，即使共军向晋中推进作战，以其“强大”野战军主力机动周旋作战，共军亦难立足。退一万步说，一旦晋中难保，太原城里有兵、有粮，城防坚固，又有军工基地自制武器弹药，还可求得蒋、美军援，太原城不啻金汤。徐向前指挥的“游击队”用土枪土炮能打下临汾，绝对攻不破太原！

阎锡山总结了几十年与我军作战的经验，说：共军多年来所以能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以免被对方

^① 为了“永保晋中”，“固守太原”，阎锡山将主力部队布防于太原以南的晋中地区。其具体部署：以第三十四军之四十四师、四十五师、七十三师驻灵石、介休、平遥；以第十九军之三十七师驻祁县；以第十九军之四十师及第八、第十总队（相当于师）驻榆次；以第三十三军之七十一师及第九总队驻太谷；以“亲训师”（即七十二师）、第三十三军之四十六师、第三十四军之四十九师和工兵师守备太原与晋源；以第十九军之六十八师驻守阳曲；以第四十三军之三十九师驻守忻县；以第四十三军之七十师驻汾阳、孝义；以第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驻交城、文水一带。

吃掉。为其部属学会同共军“打运动战”，他也归纳出十六字诀，叫做：“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他解释说：战机好，就出太原城打；见势不妙，跑回太原来，寻找时机，再出城去同共军打。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表示：“照阎主任（绶署主任）的指示干！”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后兼任“闪击兵团”司令）表示，要雪侯马之耻（高曾在晋南侯马被我太岳纵队生俘，后化装逃回太原），愿首当其冲。

阎锡山的“高见”得到赵承绶、高倬之等人的支持，遂令他的野战军中将总司令赵承绶、留用日寇战犯（原驻长治独立第十四旅团长）、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原泉福率领野战军开出太原，并统一指挥晋中地方保安团队，到晋中抢粮抓丁，伺机与我军决战；还以其第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各一部组成“闪击兵团”，起用高倬之为司令，实行机动作战。阎锡山专门预备了十八列火车，四百八十节车厢，供其野战军进出太原专用。

“我有办法对付他”

阎锡山这个山西土皇帝的老奸巨滑，在国民党中是很出名的。一次，毛泽东同志和徐总谈及同阎锡山作战问题时说：“阎锡山还有一定势力，他的军队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而且，阎锡山尽同你打滑头仗，不大好对付！”徐总当时回答：“阎锡山有多大个本事，我知道。我有办法对付他。”果然，一打交道，徐总就指挥部队连克运城、临汾。

作为一个军事家，徐总在指挥一个战役时，便开始考虑下一个战役了。还在扫清临汾城外围据点的时候，他就给军区领导同志写信，提出：“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行动计划，则拟向晋中作

战……兵力即可集八、十三纵，太岳八个团，晋绥吕梁八、九个团，兵力约在六万上下，打阎军与开展晋中局面，当较有把握。”

临汾战役后，中央军委同意徐总北进晋中的作战计划，任务是：保卫晋中麦收，断敌粮源，大量削弱阎军有生力量，缩小敌占区，创造打太原的条件。对于完成这个任务，徐总早已成竹在胸。他决定首先要突入晋中歼敌有生力量，这样既能歼灭敌人，又保卫了麦收，还可缩小敌占区，一箭三雕。

当时，我主力部队经过临汾战役之后，伤亡比较大，又十分疲劳，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但是，徐总认为，我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经过动员，再组织一次大的作战行动，还是可以的。俗话说，四月杏熟、五月麦黄。阳历六月，晋中平原上的小麦快要成熟，敌人蠢蠢欲动，准备出城抢粮，我军不能休整坐视啊！

打下临汾后，在徐总指挥作战的东堡头村，新华社晋南前线记者来访，与驻地群众座谈，召开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临汾旅”的命名大会，整整忙了几个白天。但一到晚上，徐总就“进入”晋中战役了，在窑洞里摊开晋中地区的敌情标图和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部队向北开进，徐总多病未愈的身体仍不十分好，他坐一段担架，步行一段，再打开随他多年的一把木制躺椅，靠着休息一会儿。徐总就这样“开进”了晋中地区。

徐总是这样分析阎军的：阎锡山提出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前八个字，其实际情况是一事无备，东风不吹。对后八个字，倒是要十分注意。不要以为他出动

那么多部队布防晋中，是要与我军决战。其实，他最怕损失实力。同时，他的部队是雇佣军，官兵怕死。所以，他出动的野战军，名曰打仗，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准备逃跑。因此，对于阎锡山的“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应该引起重视。运动战嘛，是打活仗，一定要会抓住战机，动作迅速，争取时间，以求于敌立足未稳之时歼灭之，不能轻易让敌人逃掉！

调动敌军 初战告捷

阎锡山深知，部队集中会饿死，分散又会被打死。要“永保晋中”，“固守太原”，就必须在晋中平原抢粮抓丁，而不能把铁路沿线和山西腹地的主力部队都撤回太原，这会给共军造成歼灭战的极有利条件。

徐总看准了这一点，决定“运动”敌人一下，于运动中歼敌。他命令吕梁部队攻击汾阳、孝义；太岳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正面推进，相机占领灵石。兵团主力则由晋中以东之太岳山区和白晋线，隐蔽向晋中开进。在这之前，徐总就已派出一支地方部队伪装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部队，开赴风陵渡征集船只，作出准备横渡黄河支援我西北战场的姿态；同时释放了一批俘虏，有意让他们传播这一消息，使敌人误以为我主力不会马上推进晋中。

六月十一日，我吕梁部队出现于汾阳、孝义以西之高阳镇地区。十二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县城。灵得很，敌人听从徐总的指挥了。十三日，阎锡山指派其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十三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向我高阳镇地区之吕梁部队分进向心合击。吕梁部队坚守阵地牵制敌人，阎锡山又派其“亲训”之七十二师

前来增援。这样一来，调动了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四十师、四十六师、七十一师、七十二师、七十三师。

为了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敌人回撤平遥、介休一线，晋中战役提前一天，于六月十八日发起。向晋中隐蔽开进的兵团主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突然攻破平遥以东山边敌各据点，突入晋中平原，向铁路线逼进。迫使围攻我高阳镇地区的“闪击兵团”所部三十四军仓皇回转平遥、介休方面应战。

我军原定于平遥、介休之间的汾河西岸地区，歼灭回撤的敌三十四军。六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增派配属给“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由“亲训师”少将师长陈震东率领，从介休向平遥方向开进，企图与三十四军会师平遥。当敌人行进至平遥县的曹村时，遭我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前后夹击，被赶压至汾河岸滩。经三个多小时激战，阎锡山亲自训练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全部就歼。

阎锡山对我军的战术原则，可以说是颇有研究的，大的集团军作战，部队之间总是紧紧靠拢，从不远离；一个师（团）的单独行动，亦采取多路纵队行进，而且纵队之间相隔很近，以防被我军割裂围歼。消灭“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之后，缴获敌人的《阵中日记》中有这样的话：自接到回师晋中介休、平遥地区的命令以后，遂令“各团以三个纵队齐头并进，纵队间隔二百至三百米，每半小时与上级联系一次，左右及直属中央纵队，皆以铁路为准。”敌人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也没能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狡猾的高倬之在回撤平遥、介休时，令其右路“亲训师”、“亲训炮兵团”转道介休北上，而他自己却率三十四军全部由汾

阳东渡汾河，直接跑回了平遥县城。我军围歼“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时，正值高倬之率部回窜途中，“亲训师”师长陈震东在报话机里苦苦哀求，呼救来援，高倬之只顾自己逃命，装聋作哑，没有理睬。后来，阎锡山再令高倬之出援，他才不得不由平遥出兵南援，但援兵还未开出平遥城，我军围歼“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的战斗已告胜利结束。

再 创 战 机

我军初战告捷。阎锡山遭我军当头一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于是蒋介石给阎锡山打气，要他“大胆与共军决战，保卫晋中”。阎锡山急令其太原绥署副主任兼山西野战军中将总司令赵承绶、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率领野战军主力，采取攻势，寻机与我军决战。六月二十三日，赵承绶、原泉福率十总队由榆次到太谷。二十五日，敌三十四军高倬之部由平遥北移，第三十三军沈瑞部由祁县南下接应，会合于洪善地区。二十六日晨，敌第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和十总队，向我洪善以东地区展开全线攻击。这时，徐总命令我十三纵队一部，以小部队积极阻击，保持与敌接触，迷惑敌人，诱引敌人，牵制敌第三十三军。待敌第三十四军进至洪善以东十余华里地区一线，我以十三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八纵队和吕梁部队向敌出击，分割围歼敌三十四军。

当时，实现这个作战计划，是完全有可能的。徐总认为，敌人集中主力部队与我触战，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把我们挤出晋中地区。但是，我们有引敌深入，分割歼敌主力一部的可能。他说：“日寇战犯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做不了他的主；

高倬之因有侯马被俘之耻，向阎锡山表示要与我决一死战，但内心十分胆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原泉福的‘特点’和高倬之的弱点，集中主力分割歼其一路。目标，还是高倬之的三十四军。”

我军各部队按作战预案行动之后，敌人也是越打越猜，对于我分割围歼敌军这一手，非常地惧怕，其第三十四军和第三十三军始终紧紧靠拢，而且白天与我触战，夜间即龟缩至铁路沿线据点，我无隙可乘；加之我军有的部队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还有的部队未按命令前来作战，致失战机，分割围歼敌三十四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战役第一阶段，我八纵和太岳部队围歼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我第十三纵队歼灭由平遥北移祁县之敌四十师大部。这样，除吕梁部队高阳镇阻击歼敌之外，总共歼敌一个整师、一个整团和一个师的大部。

运 筹 帷 幄

战役第一阶段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两次用计歼灭敌第三十四军都未能成功。徐总利用作战间隙，对前一阶段作战作了总结。然而，徐总当时考虑更多的是，寻找贻误战机的原因和教训。敌人总是一个集团军或者几个军（总队）靠拢一起，又不离开铁路线，不像是寻找时机与我决战，倒像是怕被分割围歼，随时准备撤回太原。看来敌人真是把阎锡山那个“十六字诀”中的“跑”字，当成了“上策”。

怎么对付阎锡山呢？几天来，徐总一直坐在作战室的军用地图前，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和集结位置。跟了徐总多年，我们都

知道这又是决战前夕了，走路轻手轻脚，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扰了他。只见他一边用铅笔比画来比画去，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时转过身子来，伸手拿几张纸，伏案计算着，分析着：敌人对我分割迂回包围等手段，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先歼其一部和尔后再歼其另一部的战术，已有提防；放敌人逃掉？实在可惜！那么，将面前之敌全部围而歼之呢？哪个地区作围歼战场更合适呢？

徐总从作战室出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他迎着晚风信步走到打麦场上，来到乘凉的参谋人员中间。

一次大战的前夕，敌我双方都在布防，这时没有枪炮声，四周非常寂静。徐总坐在石头碾子上，同我们一起啦呱聊天，说长道短。我们虽然嘴上同他聊着天，但心里都感到那种临战前的愉快的紧张。果然，他叫起参谋们，一同回到作战室，把敌情标图展开在桌案上。徐总指点着敌人的集结位置道：“这儿是——赵承绶、原泉福的集团军总部，这儿是——沈瑞部第三十三军，这儿是——高倬之部第三十四军，这儿还有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组成的第十总队。加起来，”他伸手取过写着密密麻麻阿拉伯数字的“帐单子”，看了一下上面画着的两条粗铅笔杠杠，说：“三万多，不到四万人。这么多的敌人麇集在一起，分割围而歼之显然不行，全部围而歼之呢？必须创造新的战场，调动敌人就范！”徐总沉思片刻，又看了看面前各类地图，一拳锤在桌案上：“就这么干！想溜，没那么容易！”

徐总这千钧一拳，开始了晋中战役的第二阶段——围歼敌军主力赵承绶集团的作战。

驱 敌 瓮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徐总以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决心抓住战机，再创歼灭敌军新战场。他分析了阎锡山的心理状态。认为他虽然在蒋介石的鼓动下，“大胆”与我军“决战”了，但吃了大亏，决不敢叫赵承绶指挥的野战军继续南移，离太原过远。假如我军主力继续北移，把歼灭敌军的战场放在太原以南，倒可以诱敌运动，有可能前截后逼，致赵承绶于死地。如果阎锡山仗着战场距太原较近，敢派守城部队出援，我可回师将其“吃掉”。这对以后攻取太原，不是又增加了有利条件？

歼敌战场设置在什么地方呢？徐总作过周密分析后，认为：榆次守敌第八总队、太谷九总队、徐沟冲锋枪大队，战斗力均弱。唯祁县守敌三十七师两个团加地方武装三千余人，有一定战斗力，如先行围攻全歼，那么，榆次、太谷、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形地带敌守备空虚，距铁路线又远，正是歼灭敌赵承绶集团军的好战场。徐总决心已定，下令所部行动，逼赵承绶集团军进入预定战场。

决心下定，决不动摇，这是徐总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他常常告诫指挥员：“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要深思熟虑。但不要把深思熟虑变为犹豫，各种条件具备以后，要英勇果敢，不顾一切。”又说：“指挥员要机断专行。打开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的部队也要狠。不要怕伤亡、消耗、疲劳。这种狠，为的是不失战机，减少将来的麻烦！”

当时有人提出，自临汾攻坚以来，部队就没有休整过，行军掉队的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后果……。徐总毫不动摇，

说：“我疲劳，敌人被拖着转来转去，更疲劳！我军是胜利之师，敌人连打败仗，比我军士气要低得多！坚决执行命令！部队现在苦一点，过几天就有‘肥肉’吃了！”

七月二日，太岳军区部队奉命昼夜兼程北进，协同太行军区部队破击铁路，炸毁桥梁，构筑工事，阻止敌人沿铁路线北逃回太原。同时，徐总限期第八纵队攻下祁县城后北进；又令第十三纵队监视敌三十四军行动，并阻其回援祁县。这样，前截后逼，即可迫使敌主力部队进入我预设战场。

七月三日，我太岳、太行军区部队，在榆次和太谷间的东阳镇至孟高村十多华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英勇的破击战，并在沿线各要地、要点连夜构筑工事，设置了阻击防线。同日晨，太岳军区部队炸毁了太谷以北五华里的董村铁桥。与此同时，我第八纵队围攻祁县城。敌人没有想到徐向前竟敢以“游击部队”拦路截道，见铁路被破坏，逃路被截断，慌了手脚，先后动用其第九总队、第三十三军主力第七十一师全部、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及第十总队，共九个团的兵力，山炮三十余门、轻重迫击炮四十余门和铁甲车三列，轮番猛攻。天上还有几架战斗机扫射助战。最后，赵承绶和他的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亦未能突破我各阻击防线。

董村阻击防线，是全歼敌军主力和晋中战役获胜的关键。徐总十分关注阻敌北逃的情况，他昼夜守在电话机旁。前沿指挥员汇报说，我董村前沿部队一个营与敌人搏斗，机枪全部打坏，炮弹、枪弹几乎全部打光，伤亡得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战斗。徐总鼓励说：“这个部队是好样的。一定要坚持守住，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不能放敌人跑掉！”最后又下了一道死命令：“剩下一

个人，也要把阵地守住。放跑了敌人，你得负全部责任！”

参加董村阻击战的部队，的确打得英勇顽强，终于坚持堵住了敌人的逃路，对后来全部围歼赵承绶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后，召开庆功大会时，徐总亲自给这个部队贺功。

敌人连续几天猛攻我董村防线不破，不得不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掉进了徐总布好的陷阱。七月六日夜，敌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以及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离开铁路，开始向东北方向退逃。徐总早已准备好一支尾敌追击、截敌退路的突击力量——第十三纵队加第八纵队一个旅，他们尾敌、超越敌军，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和尧城镇以东，切断了敌人由徐沟北逃太原的另一条退路。我原堵击敌军之太岳、太行军区部队向西紧逼，与第十三纵队堵截部队接通。至此，敌赵承绶集团被我包围于预设的战场。第八纵队的主力于攻克祁县的第二天，兼程北上投入围歼战斗。吕梁部队东渡汾河，打援堵溃。这样，阎锡山的野战军——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野战集团军，被徐总指挥的部队团团包围于大常镇、小常村、西范、南庄一带，东西长约二十余华里，南北不足十华里的狭小地区之内，待歼！

瓮 中 捉 鳖

徐总率领六万人马，进入晋中作战近一个月来，寻找战机，连续作战，终于抓住和包围了阎锡山的野战军主力赵承绶集团军。这时，他将兵团指挥部设在距被包围之敌十多华里的粮庄，指挥这个围歼战。

晋中平原上的村庄比较大，人口密集，房屋多为砖瓦建筑，比较坚固，村落周围还有围墙。敌人被包围后，马上把砖瓦房舍

挖通枪眼，修改成堡垒，村子的周围也迅速构筑了野战防御工事。阎军是以善打防御战出名的。我军兵力少，火力弱。徐总指示，组织村落阵地攻坚战，集中兵力火力，像包饺子一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攻歼敌军。先以第十三纵队主力攻击大常镇之三十四军；第八纵队主力攻击南庄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最后攻歼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大常镇、南庄为我攻占，残敌退缩于紧靠小常村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的西范村。战斗中，敌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又一次化装逃回太原。日寇战犯、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原泉福被击毙，他死前对参谋主任杨诚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

接着，徐总指挥最后消灭敌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的围歼战。此时，阎锡山以其暂编第四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共四个团，组成所谓“南援兵团”，由他的参谋长郭宗汾率领，出动接应赵承绶集团残部突围。情况异常紧张，但是徐总风趣地说：“阎锡山又给我们送来四个团。让咱们打援部队先把郭宗汾的退路截断包围起来。等活捉赵承绶之后，再来吃掉他送到嘴上的四个团！”

围歼赵承绶集团残部的战斗进入关键时刻。徐总只带两名参谋和十多名警卫人员，来到距敌人二、三里地的一个村子里指挥作战。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接到部队报告后，马上派部队把徐总接到靠后一点的村庄。

“敌人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徐总一听，高兴地笑了：“放他们出来，在野外更好打！原准备由小常村以西攻击的部队，马上发起攻击，乘敌人屁股后面空虚，攻进村子里，把敌人的集团军总部搞掉，突出村外的敌人失去指挥，不就乱了套？！”

七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钟，我军攻入了小常村，占领了敌人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军部，蹲缩在避弹坑里的敌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军长沈瑞和军参谋长曹近谦等，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一活捉。突出村外失去指挥的敌人，像一群昏了头的鸭子，被赶到一片无地形、地物可资隐蔽的田野内，赶过来，扑过去，最后被全部歼灭。阎军由郭宗汾率领的所谓“南援兵团”，见势不妙，匆忙逃窜。

故 人 重 逢

赵承绶是阎锡山的一员老将，又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的老乡。所以，阎锡山非常器重他，把指挥晋中作战的兵权交给了他。但是，历史毫不留情，常常捉弄人。赵承绶恰恰又是徐总中学时代的同学，徐总对赵承绶颇为了解，评价他“昏聩无能”。

赵承绶被我军活捉时，穿着佩中将军衔的黄呢子军服。当几个解放军战士押着他来见徐总时，赵承绶把大沿帽拿在手里，低着头，眼皮也不敢抬一下。徐总请他坐下，问道：“还认识我吗？”赵承绶点了点头，低声回答：“认识。”

到底是故人，徐总诚恳坦率地说：“看你，为阎锡山打了这么多年，一点也不看看形势。太原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你还不选择自己的道路？我的战士可不认识你这个赵司令啊！伤亡了多可惜。”

徐总又问道：“这次交战，你看我的战略战术、兵力布置，有什么缺陷？”

“战败之人，能看出什么缺陷来。能看出来，还能落到这一步？！”赵承绶苦笑着说。

谈了一会儿，徐总吩咐参谋：“找找赵承绶的老婆，看打死了没

有？让他们团圆团圆。”

在歼灭阎军赵承绶野战集团接近尾声的时候，防守晋中各县城、要点之阎锡山军，正如徐总早已料到的，纷纷弃城（点）向太原方向逃窜。徐总又组织部队追歼溃散之敌。有的部队行动稍有迟疑，徐总就亲切地教训指挥员：“蠢人！溃散之敌，犹如惊弓之鸟，哪还有战斗力？还不快追，追得越快，捉俘虏越多！”

战役打胜了，徐总让警卫员从他屋里抱来几个大西瓜，和参谋人员、工作人员一块吃。又把管理科长找来，叫给大家加菜、添酒、会餐。会餐时，他一个桌一个桌地向大家祝胜利酒，说：“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啊！”

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天黑下来了，他对周士第副司令员说：“晋中这最后的追击战，你来指挥吧，我要去睡个觉了！”^①

但是，徐总的屋子里，传出来的不是鼾声，而是吱呀吱呀的二胡声。说实话，他拉二胡的水平，实在使人无法恭维，不过，这一次却使热泪一下子涌上了同志们的眼眶。

徐总评论徐总

晋中战役，以歼灭阎锡山十万余人、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党中央、华北局，各个野战军，还有华北各行政区域的党、政、人民团体的贺电，雪片似的飞来！党中央发来的贺电指

^① 周士第同志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晋中战役发起时，徐总派他去军委请示关于第一兵团的组织和晋中战役计划问题。战役后期，周士第同志回到兵团指挥部。

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阎敌一个集团军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四座县城的伟大胜利。”

徐总这时候在想什么呢？他召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前委开扩大会议，总结晋中战役。徐总作了战役总结报告，他是怎样评价自己工作的呢？

晋中战役以六万兵力围歼敌十万兵力，创造了大兵团作战以少胜多全歼敌军的范例。对于这样辉煌的胜利，徐总是怎样说的呢？——“不要因此而骄傲。”

徐总运筹帷幄，几设巧计，终于把敌主力逼进我指定地点，围而歼之。对于这种连身经百战的统帅也要称道的军事韬略，徐总是怎样说的呢？——“战役指导上，没有犯严重错误。”

首战告捷，全歼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对于一个军事家，一支军队，一个战役来说，首战是绝对重要的，它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及以后的部署。对于晋中战役的首战歼敌，徐总是怎样说的呢？——“歼敌三十四军计划失败。”因为原来准备在平遥、介休之间歼灭三十四军，但是三十四军没到介休来。而“亲训师”到了介休。虽然歼灭“亲训师”和歼灭三十四军在战略上意义是一样的，但徐总不以歼灭“亲训师”的胜利掩盖未捕捉住三十四军的失算，也不论最后终于歼灭了三十四军，而说“首战歼敌三十四军计划失败。”

徐总一生都是这样谦虚，对自己严格得近于苛刻。这是同他的军事天才一样令人难忘，令人敬佩的。

中共鄂豫边党艰苦年代创业纪实

(1935—1938)

李 子 健

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是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的转折时期。鄂豫边地区的革命运动，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时代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背 景 情 况

河南地区位踞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民性强悍，富于反抗性。民初，“杆”、“股”蜂起，追随孙中山的樊钟秀建国豫军也起源于此。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散落在民间的枪枝很多。七七事变时，鄂豫边省委所领导的地区，民间就有枪枝四十余万枝（见当时鄂豫边省委抗战宣传提纲）。这些武装多数窃据在地主豪绅手中，还有一部分流散在下层，或在流氓、土匪之手。鄂豫边的天灾人祸特别严重，连年水、旱、蝗灾，再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抓丁派款、逼租逼债……压得劳动群众喘不过气来，卖妻鬻子，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民间广泛流传着“刮民党万税”以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丁免款”的民

谣，革命基础很好。同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节节深入，民族危亡到了严重地步，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一九三五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河南开封也同时发生了学生卧轨请愿事件，地方上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加上我党地下党员的工作，反日爱国运动开始同农村的抗租、抗捐税、抗抓丁等斗争有了结合。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白区党也遭到严重破坏，鄂豫边党同上级党（中央）和兄弟地区党都失掉了联系。

鄂豫边党委恢复发展过程

鄂豫边党是指河南南阳地区党与湖北襄（樊）枣（阳）地区党合并的简称——中共鄂豫边特委，它与中共河南省委是平行的，都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同时两个党委也有若干横的关系）。这两个地区在一九三四年前后都曾举行过大小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地下党委也曾多次遭到破坏，同中央失掉了关系^①。

原在鄂边与豫南活动的同志通过曾有过的横的关系，于一九三五至三六年间，取得联系，成立了新的省一级党委，沿用旧名称“鄂豫边省委”，开始领导的地区党包括原鄂豫边（实际只南阳

^① 据一九三五年曾在中央交通局工作过的李嘉森同志回忆，一九三四年大破坏后，除福建省委、厦门市委和北方局——河北省委与中央有关系外，其他省、市委都被破坏，同中央失掉关系。另据王国华同志回忆稿，一九三四年秋，河南省委书记王健被捕叛变，河南地下党遭到破坏，鄂豫边是通过河南同中央发生关系的，而认识鄂豫边负责同志的交通，是一个河南同志，他在中途被特务杀掉，所以鄂豫边没有遭到破坏。又据肖章同志了解，一九三四年秋冬，上海至河南省委交通小马（根据李嘉森同志回忆叫“黑脸王”）被捕叛变，回河南捕去省委书记（王健？），该书记立即叛变，并乘党内未察觉之机，派特务同中央联系，要干部，混进我上海地下组织甚至苏区受训，之后打入我党组织进行破坏。小邓（一非）同志就是因中央受骗被带到河南作团省委书记的，到后即被捕（邓出狱后参加创建红军活动）。以上情况久后察觉，但我党已吃了大亏。

地区)和豫南地区的党组织。一九三六年初,在豫中地区活动的几位同志来到鄂豫边,从而把豫中的叶、午等县区党组织也归纳到鄂豫边省委。一九三六年十月鄂豫边省委同北方局建立了关系后,豫东的西华、扶沟等县,以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市党组织也逐步与鄂豫边省委取得联络,不久新的河南省委就在开封成立了。现将上述这个阶段鄂豫边省委是怎样形成的,简述如下:

河南省委: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间,刚恢复的省委机关设在许昌——后迁郑州,省委书记是李亚英(即吕文远)同志。我接触过的有张本(刘晋)、杨宗白(三三年牺牲)同志以及担负省军委的张存实(当时也是中央军委成员,河北省蠡县人)同志等。那时我由叶县调省委作短时间巡视员,即调任中共中央(在上海)至河南省委的交通员,旋即任中央交通局北方各省、市委、苏区同中央交通联络工作的领导人。同时,叶县的兰德修、陈继尧等同志,在张存实领导的兵运暴动失败后亦陆续调出叶县。省委下是中心县委,豫中中心县委设在许昌,豫南中心县委设在驻马店,确山……。当时叶县、午阳、临颍、许昌、西华等县属豫中,确山、正阳、新蔡、上蔡等县属豫南。

一九三三年中央调干、中央苏区召开“二苏”大会,河南干部代表有王国华、杨子奇、段永健、王保良、王春义(外号大头)、兰培杰、郑××等,鄂豫边代表有张星江,干部有郝久亨(河北口音,知识分子,跛脚,据说是鄂豫边特委负责人),记得仿佛还有张旺午等,都是经过上海中央交通局李子健同志(即作者本人)接洽转送的。

经过上述工作,有关同志得以认识或互相了解。一九三五年底至三六年初,在失掉上级党关系的情况下,新的鄂豫边省委就

是通过这些曾有过的横的关系，重新组合而形成的。具体情况是：当时失掉关系而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有的自己组成了领导机关（如原鄂豫边的童仲玉、张旺午等组成“鄂豫边工作委员会”，叶县的段永健、李子健、陈继尧、兰德修等组成“叶县工作委员会”等等），他们都把寻找党中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一九三五年间，原鄂豫边地区刚从江西回来的张星江同志、坚持地下斗争的童仲玉、张旺午等同志同豫南地区刚从江西回来的王国华同志、坚持地下斗争的周骏鸣同志等在确山（地下党员徐仲和同志处）取得联系，不久成立了新的省委领导机关，沿用旧名称“中共鄂豫边省委”。它领导的县区党包括原鄂豫边（实际是南阳地区）和豫南的县区。在此期间豫中地区的叶县县委（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刚从江西回来的段永健、上海回来的李子健、陈继尧、从郑州回来的兰德修等）也在豫南的确山、明港、信阳及鄂豫皖西边沿找党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初，找到了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从而把豫中地区的叶县、午阳等县区的党组织也归纳到鄂豫边省委领导之下。李子健、段永健二人留省委领导游击队。兰德修回叶县，陈继尧留遂平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工作。魏秀亭以开“四方商店”为掩护，建立一个联络点。由于当时着重保密，此站只有李子健等少数同志知道，以后一段时间从鄂豫边东沿进根据地的多批青年和干部，都是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站进来的。一九三六年十月，鄂豫边省委派李子健去北平建立同中共北方局关系（情况详后）以后，李又把西华、扶沟等县的关系同鄂豫边联系起来（当时王其梅同志等在西华，不久河南省委成立，该地区党组织交河南省委），接着同开封、洛阳等市也有了联系。直到新的河南省委成立。

新的鄂豫边省委成立后，张星江任书记、童仲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部长，周骏鸣任军事部长，陈香斋、张旺午、邓一非等均为委员，张星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三月打平市镇牺牲后，童仲玉、王国华前后继任书记、组织部长。邓一非任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夏以后我任宣传部长。接替我宣传部长职务的是曹荻秋同志，这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事，当时危拱之接任组织部长（邓一非、陈香斋都是一九三七年秋牺牲的，前者是打邓庄铺时，后者是解放竹沟时牺牲的）。

同北方局建立关系之后，一九三七年麦子快熟时北方局派刘子厚同志来（化名马宏图，到后改名马致远）。不久中央派胡龙奎带通讯员一人来（在地方工作不久即回麻城老家，只通讯员一人回来，当时彭雪枫同志已来竹沟，该通讯员向彭和我汇报了胡回家结了婚不愿回来的情况）。同时经中央关系来的，还有王盛荣同赵××夫妇、邹坚、谢邦治等几个同志（危拱之、陈少敏、曹荻秋等同志都是三八年来的，就不详述了）。这时，刘子厚任统战部长、王盛荣任省委副书记（王国华为书记），赵××（王盛荣爱人）担任妇女工作，邹坚、谢邦治等搞了一段时间青年工作。一九三七年冬，省委派刘子厚同志去开封同张觞谈判（详后）时，我是内部联络人（不断把谈判情况汇报河南省委朱理治，并听取其指示）。在开封经过河南省委把娄光琦、郭以青等几位同志先后送到了鄂豫边。刘子厚、李子健在开封接洽了范文澜、王兰西、稽文甫（他们均是“河大”教授）以及吴芝圃等（范文澜后不久也来过竹沟。刘贯一也是那时来的，是否在开封时接洽过已记不清了）。娄光琦来后同原在地方工作的江宗仁等同志前后搞民运工作。文敏生是一九三七年我经确山地下党员田永禄介绍，在驻

马店动员吸收来游击队的同志，后成为党的骨干。

新的河南省委成立时，朱理治为书记、刘子久、林凯都是主要成员。不久林凯、刘子久都来过鄂豫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林凯同周骏鸣带队赴苏皖前线）。

大批青年拥向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是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这批青年对开拓根据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现仅以改编新四军之前，一九三七年间的能记起者为例。从开封来的有魏烽、胡炜、刘焯、李辉、范西曼、王典训、高维进等，从洛阳来的有刘勃、王水生等，从叶县、午阳来的有张联方、陈堃台、罗长征、李庭耀等，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多数分发前线，部分留在地方作民运等工作。这是新四军教导队在彭雪枫同志来到之前的首批学员。

建立武装 巩固根据地

鄂豫边新省委组成后，中心任务和斗争口号是夺取地主豪绅武装来武装自己，开展游击运动。当时虽同中央失掉联系，但同志们都还记得，在反“围剿”战争中，各个苏区都曾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以支援红军。在江西苏区学习过的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都曾亲身聆受过朱总司令的有关开展游击运动的指示。

前面说过，河南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民性强悍，富于反抗性。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之后，留下的部队组成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这支部队多在平汉铁路以东的鄂豫皖地区活动。因此，国民党对平汉路南段铁路以西的统治不太强，只在沿平汉线的城镇——驻马店、遂平、确山、明港等地驻有正规军新五师、黄杰的第十师和保安队、保安团。广大农村，乡、镇则是保、甲和民团组织，

它们的统治作用主要是派款、派丁、催租、催捐税和清剿“盗匪”，当时国民党除县城大镇设“党部”、“政府衙门”以对付我们外，未发现有专门对付我们的特务组织，而“党部”、“衙门”的人又不敢下乡，多坐在城镇发号施令。这对我们建立武装比较有利。按省委指示，同志们首先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准备暴动。

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十日，省委书记张星江亲自带领周骏鸣、王春义（即王国富）、汪心泰、康春、汪××（红二十五军留在地方的病号）、吴恒山等七位同志，用长短枪三枝，在信阳的吴家尖山小石岭村打死一个保长，缴了一枝三八式步枪举行起义，打响了鄂豫边地区人民战争的第一枪。队伍诞生后，没有上级关系也没有老根据地和大军作后盾，纯是“自力更生”、“独立作战”，但是也没有外来的这样那样不符合实际的思潮干扰。队伍虽小，机动灵活，又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有利的地理条件，特别是领导同志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团结战斗的品格和符合实际的政策，所以不断发展和壮大。队伍命名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以后群众热爱我们，称之为“咱的队伍”，社会上也有叫“老共”的。

游击区包括确山、泌阳、桐柏、唐河、遂平……等县的边缘地区，是个“三不管”地带。

除机动灵活外，我们的政策是广交朋友。当时不知道“统一战线”这个名词，但我们很注意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分子，不提“打土豪分田地”，只提打“坏货”的口号。经费来源主要是拉土豪罚款，群众叫“经济案子”，就是把民愤不大，出了钱也不致倾家荡产的地富分子捉来作人质，令其为队伍提供经费。我

们对捉来的人既不歧视、虐待，也不污辱人格，生活上和我们一样，连理发剃头都是我们同志替他作的，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晓以我党的主张政策。因此，受罚款之人回去后没有反对我们的，而且有人以后找来参加队伍，成为党的干部，还有为革命牺牲的。

对于当地士绅、土匪和保、甲长、联保主任等，凡是不坚决反共，群众不痛恨，愿意与我们交往，不向敌人告密的都不打倒，而是交朋友讲联合。对于土匪，有的同志打进去做“匪运工作”（如陈香斋、邓一非等都曾和土匪拜把子，以便做工作），有的同志则设法同他们头目建立配合作战关系。他们的下层多是善良的农民被压迫剥削挺而走险入了伙的，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容易争取，只是头头复杂，但是他们只要同我们游击队有了交往，就感到身价提高许多，炫耀自己已有了“老共”的朋友，就再不被人轻视了。对他们一般采取“大股拉、小股打”。

“讲朋友者”拉，不听招呼者打。这样，一般土匪都听招呼了，对我有群众组织的地区不骚扰了。如果他们拉到“肉票”或者侵占了哪块地方，只要我们派人或写张条子招呼一声，他们立即释放、立即撤走。这样的政策实行以来，有群众组织（农会）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匪患了。加上其他有效政策，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纷纷要求我们派人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一九三七年八月某日，泌阳地区××寨请我去组织农会，是日下午群众报告有大股土匪从东南来，前头队伍已逼近寨围，情况紧急。我登上城头理直气壮地喊他们派人来谈判，一个自称“司令”名周寿臣的骑马带着马弁来到城下，我说：“这是老共的地方，讲朋友的，绕道而行……。”他一听是“老共”，连连作揖、道歉，一声令下，大队

人马绕道而去没有进寨。这样群众逾益相信我们的力量，因此，根据地区的许多“空白点”很快就消灭了，游击队尚未去过的地方，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了。

根据地建设很顺利，军事上却受到了挫折。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牺牲，游击队队长王春义同志也牺牲了，省委委员张旺午等十一人被捕。敌人还从张星江同志的遗物上发现了我们队伍的政治面目。这些挫折不但进一步激发了同志们的斗志，而且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了。

这支红军游击队，在西安事变后，改名为“豫南抗日军独立大队”，公开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群众仍然叫我们“红军”或“咱的队伍”。同北方局建立关系后，上级逐步派来了一些干部，一批批青年拥向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三七年冬初，抗日游击队解放了确山竹沟镇，省委机关设在这里，局面开始打开了。彭雪枫同志来竹沟之前，队伍发展到二百余人，一九三八年初，安（新祥）段（永祥）团股匪盘踞竹沟城西×庄一带，我军对股匪突然袭击，缴了他们的械。安、段等头目，发给路费遣返回籍，其部下群众都是农民，彭雪枫、王国华、王盛荣、刘子厚、李子健等轮流讲了话，号召他们参加抗日军，保家卫国；新来的知识分子，陆象山等分别给他们上了课。雪枫同志带来的军事干部，又对他们进行了军事训练。之后将这些人编入我们队伍，我们队伍就有一千多人了，编成三个营一个手枪队，番号“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由周骏鸣、林凯同志带领奔赴安徽抗日前线。

同上级党建立联系

一九三六年九月间，我到确山县检查发动群众支援队伍

的工作，见到县城的地下党员田永禄。田说地下党员徐仲和的弟弟徐子荣同志，刚从北平出狱，回到确山付楼村，他同北方局有关系。我们正在积极找党的关系，闻知此讯，喜出望外，随即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派我完成这一任务。我带着徐子荣的介绍信，到北平沙滩北椅子胡同“大学公寓”，找见了“中国大学”学生李锐（李九龄），我住在地下党员王××（泌阳人，王友梅的侄子，他爱人姓韩）的家里。第二天北方局派刘子久同志来，接上了关系。我把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发展，特别是在失掉关系情况下，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等向北方局作了口头汇报，并写了队伍诞生、发展情况简报。北方局对我们的做法评价很高，认为：虽是摸索着干的，但执行的政策基本上符合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精神。我在北平学习了文件、政策，还同李锐、王××、韩××、郭以青，仿佛还有李建中（即刘子厚）等一批同志接触联系（其中多数是党员，还有“民先”队员），从而了解到当时北平学生运动，以及山西酝酿牺盟会等情况。经我口述，李锐笔记，写了一篇描写游击队的长诗《铁流》，笔名“石龄”，刊登在北平某文艺杂志上。不久我即带着北方局的指示和文件（记得有“八一宣言”和刊有温华笔名文章的北方局刊物《火线》，该刊还登有《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篇文章，后知它是刘少奇同志写的）。回到鄂豫边，同志们得知找到了党的关系，象发生了大喜庆事件，奔走相告，莫不欢欣鼓舞，活跃已极。

我第二次去北方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到达北平的。时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夕，恐在北平遇到不测，北方局通知刘子久同我一起前去天津谈工作。到天津会见了北方局的同志，十二月十二日看到了《益世报》号外，题目是“张学良劫持

蒋委员长”，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革命形势急剧转入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到更重要地位，强调开展上层的、下层的、上下层的统一战线。有一次在“宁园”谈话，“胡服”同志（后知就是少奇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为避免日寇乘机而入，造成民族更大灾难，我党主张放掉蒋介石。这次带回的《火线》上刊有“温华”写的一篇号召全国同胞团结抗日的文章和上次我书面汇报游击队情况的简报。

第三次我带着田永禄去北方局，住在天津“皇后大戏院”隔壁的公寓里。利用工余，我以“胡蝉”笔名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在河南抓派虐待壮丁暴政的文章，登在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新生周刊》的改名）上。该刊搞了一次“你赞成谁当外交部长”的民意测验，我和田各投周恩来同志一票，后在测验统计上，恩来同志仅获两票，就是指此。（在蒋统区，投我党领袖票是有风险的）。这次，我们通过北方局同党中央建立了关系。本来叫田永禄当交通员，田后来有其他任务，改变为别的同志（记得叫王治国）。一九三七年春，中央在延安开有关白区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回到延安。是年春鄂豫边省委派周骏鸣、邓一非二同志去北方局，通过北方局关系，周骏鸣同志去延安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了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如朱总）的指示，从此建立了鄂豫边省委同党中央的关系。

鄂豫边党的统战工作

上述红军游击队执行的基本符合中央统一战线的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北方局和党中央较高的评价。但当时省委领导下的非游击区，还普遍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主要是

前者)，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国民党、地主豪绅”、“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等等斗争口号。

同北方局接上关系后，得到新的指示，对非游击区的工作也明确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上层的、下层的、上下层的民族统一战线”，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向他们提出“为着抗日救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争取他们抗日。

“双十二”之后，为广泛开展局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的统战政策在非游击区发挥了威力。如叶县的国民兵团司令崔冠卿，经过地下党同志崔慎三、陈继尧以及段雨蝉等做工作，屡次请我们派人帮助，组织救国团体和民间武装。以后我们派杨子英、杨战韬等同志把“官办的”，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国民兵团”团长就是地下党员崔慎三担任。北方局派在西华地区工作的王其梅同志，把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都统到我们方面来了，打下了豫东广泛的群众工作基础。西安事变后广大青年纷纷参加革命队伍，北方青年有的去山西参加牺盟会，有的去延安，还有许多南方青年去延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未成立之前，这些人多是经过竹沟转去的，竹沟的名声大振。“小延安”之称自此始。

现回顾几桩较大的统战事件：

1、一九三七年春，在西安事变捉过蒋介石的东北军周福成师被蒋帮排斥、分化瓦解，“调防”泌阳，在蒋系河南绥署主任刘峙的监督下进攻我们。蒋帮的阴谋是“以毒攻毒”、“一箭双雕”。该师在王店、高邑、马谷田一线驻扎一个主力团，团长王理环（东北辽阳人）。团部和第一营驻高邑，二营驻马谷

田，三营驻王店，营长吕伟绩（东北人）。他们初来不知道此地有红军，一天吕营一排人在乡下抓到我们的群众马××（张楼村党员马长富之弟），在酷打之下，叫出了红军的“牌子”，他们一听不是匪而是红军，立即松绑，并受到营长吕伟绩的款待，吕向马××发誓同我军曾是、今后还是朋友，之后说：“你回去请你们领导人来谈判，我们合作……。”马回来将此情况向省委李子健同志作了汇报，李当即与王国华、童仲玉等领导同志分析了东北军的处境，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与我军的联合及事变后受蒋帮分化、宰割等情况（这些情况早在中央指示中就十分清楚了），决定同他们谈判、联合抗日。这时东北军已派代表田作舟来到张楼村马长富同志家，省委派我前往完成此一任务。我在马家牛屋同田作舟谈了半天一宿，摸了些东北军反蒋抗日思想情况和从师部起上下级官兵的态度之后，同田作舟一起经过吕伟绩营，来到高邑团部，受到王理环及师部一个参议、团部官兵的欢迎。谈判达成的协议大体是：他们向我们不断提供情报，协力对付刘峙；一方受攻击，对方援助反击；必要时他们支援我军枪弹；东北军不侵犯群众利益；红军不封山，山货柴草上市，公买公卖。中午他们设酒筵招待，下午王理环要我打牌游戏，我推说不会，就在院子里同他们的官兵交谈，听他们讲西安捉蒋、逼蒋抗日的故事。

东北军官兵闻知与我军发生统战关系，莫不喜出望外，以此炫耀自己，甚至在发现我群众秘密散发传单时，把传单抢到手，一直散发和张贴到泌阳城内。他们说：“怕什么？我们也是红军。”地方上反动分子惶惶不安。东北军与我军发生统战关系之事，很快被刘峙知道了，他们立即来电“申斥”了周福成，并责令他们向我军进剿，王理环得到来自师部的这些情报立即告知

我们，并建议我们隐蔽起来。游击队即时转移到信阳地区，只留工作人员在地方。后三营长吕伟绩叛变了，在地方抓了一些人。张楼王庄一带抓的人，有的当场放掉，有的送到师部几天也释放了。据放回来的青年赵××、郭××说，师部一些高级军官，骂王理环“不作好事”，其实是错怪了王，叛变的只不过是吕伟绩个别人而已。据说王理环、田作舟后来逃到我方参加了革命，而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高级军官名单上有吕伟绩的名字，可见吕是被蒋帮十分赏识的。

2、一九三七年秋末，河南受蒋帮排斥的地方实力派张舫，同我们一度发生统战关系。他的参议谷正方（原来是共产党员，同周骏鸣同志一起工作过）给周来了一封信，联系同我军谈判，希望合作发展实力抗日。我们根据中央统战指示精神，象山西牺盟会利用阎锡山那样，利用他的名义开展革命工作，省委决定派刘子厚同志前往开封同张舫、肖洒谈判，同时派我作内部联系。顺利达成协议后，拨来军饷一千余元、军装数百套，并答应继续发给枪枝弹药，要求我队以他的名义扩大队伍。就在此时，在游击队工作的张明河同志未经省委研究通过，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我游击队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当时恩来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同张舫发生统战关系，就把我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了。当周副主席知道同张舫这个谈判关系后，派人向张说明按原协议不变时，张舫说：军政部已下令，你们改新四军，就不能再变了。

3、一九三七年底国民党信阳行署，集合了几县保安队于游击区的边沿邢集镇，声称与我们谈判。我们看来势不对，他们不是来谈判而是大有阴谋，天黑我们就把队伍转移了，留文敏生同

志同他们谈，结果什么协议也未达成，他们的阴谋也自然落了空，只好滚开。

以上事件都发生在“双十二”之后，彭雪枫同志来竹沟之前。一九三八年初彭雪枫同志带一批干部来竹沟之后，形势又向前发展一步，经过雪枫同志的领导和工作，统战关系更加广泛了，如四川的邓锡侯赠过枪枝、军用物资，鲁西北专员范祝先、豫东的魏凤楼和胡晓初、叶县的崔冠卿等都是这时和我们进一步来往的。泌阳的王友梅，本是个最反动最顽固的大绅士，一九三七年冬他勾结宛西武定远团，侵犯我邓庄铺根据地，抢走了我军物资、粮款、军装。彭雪枫来后亲自出马和王友梅谈判，做争取工作，结果不但归还了抢走的东西，还支援了我们粮秣，竹沟的生活得以改善，喝黑糊糊、吃豆腐渣的生活结束了。

几 点 经 验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党遭到严重破坏、同中央失掉关系、没有老根据地作后盾的困难条件下，多处暴动均告失败。而我鄂豫边党和红军游击队能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以致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十四个革命根据地之一，道理何在？根据上述史实我粗浅地认为：

第一，党的领导核心坚强。参与领导的同志和先烈们，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必胜的信念，团结战斗、步调一致。

第二，没有来自上边或别处的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思潮的干扰，对发生的某些问题的处理，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如同北方局建立关系后，上级指示过改编民团的问题，但省委领导一致反对，没有执行改编民团的指示，使队伍摆脱束缚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执行政策完全从当时当地情况出发，不死搬硬套教条和别处经验。为着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提出广交朋友、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顽固分子，得到广泛的包括社会中上层人士和基本群众的拥护。

第四，不搞图具形式的宣传工作，队伍所到之处不留政治性的文字痕迹。宣传一靠口头讲、二靠实际行动（如严明的纪律等），使队伍在游击区内“有口皆碑”，威信很高。队伍在群众中生了根，而外界对队伍的存在却无从得知。

第五，在此时期，我们除“打坏货”攻寨围子，和几次被动的遭遇战以外，没有主动打过国民党正规军，外界很难觉察到队伍的行动。

第六，在此时期，游击区东起确山境，中间是泌阳，西至唐河境，长约一百来公里；南起信桐边，北至驻马店的老乐山，宽约六七十公里，这么大一块“三不管”地方。按当时敌正规军力量，是无法像对中央苏区那样围剿的。且山峦河流纵横，地形复杂，队伍虽小却机动灵活，如鱼得水，行动较自如。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将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此撰写此文。由于我年大记忆力衰退，可能挂一漏万。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难免和同志们有出入，希同志们阅后提出修正补充意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八月）

回忆鄂豫皖边区的斗争

梅 少 卿

根据地创立前的情况

鄂豫皖边区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地区，南起长江，北至淮河，包括湖北的黄安（现称红安）、麻城、罗田、英山等县，河南的商城、新集（现称新县）和安徽的金寨、霍山等地。这里山峦起伏，连绵不绝，交通极不便利，属于各省的偏僻山区。其中商城、金寨为大别山区的中心。

一九二四年以后，南方大革命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北洋军阀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进攻，从北边抽调部队南援，其中凡路经过鄂豫皖地区。这些军阀部队一路拉夫、抢掠、强奸妇女、烧房子、杀人，真是无恶不作。地主豪绅借机会强占土地，加重剥削，搞得民不聊生。生活在兵灾人祸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就如积蓄已久的干柴，只要一点燃即可变成熊熊烈火。有些地方的农民实在忍受不了，就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打富济贫的团体，可惜由于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均被地主反动武装给镇压了下去。这就迫使一部分人出走，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回来搞起了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到二七年春，我党先后派了许多人来鄂豫皖地区搞农民运动，如曹学楷、吴光洁、陈定侯、徐朋人、周维炯、王秀松等等许多同志，先后到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商城和皖西一带搞农民运动，建立农会。

我所在的皖西金寨白水河一带的农会，是二七年春成立的。记得二、三月份，赵瑞祥、张玉洲等同志在我们那里四处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农会。第一次农会开大会，参加的人数约有两千余人。在会上他们说：要改变做牛做马的非人生活，就必须团结起来，与封建势力、贪官污吏、军阀作斗争。这次大会的影响很大，接着各地纷纷组织农会，参加的人数也日渐增多，乡里农会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第二次农民大会是在梓树坪召开的，到会约七千余人。这次会主要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团结起来，支持北伐战争，同时向豪绅地主要钱要粮支援北伐军。大会后各地农会都筹集了不少钱粮支援北伐军。

由于北伐军捷报频传，北洋军阀的部队节节败退。特别是北伐军攻克武昌、汉口、九江等地后，军阀部队溃不成军，散兵游勇流窜到山区来很多。农民对这帮家伙恨之入骨，农会马上组织农民去打这群败兵。农民们手拿着菜刀扁担等东西就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子弹、马匹等物。这些武器更使农会生威，吓得那些地主、官吏统统跑了。这样，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商城和皖西一带的农会有了自己的武装。武器虽然较少，可给农民增添了力量，这也是鄂豫皖边区农民拿起武器，真正武装自己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春，由于鄂豫皖边区农民运动发展得很快，党陆续从各地调来许多干部领导农民运动，这时是鄂豫皖农民运动的高潮，革命斗争形势很好。

正当这时，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提出要我党解散城市的工人纠察队，解散农村的农会，并交出武器。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外推行了一套右倾政策。加上年轻的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不足，同意交出武器。当时农会会员都想不通，但又没法，只好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只有个别人把枪埋藏了起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动派首先在上海，然后在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种屠杀很快就蔓延到农村。鄂豫皖边区的许多农会干部也被抓走杀害了。各地农会都不存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一手扼杀了。

“四·一二”政变后，地主恶霸都跑了回来，到处抓人、抢东西，逼农会会员还钱还粮。他们还组织了反动地主武装，抓共产党，抓农民，抢占土地，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心中气愤万分，但苦于手中没有武装，不知如何去干。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党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给敌人以反击。党又向鄂豫皖边区派了党员干部，组织地下农会。鄂豫皖边区的农会很快就恢复了起来，在地下与地主、民团做顽强不懈的斗争。

三次农民起义及边区红军的建立

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党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五人成立临时中央，决定在南昌、广州、湖南、湖北等地举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鄂东黄（安）麻（城）起义就是继南昌、秋收、广州起义之后发动的。

南昌起义后，党派了一批起义部队的干部来到鄂东组织准备

起义。二七年十一月，在黄（安）麻（城）等地举行了农民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又打响了一枪。这是鄂豫皖地区第一次农民起义——鄂东黄麻地区农民起义。

一九二八年，黄麻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攻，受了挫折。所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接受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学着井冈山的办法，决定在鄂豫边界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组建红军。于是这支起义队伍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由吴光浩同志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同志任党代表，汪莫川同志任参谋长，王秀松同志任鄂东特委书记。不久又建立了鄂豫边党政领导机关，徐朋人同志任鄂豫边特委书记，曹学楷同志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九年初，党为了扩大鄂豫边根据地的范围，决定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商城南部地区举行农民起义。经过多方面准备，确定立夏节这天（五月五日）晚上，在白水河、丁埠街、南溪街、汤家汇（双河）、斑竹园、李集等地同时举行起义。丁埠街是个大集镇，驻有地主反动武装民团。周维炯同志已打入内部做了许多工作，在士兵中发展了八个党员，加上地方五名，共十三名党员。他们组织领导暴动的农民，里应外合地把丁埠街的大民团给消灭了。斑竹园的民团也有农会的人打入，也是里应外合搞掉的。而白水河的民团全部由流氓地痞组成，内部没有打入的人，打起来困难较多。但在张玉洲、赵瑞祥的领导下，靠一条半枪（那半条枪无托木，且打不响）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把这伙民团给消灭了。这一个晚上，我们共消灭了敌人七个民团，还抓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天亮之前，七路起义队伍汇集在太坪山附近，建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同志任师长，徐基虚同志任

党代表。这里的局面一打开，就可继续向皖西发展革命势力。所以这次起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二九年冬天，我党又领导了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部队很快就组建了红三十三师，师长是徐百川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姜镜堂同志。这一次农民起义使鄂东、豫东南和皖西三省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边区根据地。

有了这些红色武装，鄂豫皖地区就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红军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很快就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多青年踊跃参军，部队发展很快。到了三〇年三月，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军长为许继慎同志，副军长为徐向前同志。这时，中央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书记由郭述申同志担任。

红一军成立之后，立即趁蒋、冯、阎军阀混战之机，大举出击，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光山、罗山等县城及花园、杨家寨、信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正规部队和零散的反动武装近万人，迅速扩大了队伍，全军发展到五千余人。李立三曾命令鄂豫皖边区红军配合友邻红军“夺取武汉”，并要在根据地推行一套“左”的政策。后来，部队没有去实行打武汉的计划。

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派曾中生同志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同志来了之后，做了许多调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总结了由于立三路线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土地分配、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粮食管理等各项建设根据地的政策，并且在纠正错误时只强调解决政策问题，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把根据地的广大干部都团结了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部队干部战士团结紧密，士气很高。

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〇年冬至三一年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溶专设了一个“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调集九个师的兵力对边区进行“竹园式”包围，然后控制要路、重镇，最后进行分区“清剿”。

三〇年深秋时节，敌人就已开始在根据地周围安设据点，逐步推进，向根据地进犯。红军根据敌人“围剿”的情况，决定趁敌兵力部署未完成之前，先打它一下。部队向南主动出击，十一月上旬，红一军猛攻姚家寨、黄安两地。敌军遭到我措手不及的打击，无法还手，立即仓惶退却。十一月下旬，消灭谢店东南还未立足的夏斗寅十三师的一个营另一个连。这时我部得悉新洲守敌比较薄弱，三十日夜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新洲，迅速歼灭了郭如枝二十军的一个混成旅。这下何成溶慌了，忙调兵来堵击，我军已调头东去，攻下了罗田，又敲了他一闷棍，把何成溶的行动部署给打乱了。

十二月初，敌人调集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进攻。红一军这时已转到皖西。特委决定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来扰乱敌人。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在敌后破坏其运输线、摸岗哨、割电线、瓦解敌军。而由蔡申熙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到黄梅、广济一带作战，从外线配合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寻机与红一军里外夹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我红一军从罗田出发到皖西，出手歼灭范积熙六十四师所部的两个营及反动民团共千余人，继而又进攻麻埠、独山，直逼

到了六安城下。敌人慌忙调一个旅增援，我红一军又回头向西在河南商城二道河附近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全歼一个团，缴获山炮一门。这样，敌人包围红军的企图破产，局势从敌人进攻转向互相对峙。

一九三一年元月下旬，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四军，军长为邝继勋同志，政委为余笃山同志。特委认为：敌人转为守势，我们要主动出击来调动敌人，在运动之中消灭之，地方武装要配合歼灭敌人。红四军主力一部分围攻麻城县夏斗寅部队的一部，敌人立即派了四个团来增援，我部队与敌激战三天，敌被我击溃，缴枪千余条，收复十几处集镇。二月份红四军又乘胜向京汉铁路柳林站发起攻击，歼灭袁英新编十二师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敌旅长侯祥甫带了两个团前来增援，被部队消灭在路上，侯祥甫也被我们活捉。不久，驻花园小河溪一带的岳维峻师向我军赶来，三月上旬到达双桥。我乘其还未扎根，在外围先歼灭其一个团。岳维峻急忙亲自带部队反扑，打得十分激烈。我红四军主力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援助之下，包围了敌两个团打了一天，将其全部歼灭，抓了很多俘虏，连岳维峻也被活捉。敌人的这次“围剿”就此化为南柯一梦。在这段时期里，红军共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四、五月份敌人又拼凑了一些部队，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我红四军采取避开其主力，在运动中打其弱点的作战方针，歼敌六千多人。使敌人集中的十五师、十四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十个师对我红军的“围剿”不能得逞。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在这两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根据地得到了发展，红四军

发展到两万多人，地方武装也扩大到一万多人，枪枝弹药得到了很好的补充。根据地的人口增加到一百八十多万人。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红色政权纷纷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需要大批干部，于是从部队抽调了一些人员参加地方工作。政府组织了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给部队输送优秀青年。另外还创办了红军培养学校、“列宁小学”。红军培养学校主要招收革命青年，组织他们学习军事和文化，为红军培养后备力量。“列宁小学”是为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学文化而创办的。

在这期间，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很好，整个大别山区一片火红。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倒行逆施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所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后来的右倾逃跑主义，给鄂豫皖根据地和军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带着陈昌浩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他根本不听曾中生同志的情况介绍，就指责鄂豫皖边区特委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撤销了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分局设在河南新集，现新县），由他自己任书记兼军委主席（鄂豫皖边区军事委员会），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团中央分局书记。并且宣布“在这一地区未与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就这样，鄂豫皖的军政大权被张国焘一手独揽了。

为了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先后把红四军中坚决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政委余笃山同志、军长卞继勋同志、政

治部主任陈定侯同志撤了职；又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全盘否定鄂豫皖苏区，并围攻曾中生同志，强逼曾中生同志承认“错误”；还把早在苏联就反对王明的特委委员徐朋人同志开除了党籍。张国焘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斗争。

一九三一年夏天，中央苏区受到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而在鄂豫皖边区，蒋介石则采取守势。红四军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率领下从河南新集南下，八月首先攻下了英山县城，全歼守敌一个团，缴获枪枝三千多条。接着又继续前进，攻克罗田、浠水、广济。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九月份又在洗马贩歼敌一千多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消灭了敌人七个团，缴枪四千多枝，俘虏敌官兵五千多人。正当我们在长江两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之际，接到了中央分局张国焘命令北撤的信。红四军只好放弃了有利战机，准备退回根据地。

九月五日，军部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大家认为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应继续利用敌人还未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有利时机，开展积极的斗争，而不应北撤。会后，曾中生同志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复信给张国焘陈述不撤的理由。然而张国焘丝毫听不进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命令红四军北撤。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红四军领导提出南下出击，积极向外发展时，张国焘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为中央苏区分担压力。他以“巩固苏区”为借口污蔑南下出击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有引敌进攻根据地的危险”。经过大家一再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才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可是在讨论南下进攻方向的时候，张国

焘却一反常态，变“右”为“左”，竟命令红四军一个月攻下英山、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应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达到牵制敌人兵力援助中央苏区的目的；不应进攻中心城市安庆（安庆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可张国焘不听大家的意见，仍按其错误意见作出了决定。红四军南下后，经分析认为：主力到四百多里远的白区打安庆，敌情、地形、群众条件都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便没有听张国焘的，同时把行动方向直接向党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这时张国焘连给红四军发了四封信，指责改变攻打安庆的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等。曾中生同志在复信给张时，尖锐地指出了他的错误。他恼羞成怒，可又无真理可言，就用阴谋手段来对付曾中生同志，乘机篡夺红四军的领导权。

恰在这时，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名义，派人送信给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同志，诡称许已与敌勾结，欢迎他投蒋，进行离间破坏。许继慎同志光明磊落，把来人逮捕，连信一同送交军部，红四军领导随即附上自己的意见送交中央分局，张国焘一看有机可乘，就利用这件事，在新集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人，制造了一个所谓许继慎等同志有一个“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蒋”的“全盘反革命计划”和“反革命中心组织”的假案。九月，陈昌浩到红四军夺权。他不顾指战员的强烈反对，撤销了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由他接任，紧接着就开始了“肃反”。他排斥异己，大肆抓人。红四军北退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又亲自出马主持“肃反”。当时我正好送一批青年参军到白雀园，见到大批红军干部被逮捕，一

打听,说是“反革命集团”,是AB团,第三党。当地群众见此情景都痛心地流下了眼泪。送青年的家属一再叮嘱他们,可别入什么党,当干部,只要打白匪就行了。我听了心中非常难受。在那以后不久,就听说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熊受喧、魏孟贤等数百名红军高级指挥员被张国焘杀害了。他们还给曾中生同志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帽子,污蔑红军犯了“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中央分局又按张国焘的调子作出了关于红四军问题的决议。

当时,对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肃反”是必要的。但是张国焘却利用“肃反”扩大打击面,把坚持正确路线,抵制错误路线,对敌斗争不畏艰险,创建根据地有功的老干部作打击对象,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张国焘在红四军“肃反”后,接着就把“肃反”扩大到地方党团组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把成批干部、群众关进保卫局秘密杀害。张国焘还采用特务手段,诱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兵,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王秀松、徐百川、陈定侯、陈奇等同志,就是这样被他卑鄙地杀害了。那时,许多部队连以上干部,地方区、县的干部都这样被他杀害了,真正起了国民党反动派起不到的作用。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也贯彻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本来《临时土地大纲》规定:“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分给贫雇农、失业工人和退伍士兵。对富农和中小商人实行与地主有区别的政策。达到团结中间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三〇年根据地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在这之中虽然受到立三

路线的影响，有些过“火”行为，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几百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地进行土地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获得土地的人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青壮农民几乎都参加了赤卫队等地方武装。这些土地革命的成果，张国焘一概否定。他在《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中攻击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土地革命的利益被地富窃去，贫雇农、工人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接着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重新分配土地”的决议。中央分局也发布了《反富农问题通告》，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反富农”的运动中，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农自动拿出土地平分”等一系列左倾政策。又把一些富裕中农划为富农，把富农划为地主。搞乱了阶级阵线，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甚至搞到了贫农头上。在经济上也实行“左”的劳动政策，打击了中小工商业者。政治上实行除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外“一切斗争”的政策，把中间阶级也赶到敌人一边去了。这些过左的政策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尽管张国焘干扰破坏，可鄂豫皖军民仍然十分忠于革命事业，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告失败。加上“九·一八”事变，民族民主运动又掀高潮。十一月份，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改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红四方面军共三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已开始。在徐向前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十二月攻下黄安县，全歼守敌五千余人。接着挥戈北上。三二年一月在豫南亚港地区击溃敌五个团，二月又围商城击溃援敌二千多人，不战收复商城。三月，东进至皖西苏家埠，浴血奋战了四十八天，

消灭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共三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张国焘被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而积极贯彻临时中央通过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三二年初，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鼓吹“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要“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和“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还胡说什么“国民党只有七个主力师，中央苏区可以搞掉两个，鄂豫皖搞掉两个，剩下三个师还‘围剿’什么？”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张国焘更加头脑发热。二月份，鄂豫皖省委通过《政治决议案》，胡说：“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进攻红军的失败，已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张国焘这个“偏师”说“左”得出奇，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吃惊，指责“偏师”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是绝对错误的”。对此，张国焘、陈昌浩根本不理睬，继续胡说：“不但以打破敌人‘围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而且要以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了。”陈昌浩在新集的报告上说：“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势力占优势，我们包围敌人，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进而提出打武汉的错误战略方针，而不准备迎接新的反“围剿”战斗。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设“剿匪”总部于汉口，集结了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规模相当大的第四次“围剿”。这时鄂豫皖中央分局开会，徐向前同志认为要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让连续征战七个多月的部队集结休整，养精蓄锐，待机歼敌。可张国焘不相信已得到的确切的军事情报和同志们的意见，坚持“不停顿地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由于敌军固守待援，我主力只得分兵阻击援敌，结果麻城不能迅速攻克，主力又失去主动拖在那里，使敌人得以从容部署“围剿”。一个月后，敌军向黄安七里坪猛攻过来，情况危急。张国焘这才不得不下令撤出麻城，但又不诱敌深入，却反在七里坪搞单纯防御，命令疲惫万分的红军仓促应战，拼消耗。当时，敌人来势汹汹，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我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了七天七夜，战士们前赴后继，在阵地上反复展开肉搏战，最后歼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枝。这一仗虽然取胜，但损失太大，战略方针是极端错误的。然而张国焘看到胜利又忘乎所以起来，狂妄地说：“国民党动员任何多的军队，都不堪一击。国民党主力军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实际上敌人只是暂时退却固守，战局仍在僵持着，并未有什么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九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豫南、皖西出击，因敌人用固守待援的战术，我军没有得手。十月初，我军只好经英山、罗田折回西进，途中在河口附近歼敌四千多人，可红二十五军军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由于张国焘错误的战略方针，我红四方面军主力东游西转，苦战两个多月，虽击溃一些敌人，但仍无法扭转战局。

相反鄂豫皖根据地倒丧失了六分之五，把原有的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个县城丢得只剩一个罗田。中心市镇新集、七里坪、金寨、麻埠、独山、燕子河、宣化店、河口、张店也沦为敌人进攻的据点，回旋余地很大的根据地被搞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活动了。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之下，徐向前同志提出主力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外活动，这样可以调动敌人寻求歼敌之机，一可保存自己的力量，二可待机打破“围剿”，重返苏区，时刻保持主动权。后来决定在根据地只留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的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谁知主力红军两万多人，在广水、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后，就不知去向，联系不上了。

直到后来一部分掉队的同志和伤员回来，我们才知道张国焘已经把部队拉到四川去了。许多同志这才明白，当初在黄才暇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时，张国焘极力散布悲观论调，说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在根据地内继续战斗毫无希望”等等，只差没把西逃四川的打算说出来。他还发誓说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结果主力一到路西，就跑到四川。这样，打破第四次“围剿”的可能性就一点也没有了。

不久，中央通知鄂豫皖省委，说张国焘已拉着部队进入四川，不要指望他回鄂豫皖了。留在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毫无准备。蒋匪军乘机闯入，在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多少干部、党员、群众惨遭屠杀！特别是卫立煌制造无人区，把大别山区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蒋介石为奖赏他剿共有功，还命名金寨地区为“立煌县”。在这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为使大别山区的红色火炬保持不灭，又重新组建了新红二十五军

和红二十八军，顽强地与敌人坚持斗争到抗战。这两支部队在鄂豫皖革命斗争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红二十五军的组成和开辟新区

一九三二年底，鄂豫皖省委为了使根据地摆脱由于张国焘西逃后造成的被动局面，把留下的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一些地方武装及收容的掉队的和伤病员组建了新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成立以后，蒋介石不再吹嘘“大别山的红军已经肃清了”，连忙调兵遣将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三三年一月，红二十五军首战敌十五军马鹤逵部马腾蛟的一个旅。在新集郭家店一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敌人两个团。我军手枪队冲进敌团指挥所，生俘敌团长等三十多人。这一仗旗开得胜，振奋人心。部队在二月中旬，又在九龙缠顶山歼灭卫立煌十三师所属一个团。根据地群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到了三三年四月份，部队已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

继而，红二十五军围困了黄安七里坪敌十三师。领导是想采取把敌人逼出来从而消灭的战术。可是敌凭坚固守，倚仗粮草充足，就是不出来。另外又派兵前来增援。我七十四师在古凤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未全歼。我们大部队集中作战，粮食供应困难。部队为了粮食，经常要跑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以外的地方去。战士们常饿肚子，用树皮、野菜等充饥，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打不下，又围不住的情形之下，才决定撤离黄安七里坪。部队刚撤下还未来得及休整，敌人就调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对潢川、商城等地“围剿”。敌人认为受创的红军部队已精疲力尽，不堪一击了。然而

他们想错了。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出其不意地向牌石的敌人发动了进攻，五次冲锋后，全歼敌人一个团，击毙团长，俘虏副团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缴获迫击炮三门。部队虽胜，但不恋战，随即转移到莲花山李家湾一带。敌人很快调集约十个师的兵力，分多路包围红二十五军。为了不与敌人拼消耗，摆脱困境，避开敌人来势凶猛的前锋，鄂豫皖省委决定部队由皖西转回鄂东。

部队转移到南溪时，在葛藤山附近，遇到了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军队行动缓慢。结果担任后卫的副军长徐海东同志和后方勤杂人员与前面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的大部队失掉了联系。拂晓时，后卫部队在黄土岗公路附近与敌三十一师碰上了，情况十分紧急，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连和一些勤杂人员，战斗力很弱。徐海东同志马上带领部队上了“猴子山”。好在天还不很亮，敌人没有摸清我们有多少人，犹疑一下，没有立即进攻，特务连守住山头，叫号兵吹起调动号来迷惑敌人。哪知号一响，山下枪声大作，也答起号来。原来山下是前面掉队的我一个营另两个连。这一下敌人吓坏了，以为我们前后夹击，赶快撤走了。我部考虑虽有六个连队，但敌已发现动向，要想冲过公路已有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折回皖西打游击。在西河，把部队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连，一个交通队，加上六个连，在丁埠街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红八十二师。为统一皖西部队的指挥，皖西北区道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原红二十五军一部编为八十四师。红二十八军的番号从此而有。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八十四两个师，军长由徐海东担任，政委由郭述申担任。

经过敌人多次的“围剿”，皖西的苏区只剩下很狭小的一片地方。部队常为在何处找落脚地而生忧。敌人把村庄几乎都给烧

光了，村村都是十室九空，尸体遍地。国民党七十五师宋天才还用汽车拉了几千名青年女子运到河南贩卖，许多红军家属被斩尽杀绝。在吕家大湾时，部队挖开了一个大土堆，里面竟有一百七十多具尸体，男女老幼，甚至几个月的婴儿都被杀害。这血的仇恨，激起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大家纷纷表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一定坚持到底，绝不动摇。一定要报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敌军在皖西有十个师的兵力，大搞“三剿”（进剿，驻剿，追剿）。而我们皖西的部队实际只有二千多人，且装备不足，加上正值冬季来临，部队衣被难以解决。因此，省委指示我们暂时避免与敌人硬拼，分散进行游击战。红八十二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红八十四师到商城南部熊家河一带活动，并筹备给养。

红八十四师到了金寨地区，敌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二团发现我们，企图分几路把我们吃掉。于是部队迅速经过筒家畈转移到八道河、母猪河一带，后进入湖北罗田县，把敌人甩掉了。接着又按预定计划来到商城南部熊家河一带坚持斗争。那时生活非常艰苦。白天躲在山林之中，晚上就下山“打粮”。每个战士都是肩挂粮袋，腰上别一把镰刀。搞到一点米先给伤病员吃，有时还要救济给群众。山下的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省下粮食、盐给部队，即使被敌人抓去，也不讲红军的去向。我们就是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十月底，红八十四师北走至商城红门一带，歼灭了宋时科的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后又收容了归队的伤员，八十四师补充了两个连。不久八十二师到商城与八十四师会合。十一月份，大雪纷纷扬扬，但部队过冬的衣服

仍未解决，全军指战员几乎都还穿着单衣。睡觉时，就几个人靠在一起取暖，能弄到的一点稻草盖盖就算是幸运的了。全军只有十三元钱，而且在敌人严密控制之下也无法买到东西。后来了解到吴桥有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开的布行，部队派人去搞了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可惜棉花太少还是做不成棉衣，于是又攻打叶集，消灭了一个四百余人的民团（这里原是宋时科部队驻守，吃了败仗调到霍丘整训去了），在叶集搞到一千多斤棉花，这才真正解决了衣着问题。全军上下，个个自己动手裁缝衣服，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

十一月底，红军在固始县以南的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敌人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敌即派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部在前后塘、天桥一带与敌人激战了一天。由于敌人众多，来势凶猛，不宜与敌拼消耗，我部队在夜晚主动转移，由金家湾以南渡过史河，在虎皮冲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敌独立五旅和商城县县长率领的民团，俘虏了敌人八百多人，缴获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枝步枪，敌旅长和县长都被击毙。这场战斗干脆利索，等敌援兵到来时，我们已经走了。部队原计划到大埠口一带驻扎，过了金寨的两道封锁线后，在南溪附近遇上了敌人一个连，就消灭了它，但耽误了点时间。到驻地还需翻一座大山，有四十多里山路。由于部队一直是在作战、赶路，两天两夜没得到休息，加上携带伤员、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行动不快。军部命令两个营监视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余部队休息做饭。饭还未做熟，敌五十四师就从南溪方向打来了，火力相当猛。部队领导即令两个营向山顶运动，暴露给敌人，到山顶之后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人隐蔽。敌人上当

了，向山顶猛冲，我军集中了主力向敌右翼猛攻，待敌人发觉上当之时，为时已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人两个团，敌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被活捉。

红军转到大埠山下，敌人集中了约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我进攻。此时，我军弹药补足，士气高涨，与敌激战一天一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一点便宜没有捞到。但是在此次战斗中，红八十二师师长黄储南同志光荣牺牲了。

在这段时期接连的几次战斗中，我军对敌人打击很大，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纷纷龟缩，撤出南溪、牛不暇等地，跑到了埠、李集、汤江、吴店等集镇。皖西的红军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部队也得到了发展，从一千人发展到三千多人，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三四年三月份，在商城县东豹岩，皖西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合。分别半年之久，见面激动万分。吴焕先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鄂东后的情况。敌人在皖东集中了五十八、四十四、三十、三十一、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包剿”红二十五军。敌人采取堡垒政策，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辗转不停地作战，情形极为困苦。部队在天台山、灵隐寺、茅草尖一带一片狭长的山区打游击，缺吃少穿，常常以野菜树皮充饥。敌人不断搜山、烧山，在水源里放毒，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坚定地跟红军站在一起，想尽各种方法支援红军，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伤员在山洞里宁愿冻死、饿死也不出来投降敌人。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省委书记沈泽民因重病缠身，牺牲在天台山上。

这次会合后，两个军加上老红二十五军进川路上留下的伤员，

重新整编了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军长。整编之后的红二十五军，首先在汤池附近的沙窝南高山寨歼敌一〇九师两个营，俘敌几百人，缴获轻重机枪七十二挺。并在当天见到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省委即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的形势，决定在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建立红军根据地；在鄂东的黄陂、孝感、罗山等地建立游击区；成立鄂东、皖西道委会。鄂东道委书记为郑位三同志，皖西区道委书记为郭述申同志。皖西的三路游击师并为八十二师，师长由林维先同志担任，鄂东组建西路游击师。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决定，在上述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部队转移以后，为便于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又留下了十三个便衣队。新苏区的成立，也给部队很大的支持，在新苏区又补充了一部分新兵。没有多久，敌人调来三个师进犯新苏区。主力部队在彭域一带歼敌四十四师一部，接着拖着敌人向外转，在扬平口和敌东北军打了一仗之后，就把敌人甩掉了，回到了新区。

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二十五军行动在白叶山一带，敌人有五个师跟了上来。军领导同志决定打敌一路、再拖着敌人跑。军部命令二二三团在麒麟路阻击敌人后续部队，又派一个营占领了何家冲后山的一个要隘。部队主力在长岗附近围住了敌一一五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敌前卫团，紧接着把敌一一五师团团围住将其全歼，只有师长姚东番带一小部分残兵逃走。这次战斗，共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五千七百多名，缴获轻重机枪三百余挺。这是东豹岩会合整编后打的最大的一仗。敌一一五师是东北军，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向俘虏发放了路费，全部释放了。

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的这段时期里，在鄂豫皖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的力量逐步扩大，终于冲破了重重难关，保卫了苏区的红色政权，功绩卓越，不可磨灭。

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 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奉命西进陕西，北上抗日。盘踞在鄂豫皖地区的国民党十一路军，拼命对红二十五军“追剿”，阻击我抗日队伍北上。在鄂东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红二十五军终于跳出了包围圈。敌十一路军的“追剿”失败，恼羞成怒，调回头来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大“清剿”，扬言要把红区变成无人区。惨无人道的白匪军和地主民团实行了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党员干部损失很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再次转入低潮。大别山人民对敌人恨之入骨，对红军更加怀念。

为了适应当时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形势，党组织决定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在鄂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共鄂东道委书记罗永范同志在鄂东黄安宣化店，将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时留下的掩护部队和几百名伤员及基层红色政权人员，还有部分革命群众共四百余人，合编为鄂东独立团，团长是陈守信同志，政委是徐成基同志，下属一、二、三连和手枪连，作为独立团的主力部队。鄂东独立团的成立，给鄂东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鄂东独立团成立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清剿”，妄图把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环境越来越恶劣，鄂豫皖边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白匪军，还乡团象决口的洪水到处

泛滥成灾。敌人采用大兵压境，四处合围的手段，搜追、堵截、烧杀、抢掠，鄂东独立团的处境异常困苦。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敌后斗争，中共鄂东道委决定将鄂东独立团转移到皖西北，与皖西北道委新组建的一个团会合。形成拳头，相机克敌。

一九三五年一月，鄂东独立团和特务一、二营约一千人左右，在鄂东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同志的带领下，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圈，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转战三省，历尽艰险，所剩的六、七百人终于来到皖西六安、霍山地区，见到皖西道委高敬亭同志，和皖西部队会合。这两支部队的会合，鼓舞了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胜利的信心，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九三五年二月，部队转移到太湖凉亭。在凉亭举行了党的干部会议，成立了新的鄂豫皖省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并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作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定，要求在各块根据地的政权工作人员和少数游击队（便衣队）坚持斗争；将部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任军政治委员，主力为八十二师，方永乐同志担任政委；鄂东独立团编为特务营，营长由陈守信、政委由徐成基担任；原特务一、二营编入手枪团，还另组编了一路、二路游击师，作为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的骨干。

凉亭会议是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决定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展根据地。从此红二十八军在皖西的潜山、太湖、舒城、霍山等地区和鄂东黄梅、广济一带积极活动起来。

新生的红二十八军组建后，立即遭到数十倍之敌“清剿”和“追剿”。部队天天行军打仗，立足不下，在大化坪一战中极为危急，伤亡较大，加上冰天雪地，部队的给养、弹药得不到补充。几次战斗后，部队人数显著下降。一九三五年三月，省委和军部在霍山县磨子潭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将一个团编为小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而主力遵照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和“强敌跟进，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摆脱敌人的“追剿”；另外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徐成基同志担任特委书记，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在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的多方面支援配合之下，部队打了许多胜仗。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红二十八军主力在潜山县桃岭一带打伏击，歼灭敌人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前卫一九〇团的两个多营，击毙敌两个营长，缴获大批枪枝弹药。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我军士气大振；同时，也使敌人“三个月消灭红二十八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这一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听说蒋介石在南京急得跺脚，急忙把他的外国顾问请来，制定新的“围剿”鄂豫皖边区红军的计划。一九三五年三月，蒋介石拍了个电报给鄂豫皖剿共前线总指挥说：“查豫皖鄂边区残匪，迭令剿办迄未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迅速扑灭，貽患无穷。兹为彻底肃清，永绝后患计，从新布署……。”蒋介石将鄂豫皖边区分为三个区，命令何柱国的东北军，刘茂恩的十一路军，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及民团分兵“进剿”，并“限本年六月底肃清匪患”。

敌人倾巢出动，情况紧急。边区特委在舒城、霍山交界的黄泥河召开会议，研究粉碎敌人新的阴谋计划。会议决定：主力部队跳出皖西，到鄂豫皖边区的桐柏山区一带活动，然后相机北上追上红二十五军。这样可转移敌人对皖西的注意力，减轻一些负担，使敌人“围剿”计划落空，也可使坚持皖西斗争的地方武装有机会巩固扩展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红二十八军从商城北边的窑沟出发，行至三里坪附近，遇到敌人河南保安团的追击。军部命令特务营在三里坪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特务营迅速歼敌前卫营大部，紧接着就阻击敌增援部队。红二十八军领导看战机极好，就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回头迂回到敌人侧翼，将敌保安团歼灭。此战歼敌四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枝，重机枪八挺。部队的枪枝弹药得到了补充，继而通过光山至麻城的封锁线到达罗山，又在杨万店打垮敌东北军的堵击，与鄂东地方党组织和新编鄂东独立团会合。为了扩大主力部队，高敬亭同志把这个团编入部队，一起进入桐柏山区。

红二十八军突破了平汉路封锁线，西进至桐柏山区泌阳县境内，情况比原先预计的困难得多。这一带圩寨特别多，土顽武装知道红军来了，就强迫老百姓搬进圩寨，部队无法扎根，给养得不到供应。敌三十二师和东北军部队也接踵而至。我军无法立足，进退两难。这时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派了一个交通员与红二十八军接上了关系。吴焕先政委估计红二十八军已过路西，可能追赶红二十五军。因此请高敬亭同志赶快带部队返回，因为前面有一百八十多里路的平川，敌人的川军和陕西的正规部队八、九个团守在那里，想穿过这一带是不可能的。吴焕先同志建议鄂

东党组织和皖西党组织及高敬亭同志碰头，共同组织鄂豫皖省的领导中心，结束党组织分散状态，省委书记由党中央决定。于是红二十八军在桐柏山区松树岗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当机立断，决定迅速东越平汉路，折回皖西，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当时的敌情是：东北军的两个师在桐柏山北部，敌二十五路军的独立旅和其他部队从东南方向合围我部，企图把红二十八军赶至桐柏山西北平原歼。形势万分危急。红二十八军决定趁夜进至桐柏山东麓，在要道——棺材沟伏击敌人，然后突围转移。当敌独立旅进到沟底，我军一齐开火，猛烈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死伤一百余人。还未等敌人清醒过来，我部队已乘机突围，摆脱了敌人，连夜东返大别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红二十八军越过平汉铁路。六月十三日，在河南光山南部高梅店，碰到敌“堵剿”部队，东北军一一二团。我部利用有利地形，歼敌两个多连，缴获轻机枪九挺，步枪一百五十多枝，俘敌副团长。

部队碾转回到鄂东，见到鄂东党组织的同志和高敬亭同志。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鄂东两次成立独立团均编入红二十八军，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敌人猖狂抓人、杀人。原道委书记王福明同志被捕，加上原道苏维埃主席詹以景被捕后叛变，出卖了许多党组织，造成鄂东北的党组织没有统一领导，工作难以开展。高敬亭同志本想在这一带转一两个星期，召开一个较大的会议研究一下工作，可附近敌人较强大，不宜逗留，就叫道委秘书罗作范同志先暂时负责。特委和各县委先不动，工作仍以特委为中心，其他问题待鄂豫皖省委的组织作出决定再说。另外又从部队抽出一批原来在这地区工作过的干部补充给鄂东党组织，加强党的力量。不

久，鄂东党组织召开了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把道委、特委的警卫队的一部分伤员，再动员一部分群众组建第三个独立团，各县委恢复便衣队。

红二十八军于六月十八日与敌独立旅六一三团遭遇，激战了六个多小时，肉搏数次。全军将士斗志极为旺盛，最后将敌击溃，毙敌团长曹兴文、参谋长刘长荣，以及毙伤敌营连以下官兵数百人。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堵截；全军于六月下旬胜利回到皖西潜山、太湖地区。在潜山县简家河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总结了红二十八军西进前后的得失，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寻找立足点，歼灭敌有生力量，开展游击战是完全正确的；而审势不准的错误，由于及时更正，没有遭到更大的损失，要吸取教训。同时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方向，坚定了全体指战员必胜的信心。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国民党调集了更多的部队对鄂豫皖我红色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当时整个鄂豫皖地区有敌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二十余万人，加上各民团共三十多万人。敌人十一路军前面堵击，后面二十五路军追击。我红二十八军一千多人，不分昼夜地与敌人浴血奋战，部队减员日益增加，弹药、给养也难以得到补充；部队曾两度想打破重围，向鄂东挺进，均未成功。

这时，高敬亭同志决定带领手枪团下舒城、霍山、潜山、太湖一带活动，而方永乐带领八十二师继续挺进鄂东。八十二师经过多次战斗，才打到了麻城一带，再前进困难就更大。在麻城一带转战月余，连打了七次，都未通过敌一〇二师的封锁线。部队虽得到皖西特委徐成基同志组织的一部分兵员补充，但人员仍在下降。八十二师进退两难，卡在这空档子里。在这种远离主力，敌

我力量十分悬殊，活动范围极端狭小的情况下，方永乐同志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营、团为单位分散打游击，部队也稍可得到休息，然后再集合起来返回皖西。在战术上制订了敌上山，我下山；敌占我地，我占敌地的方针。在与敌人反复周旋中，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机克敌，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在战略上的地位，以粉碎敌人的“清剿”、“包剿”计划。

敌人为了对付我分散游击，采取了“移民”政策。把老百姓赶到“移民点”集中控制，妄图断绝我党组织、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了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反“移民”斗争，我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在林维先同志的率领下，积极活动在鄂东地区。他们用伪装、偷袭的办法摧毁了一连串的“移民点”，还打垮了敌一〇二师的几个营，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壮了我军的声威。敌人一听到“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就心惊胆战。鄂东的地方武装也在此时发展壮大，成立了两个游击师，党的工作也活跃起来。

冬天，高敬亭同志率领军部一行，从皖西舒城出发，通过敌层层封锁线，到达罗山，与鄂东党组织见面，重新布置了工作；而后又带部队运动到河南沟洲，整顿和布置了当地的游击战争，于一九三六年春返回鄂东。这时原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参谋长丁少青叛变，他带敌紧追部队，同时还残酷地破坏我便衣队和党组织。红二十八军为保存力量，决定返回皖西。

在这期间，我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方永乐同志带领手枪团在麻城龟山一带活动。在黄冈偏西边的山峰上，与追击的敌一〇三师接火。我军兵力单薄，向深山转移，敌死死咬住不放。方永乐同志看处境险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便亲自率领少

数战士掩护部队迅速转移。不幸他身负重伤，虽经战士奋力抢救，突出重围，但抬下战场不久，这位鄂豫皖地区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就牺牲了。

由于方永乐同志和徐成基同志牺牲，何耀榜同志接替了这两位同志的职务。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军在商城的辛店击溃敌四个营后，部队再次分散活动，摆脱敌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的追击。

一九三六年底，红二十八军在漫天大雪的深山之中，得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另得到情报说鄂豫皖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也纷纷集结，叫喊着要“援救”蒋介石。为了配合全国形势的转变，我们决定组织力量，同敌人展开全面战斗，拖住敌人的主力。

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在汉罗公路以西活动，不断打击敌人，经常伏击敌人的军车、辎重等。特务营则在蕲春、广济交界的界岭，伏击了敌保安八团，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毙敌四百多人，缴获重机枪六挺。接着到黄冈一带搞弹药给养，在长江边上的团风镇，扣留了一个外国传教士，利用他逼敌人为部队在汉口买了一批药品等物资。当敌派两个团来追击特务营时，我已东行一百一十里来到黄梅、广济边境，在那又打垮了一个保安团，歼敌五个连，其中一个为重机枪连，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回师时又在铁冶望军寨，利用有利地形，打垮了敌二十五路军六一三团的阻击，毙敌俘敌三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其他地区的游击师、战斗营也很活跃，积极消灭敌人。

不久，我们又得到情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不执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的谈判协定，而是调兵遣将，妄图阴谋将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秘密地解

决掉，尔后再进攻陕北中央红军。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驻金寨，下设岳西、信阳、经扶三个办事处；兵力上又增加了卫立煌的部队和武汉警备师，加上原有的共五十多万人。在蒋介石、何应钦亲自督导下，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份，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了“三个月清剿”。

红二十八军军部命令主力集结在黄岗地区，各地游击队主动出击，拖住敌其他部队。主力在黄岗地区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歼灭敌人卫立煌部队一千余人，把卫立煌的嚣张气焰，一下子打了下去。而各山区的部队也积极歼敌，消灭了敌二十五路军一千余人。卫立煌的“清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为了开脱责任，他指责二十五路军司令剿共不积极，把他撤了职。二十五路军也因此改编为三十二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不久，红二十八军领导同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决定主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刚准备谈判，敌人就大耍流氓手段，用重兵层层围住军部。我们早已料到，一面严词指责敌人这一卑劣行径，一面命外围主力和各游击队、便衣队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不得不坐下来谈。

一九三七年八月，国民党和地方当局被迫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签定停战协定。一九三七年九月，红二十八军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同志任支队长，郑位三同志任政委。部队担负起党中央所赋予的在华中敌后抗战的伟大任务。

在三年游击战的艰苦岁月中，红二十八军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最后还发展到三千多人，总共歼敌三十多万，保卫了根据地四十九个县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

鏖战大别山区

——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片断

陈 祥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罗成云、方永乐、梁从学、林维先等同志领导下，依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历尽千难万险，以不足两千人的兵力抗击数十倍于我的敌军，完成了保卫大别山红旗的光荣使命。那无数次传奇式的战斗，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活和英勇牺牲的战友，都时时在我脑际闪动。岁月的流逝，历史的风雨，都不能将这一切淹没、磨灭，反而使它愈加清晰、鲜明，愈见光采。思念之余，常常记下零星片断。三年游击战争是一个巨幅画卷，发表在这里的只是几个画面的轮廓。

坚持熊家河地区的斗争

我们参加鄂豫皖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是以坚持熊家河地区斗争为起点的。熊家河的斗争，揭开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四十七师向我英（山）太（湖）交界的陶家河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进攻。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吴焕先同

志的率领下奋力阻击，给敌重创，我军也有较大伤亡。我们七十四师的两个连奉命掩护八十二师一部和一百多名伤员，到上方田后山的密林里安置。当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激战已经结束，敌人占领了陶家河。我们向南追赶主力，但走出五十多里，仍不见主力的踪影。于是，以三个连的建制合成完整的一个营，加上手枪团一部和担架队，便在凉亭坳一带打游击。七天后，我们决定返回皖西苏区，寻找主力红军。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经鹞落坪、团山、莲花山等地，转战七昼夜，行程几百里，最后渡过史河，在南溪附近的蔡家祠堂找到了中共皖西北道委，见到了高敬亭同志。高敬亭同志说：红二十五军到鄂东去了，你们暂时就地坚持斗争，等候主力回来再归队，并将我们暂编为二一八团。

后来才知道，红二十五军从陶家河撤出后，在途中接到指示，旋即转移鄂东，不久就奉命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了长征。这样，我们这支队伍就没能参加长征，而是作为一支骨干力量投入了鄂豫皖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一星期后，我们从赤南转战到赤城，开始了坚持熊家河地区的斗争。

熊家河地区，是一九三二年四次反“围剿”失利后，鄂豫皖苏区残存的四块根据地之一。红二十五军一走，苏区的范围更加缩小了，大片土地沦入了敌人手里。蒋介石调兵血洗大别山，实行“驻尽山头，宰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惨绝人寰地制造了一片片“无人区”。我们来到熊家河时，所见的也是一幅劫后的惨象：荒草满坡，荆棘遍地，十室九空，人烟稀少。赤城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县委和政府工作人员及群众，跟随二路游击师常到外区开展游击战。

熊家河地处大别山北麓，四周群山重迭，史河穿流东边，这里地势偏僻，附近并无重镇。敌人重兵驻扎在金家寨、商城等地，如果进攻熊家河，必须翻越层层大山，很难得逞。而叶集、开顺街的驻敌，与熊家河根据地又有一河之隔，没有个把旅的兵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中共皖西道委和二一八团，选择熊家河作为开展游击战的立足地，以求从敌人箍桶式的包围、篦发式的“清剿”中保存自己，壮大自己。

十二月三日，红军到下骆山一带活动，开顺街驻敌宋士科旅向我军逼来。我们隐蔽在山上丛林之间，居高临下，待机歼敌。

一发现敌人进入了伏击圈，红旗一展，机枪声、呐喊声骤起，红军战士象一支支利箭，嗖嗖地飞下山，插到敌人中间，未等敌人明白过来，搏斗就展开了。担架队的同志抡起扁担左右开弓，上下翻飞，只砍得敌人的阵势七零八落，火力失去作用。敌人看大势已去，企图夺路奔逃。不料后路已被我们一营截断，敌人陷入重围，死伤过半，剩下的纷纷缴枪投降，敌后续部队见势不妙，也不战而败，逃回开顺街的窠穴。

太阳落山时，红军满载而归，下骆山一仗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担架队的同志甩掉了扁担，换上了钢枪，被编入二一八团第三营。这就是“扁担换钢枪”的故事，直到现在依然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我们打了不少好仗，也打了许多恶仗，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官山河打毛排一仗中，我们营失去了三位领导——营政委、营长和副营长。他们的名字已经记不真切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却深深印入我的心坎，依然栩栩如生，永远难忘。

那天，我们侦悉敌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六一四团护送三十多吊毛排，装载大批粮食、食盐和冬装，逆史河而上，运往金家寨。我们连夜埋伏在石庆岭山梁上，决定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截取敌军的物资装备。

上午八时光景，一队衣衫褴褛蓬头赤脚的纤夫肩背纤绳逆水而行。渐渐，河面上出现了一吊吊毛排。毛排一进伏击圈，我们立即发起攻击。营里的三位领导人带领战士冲上毛排，冲向岸上押排的敌人。岸上的敌人一经我军袭击，就象惊弓之鸟，纷纷向山上、河里、草丛中溃散逃命。营政委发现前面草丛里闪着刺刀的亮光，知道那里藏有敌人。他一边高喊“捉活的”，一边带领我们冲上去。突然，草丛中射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我们把他抢救下来，送到曹家荒田红军医院时，他的呼吸已经十分困难了。营政委是史河岸边的人，平时行军转战，他总和战士们一起，给大家讲当地的斗争历史，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再困难，他也是有说有笑的。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还鼓励我们坚定信念，战胜敌人，并盼望自己早日伤愈重返战场。但终因缺医少药，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争夺毛排的搏斗中，我们的副营长双目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副营长作战骁勇、身先士卒，与战士们情同手足。我记得很清楚，他离开部队的时候，让我们营部通信班站成一排，将我们一个个从头摸到脚。他的嘴唇哆嗦着，欲语又止。我们深知副营长此刻的心情，他是多么渴望能够再看一眼生死与共的战友，多么难舍与自己骨肉相连的部队！战士们含着热泪说：“副营长，你只管去养伤，不论斗争多么残酷，我们一定坚持下去！”副营长拄着棍子，转身向山上走去，走走停停，一步一回头……。从此，我

再也没有见过副营长了。

敌人使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张国焘的左倾“肃反”路线余毒，也夺去我们不少战友的生命。由于两位营干部的损失，营长竟被无辜怀疑为暗藏的“反革命”，就在这次战斗的第二天，被杀害了。这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和其它一些革命同志，没有倒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却不幸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随着大别山的大雪天来临，红军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敌人对老苏区的“围剿”也加紧了。斗争愈发的残酷了！

一九三五年元月，一个风雪的日子，部队去固始县境打粮，归途中，夜过花园、铁炉冲一带，未能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虽从三义岭突破，但又遭到驻敌的追击。战士们扛着米袋在风雪中飞跑，敌人几十挺步机枪和迫击炮在后边追击。密集的子彈，呼呼地从身边掠过，有的同志不幸中弹，在雪地里倒下。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扛的米袋，等我跑出敌人的射程时，人倒没伤着，可一袋子大米漏得所剩无几了。下午，部队沿着崎岖小道，攀上近一千米高的杨田凹，终于甩掉了追击的敌人。

杨田凹上，风雪茫茫，积雪填平了沟壑，分辨不出哪是路，哪是沟，稍不小心，那就会跌入雪坑，伤员的行动更是艰难。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到一点东西，又冷又饿，再也无法继续前进了。我的战友小李子，过封锁线时腰部负了重伤。途中没有担架，大家硬是把他背上了山，这时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用刺刀掀起一块块冰雪，直到露出黑呼呼的土地，又拾来干柴，点火取暖。我和几位战友蹲坐在小李子的周围，想用自己的身体为他

挡一挡风寒。小李子原是红二十五军的连通讯员，平时不多言语，象个女孩子，可一打起仗来，就好象一只猛虎。在陶家河战斗中，他跟随连指导员坚守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的手榴弹成串地落到我军阵地，小李子和指导员又一个接一个地拣起投回去，在敌群中爆炸。如今，年仅十七岁的小李子，却坐在雪地上、在战友的怀抱中牺牲了！同志们用岩石为他垒起坟墓，向他默默致哀，那漫天风雪和山间的松涛，仿佛和我们一起呼唤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半个月后，我们接到了方永乐同志派手枪队带来省委的信。信中说：红二十五军已经越过平汉路奉命远征豫陕边了。省委指示立即重新组建领导机构，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担负保卫大别山红旗的历史使命。

此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走向了新的一页。

红二十八军崛起

一九三五年元月底，我们离开了熊家河根据地，转战到外线。在太湖县境的凉亭坳，我们与方永乐、徐成基同志率领的鄂东独立团会师了。二月三日重建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担任军政治委员，罗成云同志任八十二师师长（不久在官庄战斗中牺牲），方永乐同志任八十二师政委，熊大海同志任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徐成基同志任二四四团政治委员。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决定转战苏区外线，在霍山、舒城、潜山、太湖、英山等地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开展鄂皖边区的游击战争。这时又值春节，会师的喜悦，建军的欢庆，使这个春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使这个避静的山镇洋溢着战斗的热情。

红二十八军的重新崛起，使得蒋介石大为恼怒。敌人原以为红二十五军一走，就可以“砍尽山上树，挖绝红军根”，那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今又竖起了红二十八军的旗帜。蒋介石先后派了二十余万军队围剿大别山，梦想趁我立足未稳，一举歼灭。这就使红二十八军一诞生，便面临着敌人的“清剿”、“追剿”、“堵剿”和“包剿”，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几次面临全军复没的危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那是一个大风雪天，部队去鄂皖边境鹞落坪开辟游击根据地。一路上，敌二十五路军九十四旅在我后尾跟踪，紧追不舍。我们连忙直奔太阳(地名)，迎头又遭到敌十一路军的堵击。前有拦路之虎，后有跟踪之狼，仰望南边是千仞雪山，俯视北面是万丈深渊。红二十八军近两千名指战员，被近万名敌军围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了，面临着全军复没的严峻考验！

眼前唯一的生路，就是从南面翻越白马尖，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把复没变为胜利！白马尖高达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白雪皑皑。在这种暴风雪的天气里翻越白马尖，难于上青天！但是，已经没有迟疑的时间了。堵、追的敌人渐渐合围，枪炮声也愈加逼近了。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是人的精神力量。

一接到号令，我们后卫营立刻改作先遣队，向雪山突围。可是，山上的积雪没齐膝盖，登攀异常艰难，依托山上的树枝，才能费劲地一步一坑地前进。

上山几百米后，山势更为险峻，登攀也愈发艰难。山高风寒，积雪都冻成了冰，一落脚就打滑，简直无法下脚；伸手去扶树枝，谁知树枝也冻得又干又脆，“咔嚓”一声就断了，人滚出

一两丈远。

部队还未全部上山，敌二十五路军就逼近了。敌人追击的火力，泼水般倾注到雪山上，炸得山崩地裂，积雪飞溅。不少同志负了伤，在战友的搀扶下，忍受伤痛，继续登攀。后卫营的战友，依托山间的岩石和树林，猛烈阻击，掩护部队突围。傍晚时，红军部队突破重围，全部上了白马尖。复没终于变作了胜利！

在山顶上，我们找到一座古庙，遇见一位方丈。方丈生起一堆火，给红军取暖，并告诉我们说，白马尖是大别山最高的山峰，天晴登上主峰，可看到周围好几个县。他对红军冒着暴风雪登上白马尖，表示很大的惊异和钦佩。

一会儿，主峰上响起军部联络的号声，部队很快就聚集起来了。看到战友们身上的硝烟和血迹，回想起刚才突围的情景，许多同志都激动得哭出了声。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们望见敌人还在半山腰的雪地里蠕动，想是敌人仰望着雪山顶上的红军感叹无能为力吧！

不久，在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红军都是英雄汉，
白匪再多千瞪眼。
总有一日天要红，
红军定要坐江山！

我们连夜在冰雪里滑行三十里，翻山到达马家河。在马家河留下了伤病员，又留下了一支便衣队加强掩护，部队就离开了。我们日夜兼程一百五十多里，从马家河到了潜山官庄，准备在潜（山）、舒（城）、霍（山）边界，开辟一块游击根据地。

二月十五日清晨，部队一到官庄，就发现一座地主大庄院，背依岗丘，面向田畈，飞檐高墙，几进屋宇。我们在北边的山上，连晒在后院里的衣裳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山沟里，这样的大庄院，可算很气派了。一打听，原来是伪安徽省代理省长余谊密的老巢。余谊密掌握安徽省财政大权，“剿共”卖力，颇得国民党当局的赏识。这次他从安庆回到官庄过春节，真是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决定抄他的老巢，打这条毒蛇。副营长带领一个连悄悄翻进余家的后院墙，在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余谊密是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胖子，这时正在打着呼噜睡大觉，我们冲向床沿，一把将他拖下了地。余谊密做梦也没想到，被蒋介石早已宣称消灭了的大别山红军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当他明白过来，看清站在面前的就是红军时，一下子瘫倒在地。

在另一间屋子里，余谊密的一个儿子企图开枪反抗，当即被我擒拿。而那些随从爪牙，早已跪地求饶，被我军缴械。我们不费一枪一弹，袭击了余谊密的庄院，生擒了这个伪省长。

在押回军部的路上，余谊密腆着大肚皮，一路呼呼直喘。上山梁时，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见了都暗暗好笑，用枪头点了他一下：“你这次回来干什么？”

余谊密一边喘一边说：“蒋介石讲大别山的红军已经消灭光了，这次回家是想过个太平年的。”

大家听了互递眼色，自豪地大笑起来。

当天下午，我们执行任务归来，正在营地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枪炮声，原来是敌二十五路军从霍山追来了。在五星庙附近的山岗上，经过两个小时激烈的肉搏战，天色已晚，我军便撤出战斗，离开官庄。余谊密这个家伙听到枪炮声，知道是他们的人来

了，顿生幸免之心，喜形于色。见红军要转移，他死乞白赖不肯走。高敬亭同志举起手枪，当场将这个双手血迹斑斑的刽子手击毙在地。

二月十六日，在潜、舒两县交界的地方——骆岭，高敬亭同志主持组建了中共皖西特委，由徐成基同志任特委书记，并兼任二四六团政委。这支部队在潜舒两县交界的地方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不断扩大到方圆二、三百里。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为红军掩护伤病员、扩充兵源、了解敌情以及提供物资装备做了很大的贡献，成为红二十八军的可靠后方。

随方永乐同志转战

官庄战斗之后，红二十八军为开创游击战争的局面，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外线转战。

一九三五年二月，部队转战到了霍山西界岭，便兵分两路：由高敬亭同志率领二营和手枪团一部分，返回赤南、赤城苏区开展活动，我们一营和三营及手枪团一部，跟随方永乐同志辗转游击在鄂皖边境。

方永乐同志是六安苏家埠人，家庭贫寒，少年投身革命。三二年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他作为少共六安县委书记，随军转战到了鄂东，不久担任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坚持那一带的革命斗争。红二十五军一离开大别山，方永乐同志立即奉命带领罗山独立团，转战一个月，来到皖西与我们会师。他任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时，年仅二十岁。

我第一次见到方永乐同志，立刻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生动而又严肃的神态，矮小而又坚实的身驱，粗犷而又沉着的性

格，令人想起大别山上正在生长的斗子树，枝干虽然还稚嫩，却很坚硬、强壮，堪负重荷。战士们都尊重他、信赖他，亲切地称他“小师政委”。

我们就在“小师政委”的率领下，纵横驰骋在鄂皖边境的崇山峻岭中，艰苦奋斗在敌人后方。

二月底，我们从西界岭向英、霍、潜、太边境转战。一出发，敌人就追来了。敌二十五路军增添了十几个团，专门跟踪追击，想一口吞噬我们这支红军部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终日跋山涉水，作战突围，而且缺衣少食，不少战士是打赤脚从雪地里踩出路子的。在团山，部队是杀出敌人的重围，才转危为安的；在中界岭，我们失去了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同志，以血的代价撕开敌人包围圈口子……在这段极端困难的时期里，方永乐同志始终非常坚定、乐观。他有一匹黑骡子，但在行军途中很少骑，总是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地，他常仰面躺在地上，陷入久久地沉思，大家深深感到他肩上担子的份量。

方永乐同志决定返回皖西苏区，寻找高敬亭同志，共商大计。但是，枫树坳的封锁线工事密布，碉堡林立，约有一个旅的驻敌。我们冲了两个晚上，都未冲过封锁线。第三天晚上，方永乐同志率领我们一营和手枪团一部，借助夜色，冲入敌人的工事，展开一场大厮杀，这才越过了封锁线。而三营却被截断了，只得留在霍、太边境，坚持游击战争。

回到皖西苏区的白沙河、胭脂坳一带，所见的尽是“无人区”，部队就在葛家湾的一座破门楼前的瓦砾堆上住下来。葛家湾曾经是个秀丽的山村，青山环抱，竹木参天，几十户人家被掩映在摇曳的绿竹影里。如今村子一片荒芜。一连几天，我们寻遍山

上山下，见不着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点食物。战士们饥肠辘辘，只得挖来野芹菜，支起吊锅煮着吃。

这时候，敌人正在白沙河关王庙集结，寻找红军决战。本来，严寒、饥饿、疲劳已经使人难以忍受，现在敌人又来“围剿”，部队不免滋长了消极情绪。而此刻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小师政委”，却是乐观、镇静、沉着。他没有讲很多鼓舞士气的大道理，但那付泰然的神态，就是无声的动员令。他说：“敌人来了，我们走，大别山的地盘大得很。现在一天不走一百几十里是过不了关的，这就全看我们的两条腿了。”

果然，敌人从北边关王庙方向扑来，方永乐同志带领我们往西边的西河桥方向撤，钻进了深山老林，一下跳到湖北境内，使敌人的“围剿”成为一场徒劳。

在湖北境内，红军袭击了地方反动武装，搞到了一些稻谷。考虑到这一带敌人驻有重兵，不可久留，我们连一顿饭都没吃，只抓了一点咸菜塞进嘴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湖北境内回到白沙河，隐蔽在山林里。在山上，我们望见敌十一路军两个旅正在川下集结，方永乐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抛弃稻谷，轻装转移。当晚由两位地方干部引路，经过几天行军，到了霍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又一次使敌人扑了空。

连续的突围，不停的行军，同志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睡一个好觉。三月二十九日部队在霍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刚一停下，敌十一路军朱团又追来了。看到我们这支队伍能够调动敌人的千军万马，大家都从心坎里钦佩“小师政委”。

方永乐同志决定利用敌人对我军杀回马枪缺乏精神准备，和这里的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自红二十八军成立以

来，一直是敌追我走，杀回马枪这还是头一次。战士们一听，热血都沸腾了，迅速占领了界岭的制高点，隐蔽在山间松林里。专候敌人到来。

敌人的先头部队到达小界岭脚下，一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后来我们知道，敌人发现红军队伍中有一匹黑骡子，曾夸下海口：要活捉方永乐。当敌人后续部队还在行动时，前卫营已被我团团围困在山坡的松林里。红军居高临下，枪弹、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到敌群中，一时间，松林里硝烟弥漫，响遍了敌人的惊呼声。

方永乐同志是个神枪手，一枪能将电线杆上的瓷葫芦打个稀烂，打起仗来，需要一个班为他提供子弹。这时，方永乐同志隐蔽在一颗松树后，对着奔逃的敌人，双枪齐鸣，敌人一个个应声倒下。

这次回马枪杀得漂亮！俘伤毙敌二百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半，步枪一百多支，子弹六千余发。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方永乐同志的指挥才能，挫败了敌人的凶焰。这次战斗后，敌人有一个星期龟缩在窝里，不敢肆意横行，追击红军。

四月九日，高敬亭同志率领二营和二路游击师来到太湖境内，于是，红二十八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重新会合了。原来过封锁线时被截留下的三营，也返回了部队。部队就地进行了一次整编，扩充为四个营（二路游击师编为三营，原三营编为特务营）和手枪团，在鄂皖边境开展了新的斗争，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跟随方永乐政委转战，虽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们在一起踏遍了大别万重山，同“围剿”我们的敌军不知打了多少仗。下

面仅叙述我至今不能忘怀的两次战斗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红军向潜山境内挺进，途中又遭到敌二十五路军九十五旅的追击。这是一支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的死对头，同志们早就想给它一顿狠揍。一连好几天，方永乐同志带领部队不停脚地向北疾行，从蕲州到了潜山县的桃岭。“小师政委”站在桃岭山头上向下一望，觉得这个地形实在好：山高岭险，便于我军阻击；地势狭窄，敌人再多也无用武之地。他和高敬亭同志决定：就让桃岭作敌人的坟场吧！桃岭战斗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方永乐同志的准确判断。敌人在战斗中的行动，也完全是按照方永乐同志的部署就范的。

正如方永乐政委所料，敌二十五路军是一伙骄兵，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先遣部队就想抢头功，发起了冲锋。在我军阻击的弹雨重压下，敌人退回去了。愚蠢的敌人以为这只不过是红军的老一套打法，打一阵就会走的。在喘口气后，便连续发起了冲锋，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但几次都被红军的反冲锋打得落花流水，桃岭上躺满了敌人的一具具尸体。敌人错误地以为方永乐同志布置在正面的阻击部队是红军的主力，听到正面阵地上的火力渐渐减弱了，以为红军的子弹打光了，便集中兵力向山上猛攻。可是山势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都密密地挤在半山腰上，统统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下。忽然，犹如晴天霹雳，桃岭上杀声骤起，方永乐同志指挥主力从两翼杀出来了。正面阵地的红军，持大刀、端刺刀的、举石头的、一齐跃入敌阵。被围在桃岭上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霎时间鬼哭狼嚎，横尸遍地。

方永乐同志亲自指挥、督战的桃岭伏击战，大伤了敌王牌三十二师的元气，打垮三个团，歼灭两个营，毙敌伤敌五百余，还

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傍晚，当敌人的一个团来到桃岭打援时，方永乐同志早已率领我们从容撤离战场，走出十多里地之外了。

尤其值得记述的是斛山铺战斗。这次战斗是红二十八军重建以来的一次空前大捷。它显示了我军娴熟的游击战术和战斗力有了极大提高。作为这次战斗的高级指挥员，方永乐同志从此以他的赫赫威名传扬鄂豫皖，令敌人闻风丧胆。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我军在桐柏山转战一个月，打了很多胜仗，于六月九日越过平汉路，回师鄂豫皖边境。刚刚打了胜仗，部队士气很高。方永乐同志更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时而袒胸露臂，前前后后跑得汗水淋漓；时而骑在小黑骡上，边看着从桐柏山获得的一本苏联红军战斗故事，边讲给战士们听；遇到山溪，部队在岸上走，他在水里行，还踢得水花乱溅。看看“小师政委”带点孩子气的活泼举动，想想三个月前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地上沉思的情景，我心里真宽慰。

六月十三日，部队经罗山、光山到了斛山铺附近，遇到当地驻敌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团的“堵剿”。“小师政委”对大别山地区各式各样的敌军，是了如指掌的。东北军装备精良，但无旺盛的士气，由于家乡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加以我党我军的政治攻势，官兵大都厌战，因此战胜他们还是有把握的。

按照方永乐同志的布置，利用斛山铺一带岗峦起伏、沟壑相间的复杂地形，我军以部分兵力作正面迎击，大队人马从两侧迂回过去，将它拦腰斩断，各个击破。

方永乐同志亲自督战，进入正面阵地。炮声隆隆，一颗接一颗的炮弹落到了阵地上。他神态从容，密切地监视着敌人的动向。敌军一个团成二路纵队，从斛山铺的围寨里倾巢而出了。敌

我双方部队的距离渐渐靠近了。这时候，出现了一番奇妙的景象：一颗颗手榴弹，突然从两侧飞去，在敌群中激起横飞的血肉；一排排刺刀，接连从两侧戳来，在敌群中引起绝望的呼叫。正在行进中的敌人，猝不及防，被我军割成了数段。敌人还未来得及组织反抗，方永乐同志的小号官已经吹响那独特的发颤的号音，“小师政委”带领部队从正面杀进了敌阵，敌人一下子落进了方永乐同志布置的口袋里，左奔右突，无路可逃，任我穿插分割。整个战斗不足三个小时，敌人被我军歼灭两个营，缴获马、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十八挺，迫击炮两门，子弹两万多发，毙、伤、俘敌五百余人，那些侥幸活命的敌人，象退潮一样向斛山铺的圩寨涌去。

斛山铺大捷，充分表明红二十八军经过锻炼已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正规部队，她拥有自己的英勇善战的广大战斗员和出色的指挥员，足以担当起鄂豫皖地区革命战争的重负。作为一个红军指挥员，方永乐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身经百战，功绩卓著，他的事迹被广泛地传颂，鼓舞着广大指战员奋勇战斗。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受伤离开部队到潜山的山林中养伤，心中一直惦记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师首长。后来知道，一九三六年五月，红二十八军被敌人一〇三师围困在麻城县护儿山。方永乐同志为掩护部队突围，英勇牺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年仅二十一岁。

方永乐同志的名字，是与红二十八军连结在一起的，是与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历史连结在一起的。他留在我心中的，永远是那朝气蓬勃，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

大岗岭上的便衣队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除了部队主力辗转游击、牵制和打击敌人而外，还放下了很多便衣队。这些便衣队分布于山地平川，战斗在敌人心脏，相当于半个地方政权，成为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从沙村河便衣队调到了大岗岭便衣队。

大岗岭耸立在潜山、霍山、太湖三县的交界处，群峰环列，山岭逶迤，纵横百十里，这是中共鄂皖特委（何耀榜同志任书记）的所在地，是皖西便衣队的一个中心。过去红军经常活动在这一带，建立过各种群众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以产茯苓著名，群众多以种山地为生，不仅在补充和支援红军、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等方面很踊跃，而且乘运输茯苓到山外之机，常常为红军带回所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及其它生活用品。便衣队活动在大岗岭上，真是如鱼得水，就是赤手空拳独行百里，也安全无恙。

但我到大岗岭不久，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九三七年二月，敌人向鄂豫皖地区发动了所谓“三个月秘密清剿”。当时，已是“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却暗里调遣军队，对南方几省的红军游击队阴谋发动了“秘密清剿”。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的兵力一下增到了二十余万人，扬言三个月内歼灭大别山的红军，而大岗岭是敌人“清剿”的重点地区之一。敌人称大岗岭是“小金家寨”，要“土掘三尺，石头过刀”，一开始就投入三个正规团以及地方民团。这时候，特委带领下属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向马家河

转移了，留下我们这支十多人的便衣队，坚持在大岗岭上。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回春前的严寒时期。敌人的疯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一到大岗岭，就将山上的民房村庄烧个干干净净，男女老少统统被赶进了围寨；在围寨四周筑起碉堡，驻上了重兵。敌人深知红军便衣队与群众是鱼水相依的关系，如今车干了水，正是为了逮鱼。便衣队同赖以生存的群众被隔断了，经常活动的村庄也荡然无存，只能在山沟里树林中栖身。接着敌人成营成连的上山“清剿”，除了使用围网似的搜山惯伎而外，还发明了从山顶滚石头的办法，那大块的石头常常满山滚落，轰隆隆的震天巨响让你觉得好象石头马上就要滚落到头顶上了。

针对险恶的敌情，便衣队决定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分散活动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活动在敌人的空档中，与敌人“捉迷藏”。我们想，这支十多人的小便衣队能够牵制敌人几个团的力量，减轻兄弟地区的压力，就是历尽苦难，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

我和另一个队员组成小组在山上活动。一天，我们经过一座被毁的村庄，正要拐弯，迎面来了一个连的敌人，隐蔽已经来不及，要打又寡不敌众，我俩撒腿就跑。敌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一面打枪，一面狂叫：“逮活的！逮活的！”那位战友十分机敏，跑出了一段山路，便顺山坡一滚，钻进了密林。敌人便集中向我追击了，我见前面有个山梁，一腾身跃了上去，一面开枪反击，一面顺高山悬崖迅跑。这天正是雨后，山水汇成一股瀑布，顺着山梁倾泻而下。我跑到崖缘，抓住了一根葛藤，滑了下去，越过瀑布到了山那边，摆脱了敌人。钻进树林子后，猛抬头见另一个队员在采摘野果子，这样，我就和这位队员在一起活动了。敌人不是挖空心思，想隔断便衣队与群众的联系吗？这是枉费心机

的。就在我们处于艰苦的境况时，当地的干部沈家才、胡三保两位同志冲破敌人阻隔，跑上山来参加了便衣队。由于他俩熟悉地形，更便于我们与敌人周旋了。

一天，我们四五个队员在宝带河山上活动，被敌人发觉。敌人杀气腾腾地向山上扑来，离一二百米远，枪声就响个不绝。我们钻进了树林子里，敌人立刻把树林子包围得水泄不通。林子里雾气弥漫，辨不清方向，摸索了好一会，我们也突不出去。眼看敌人越逼越近，生死就在咫尺之间时，老胡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树林外边的路。过去他熟悉这个地方，革命的责任感使他在危难时保持了镇静的情绪，他带领大家突围了。我们悄悄走出树林，翻过一个山岗，淹没在山林的海洋之中，使得敌人乘兴而来，徒手而归。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生活。粮食早就断了，只能在深更半夜下到山沟煮野菜充饥，或钻进林子采摘果子填肚。有时还从残墙断壁间拣来原吊在屋檐下的玉米锤，揉去被烧焦的黑乎乎的外壳，就生吃下去。那时正当大别山雨季，昼夜都是浑身湿淋淋的，要靠体温焐干衣服。日子一久，一件衣服就烂在身上了。我们就这样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在大岗岭上坚持斗争。

大岗岭的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始终没有忘记在艰苦中斗争的便衣队，设方想法支援我们的斗争。他们冲破敌人的禁锢，趁出围寨干活时，把衣服鞋子脱在山上留给我们穿；他们无米下炊，却把玉米粑粑、蕨根粉送出围寨，放在指定的地方，供便衣队食用。有的乡亲不怕被敌人发现，就是面对屠刀也不低头。这一切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坚持斗争

的精神支柱。

大岗岭下，宝带河边有座靠近围寨的小庄子，住着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他俩原是便衣队的基本群众，他家常是我们聚集、开展活动的地方。自敌人“三个月秘密清剿”后，丈夫不怕风险，坚持上山送信、送粮，后来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支援便衣队的担子就由妻子承担了。这天，我们从他家后山的树林里路过，忽见那位大嫂探身窗外，将几个玉米粑粑从窗口丢下，又向我们挥挥手，那意思我们懂得：东西拿走，赶快离开。可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回到后山上一看，一伙白匪将她的丈夫捆绑在门口树上，正在毒打。我们实在忍不住了，一个个拔出枪要跟白匪干。只因为这里离敌人圩寨太近，寡不敌众，只得忍痛离开。

归途中，我们一路上紧紧攥着手中的玉米粑粑，一个个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对革命夫妻的名子，我回忆不起来了，可是茅屋窗口下的那幕“哑剧”却记得清清楚楚。多少年后，那生动的手势还不时地在我眼前摆动。革命胜利以后，我常常想起，鱼水相依的关系乃是最普通的常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是不是随时都清楚和明确呢？

艰苦的斗争，分散的活动，常常使我们对不在一起的战友牵肠挂肚，十分惦记：他们仍然健在？还是遇到什么不幸？能不能经受考验？会不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总之，我们千方百计也要设法见上一面，交换情况，相互勉励。渐渐的，我们能够见面的战友越来越少了。

因为两位便衣队长久未见面了，一天指导员宋青云同志和我一起去二十里外的山上找他们碰头，陈松林队长、查副队长和漆事务长就掩蔽在深山的一个棚子里。我们从宝带河爬了一路的险

岩，到了那座山脚的一个小庄子，听群众说三位战友一起被捕了。我们顺山上的小路一看，果然尽是皮鞋印子，那是敌人留下的足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山棚子过去是用作掩护伤病员的，地方很隐蔽，而且除了一个为我方办事的伪甲长孙华山外，一般人都不知道。

在那一时期，便衣队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曾争取一些国民党保甲人员。经过指明前途，晓以大义，有的人在提供情报、供给粮食、掩护伤员等方面，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但在革命遇到挫折、斗争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们其中有的就可能成为出卖革命的罪人，三位战友会不会是被伪甲长出卖了？

正在寻思着，传来了一阵枪声，我们知道已经被敌人发现，赶紧钻进树林。天黑后，又爬了一夜的山崖，回到了宝带河。几天后，就在宝带河山上遇见了漆事务长，却不见两位队长，漆事务长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那天下午，伪甲长来到了山棚，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些食物，表示“支援”便衣队。就在这天夜间，当三人睡得正熟的时候，那伪甲长引来了一个排的白匪，包围了山棚，三位战友便被捕了。敌人想要得知特委机关所在地和埋藏枪支弹药的地方，三人坚贞不吐，敌人达不到目的，便在山上挖了个坑，将两位队长活埋了。漆事务长看到两位队长牺牲，强按下心中的悲痛，佯装愿意带路。敌人用绳子将他捆绑，由一个匪兵牵着走，并派一个排的兵力跟在他身后，指望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根本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和胸怀。漆事务长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力大无穷，而且外粗内秀，很有心计。他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头一天他带着敌人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一边在心里想着

计策。第二天他胸有成竹，吃了一顿一升多米的饱餐，然后带着敌人上了一个下面满是密密的树枝和草丛的悬崖。说时迟，那时快，漆事务长一纵身就从崖上跳下去，那个牵绳子的匪兵毫无思想准备，被带落崖边，跌个半死。而漆事务长却挣断手中的绳子，安全地落了地。崖上的敌人急忙开枪，子弹从他的鼻子下面掠过，只擦落了半边胡子……。

漆事务长说：“我虽死里逃生，可是两位队长，却再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说到这里，这位硬汉子便失声痛哭起来。

在粉碎敌人“三个月秘密清剿”的战斗日子里，有多少同志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啊！我们这支十四、五十个人的便衣队，最后只剩下五个同志了。一九三七年八月，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与何耀榜同志在霍山九河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我们和皖西便衣队及中共皖西特委机关、警卫队共二百余人，在太湖（现岳西）土门胡家祠堂集中。

九月底，红二十八军军部发出号召：“国难日亟，凡我民族危亡之际，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请到红安七里坪集合。”我们望着高高的大岗岭，默默地告别英勇牺牲的战友，在徐文初同志的带领下，阔步走向红二十八军的集中地点——红安七里坪。不久，红二十八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离开大别山，奔赴皖东前线，汇入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

（一九八一年五月）

红 军 歌

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鄂豫皖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他们自编、自演、自唱了很多歌曲。这些歌曲语言朴实，感情真挚，起到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战斗作用。下面是陈志愿同志收集整理在当时比较流行的三首歌词。

——编者

《穷人歌》

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
叹只叹，我穷人，缺吃少穿。
三才者，天地人，应该平等，
为什么，贱与贵，贫富不均？
那富人，想人家，良田万顷，
我穷人，衣食住，件件愁心。
他说是，积阴功，坟山所映，
又说是，阳宅好，风水助成。

细思量，追究竟，不是这等！
尽都是，欺骗我，一般穷人，
叫大家，切莫要，被他蒙混，
赶快地，要把那，农会建成。
有红军，赤卫队，并肩前进，
要杀尽，那一些，土豪劣绅。
只要我，穷苦人，坚决革命，
掌大印，一条心，就能翻身。

《劝郎当红军》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劝我郎当红军，
现在革命高潮起，切莫留恋在家庭。
二月里来是阳春，当了红军莫担心，
跟着红军打天下，家中事务我担承。
三月里来是清明，我送我郎当红军，
轻轻送到大门外，慢慢转回程。
四月里来四月八，我郎写信转回家，
红军里面多亲爱，不比那军阀。
五月里来是端阳，孝感花园打一仗，
得到四门迫击炮，还有八架机关枪。
六月里来六月六，转移战场上征途，
不忘白匪还乡罪，杀敌报怨仇。
七月里来七月半，我郎杀敌得凯旋，
笑谈敌人豆腐渣，那经红军来冲杀。

八月里来桂花开，我乡成立苏维埃，
工农兵商代表会，全是穷人的世界。
九月里来是重阳，我郎游击离家乡，
男女老少齐相送，掐把菊花送我郎。
十月里来秋风凉，捎封家信给我郎，
家中诸事儿顺昌，一天更比一天强。
冬月里来大雪飘，军民奋起反“围剿”，
首先占领黄安城，活捉赵冠英。
腊月里来过新年，我郎战斗在前线，
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卫穷人过团圆。

《送郎当红军》

早起开彩门，红日自东升。
今日送郎当红军，夫妻都光荣。
反动军阀太毒狠，一定把它消灭尽，
全靠我们青年人。
丈夫身强力又壮，正是出力好时光，
不要留恋在家庭。
公婆还年健，田地有人耕，
家中事务我担承，你切莫挂在心。
对待兵友们，彼此要相亲，
大家都平等，如同一娘生。
爱护老百姓，是你的本分，
处处注意到，牢牢记在心。

行军多艰苦，莫做落伍人，
红军皆兄弟，相互多照应。
军纪重于山，时时要遵行，
努力学打仗，刻苦练本领，
勇往战场上，冲锋杀敌人。
今日送郎当红军，夫妻都光荣。
丈夫身强力又壮，正是出力好时光。
不要留恋在家庭。

在杭州国民党监狱里

徐 迈 进

(全国政协常委)

—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我在团中央工作。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同志约我去上海虹口公园谈话。他告诉我，因为前一时期浙江的党、团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团中央决定派我去浙江工作。他让我协同谢仲怀同志一起工作，并且说谢已去杭州筹建中心市委，待中心市委站住脚之后，再把杭州周围各县的组织恢复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后，于六月底到杭州。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找到了一些同志，开了几次会，中心市委建立起来了。谢仲怀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还有一个姓宣的同志任宣传部长。这时，谢仲怀同志准备到上海去向团中央汇报工作。于是我们商定，等谢仲怀同志从上海回来后，向大家传达“六大”文件，开展下一步工作。

当时，团中央给杭州中心市委的信都寄到浙江大学工学院，由谢仲怀同志亲自去取。他七月底临走时，把这件事交待给

我，并且让我一起到浙大工学院取信，以便认路。谁知道，这次国民党特务已经守在收发室了。我刚刚把信拿到手，就被特务抓住了，说是请我到侦缉科去谈谈。同时，特务让谢也一块儿去。

一路上，我跟特务一再讲，我不认识谢，我是受朋友之托去拿信的。实际上是在串供，以使谢能够脱身。

到了侦缉队，天已经快黑了。特务把我们俩关在一个铁笼子里，我悄悄地跟谢讲：“我是跑不了啦，你是本地人，可以一口咬定不认识我。你就说去浙大工学院找同乡的。以下的事情由我来应付。这样，也许他们会放了你。”

晚上，省政府侦缉科一个姓何的科长带着一个人来审问我了。他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我就将已经编好了的口供说了一遍：“你们是因为我取信抓我的，可是我并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信是一个朋友托我拿的，他叫张华。我从上海到杭州来参观西湖博览会，在博览会上碰上了张华，他说因为走不开，央我帮他到工学院拿一下信。然后约好晚上在西湖边上交给他。”

姓何的摇头表示不信，说：“你们的党中央在号召你们武装保卫苏联呢。”我一听，知道糟了，敌人连以前党中央给我们的指示都掌握了，肯定是脱身不了啦。后来，我才晓得他们是在搞邮电检查时，截获了我们前一封信。接下去，姓何的继续问我：“这封信的内容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中央不中央的。”他说：“这封信是你们团中央指示杭州中心市委如何工作的。”然后，姓何的又问到谢仲怀，我仍然回答不认识他，我说：“我看到他跟在我后面一起去收发室，我还以为是学校里的学生呢。”

姓何的见问不出什么来，就给我上刑了。那天晚上坐了四次老虎凳。我回到笼子里时，腿也瘸了。后来，他们又把谢叫了出

去。谢去后就没有回到我这笼子里来。

过了两个星期，我被关进了浙江陆军监狱，开始了囚徒的生活。

二

陆军监狱有甲、乙、丙三个监房。一个监房有十几个笼子。我被送进了乙监。笼子的门刚刚关上，就听得旁边的笼子有人在敲墙，接着，那边问道：“来了‘白饭’还是‘黄饭’？”笼子里的人回答：“是‘白饭’。”这一问一答使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看看同笼子的人，都不象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在城市参加地下工作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因此，我确认他们都是一般犯人。这时，有人过来问我是什么原因进监狱的。我将被捕的经过说了一遍。同笼子的人都说我是“政治犯”。我趁此机会问他们，什么叫“白饭”、什么叫“黄饭”？有人回答我说：“‘白饭’是指你们政治犯，‘黄饭’是指我们普通犯。在这里，每个月你只要拿出三元钱，就可以吃包饭。包饭是白米饭，还有鱼有肉吃，连喝的水都是清的西湖水。有些政治犯家里经常寄钱给他们。因此，他们大多都吃包饭。我们这些普通犯，吃的就不一样了，饭是黄的，菜是臭的，烂的，喝的水也是混浊的。所以，我们把政治犯们叫‘白饭’，把普通犯叫‘黄饭’。”

我听了后，觉得政治犯这样做在普通犯中的影响很坏。那些普通犯多数是军事犯（即逃兵），还有些盗匪，家里都很穷，根本无力去吃包饭。这样就造成政治犯与普通犯之间的隔阂。

到了开饭的时候，我一看送来的饭果真很差，是黄黄的地脚米煮的，里头有砂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大家叫这饭

是“五子饭。”菜也很差，不但没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了没人要的烂菜。

正吃着饭，有一个人跑到窗口来找我了。周围人告诉我：“他是医生，也是政治犯。”医生问我：“你是怎样进来的？”还说他是从看守那里打听到我是刚从外面来的。我因为不认识他，生怕他是监狱当局派来套口供的。于是，将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假口供又说了一遍。医生等我说完后，去拿了一搪瓷缸子白饭来给我吃，但我拒绝了。

后来，我慢慢地了解到这个医生名叫王屏周，关在监房旁边的一个了望台里。因为监狱当局让他给犯人看病，他可以三个监房到处走。我关进乙监的消息，就是通过他传到另外两个监房去的。

过了几天，丙监有个一九二七年被捕的政治犯托王屏周医生带条子给我，问我有没有带钱进来，如有钱可以交给看守吃包饭；若没有钱，可以由他代付。我没有回条子给他。我还是那个思想，觉得吃包饭不好。

关久了，我发现政治犯除了饮食上特殊之外，在放风上也特殊。监狱里一般是下午给犯人放风，而政治犯上午也可以在铁门里自由行动、还可以随便给家里人写信和随时理发。

我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来月后，法院就给我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宣判之后，我没有上诉。因有些同志跟我说，上诉也没用。现在想起来，放弃上诉斗争是不对的。实际上是默认了法院的判决。

三

陆军监狱的监房一般十一、二平方米左右，住六、七个人，

前面一个门，后面一扇铁窗。门上有个小窟窿，叫检视洞，看守可以从洞里观察笼子里的动静，饭、菜都从检视洞递进来。在陆军监狱里，一天两顿都是米饭。每人发给一双筷子，两只洋铁碗。一天只让打两次开水。睡觉就睡在地板上。杭州有家的，家里可以送衣服来，每两星期可与家人见面一次。监房里的卫生条件很差，跳蚤很多，还有虱子。夏天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因此，犯人普遍都有病，较常见的是肠胃病，这是因为伙食不好引起的。另外比较常见的病是脚气病，浮肿病，同样是缺乏维生素乙的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肺病，发病率也挺高。监狱当局根本不拿犯人身体的事，所以很多犯人往往是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变成了重病，得了重病往病监一送了之，好多人最终结局就是死在病监里。总之，犯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恶劣的。

我能够更多地了解监狱里的情况，是在放风时碰到了朱玉生同志之后。他是个印刷工人，原是江苏团省委委员，我们在一起工作过。经过朱玉生同志的介绍，我才知道丙监政治犯比较多而且集中，甲监有几个笼子有政治犯，乙监政治犯很少。通过朱玉生同志，我又认识了同监房的黄祥生同志，他是浙江织绸厂的工人。参加过“六大”。后来又逐渐认识了一批政治犯。政治犯之间的联系，一是在放风的时候，二是通过王屏周同志带条子。

四

政治犯在互相联系中，大家感到不能老是这样无所作为地生活下去，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在狱中开展一些活动。

监狱里关着的犯人有的已经判决了，有的还没判决。我们帮

助没有判决的写辩诉状，这也是一种斗争。另外，我们加紧自己的学习。

陆军监狱当时规定，犯人的家属可以送东西进来，犯人的家在外地的还可以寄来。家属送给犯人的钱不交本人，监狱当局写个摺子给你。衣服之类的东西是交给本人的。外面送来的东西有时是用旧报纸包的，碰上马虎一点的看守，可以连报纸一起带进来。在与世隔绝的监狱生活中，我们拿到那些残缺不全的报纸，比得到什么宝贝都高兴，大家轮流着看，一个字都舍不得漏掉。看完后，大家一起分析外面的形势。但靠那些残缺不全、数量又少的报纸毕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它满足不了大家渴望了解外面情况的心情。因为我是新关进去的，开始，每到放风的时候，就讲讲我在上海时知道的一些情况。但是，讲完了怎么办呢？最好是能有报纸、有书，使得监狱里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那时候，监狱里只有佛经之类的书。于是，我们打起看守的主意来了，因为看守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许多是为生计所迫，经熟人介绍到里边来混口饭吃的。在旧社会，一般人认为看守这个职业是卑贱的，都把看守称为“牢头禁子”。正直的人不在走投无路时是不干这种行当的。那些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出身的看守，待犯人一般比较好。当然，压迫虐待犯人的也有，但很少。因此，我们尽量搞好同态度较好的看守的关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使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后来，这个工作成功了。于是，就托他们到外面买报纸，买笔、墨、纸，他们都帮助干。当然，他们是要报酬的，而且相当高，弄一张报纸要一元到三元钱。以后，我们又设法叫外面的亲友买书，交看守带进来。慢慢地，监狱里面的书就多起来了。我记得我们弄到的有

如下一些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邓初民著的《政治学大纲》，国民党民智书局出版的蔡和森同志的《社会发展史》和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合著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苏联的金果尔·卜利果仁著的《西方革命史》。还有一些文艺书籍：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铁流》、《毁灭》。这些书都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另外，还通过一些公开的渠道，比如邮购等办法弄点书进来，上面提到的民智书局的书就是公开送进来的，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英文版的《三民主义》都是这样弄到的。

书报弄进来了，但有的不能公开看。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把书拆开，分成一小本一小本的，大家可以分头传看，一是解决书少的矛盾，二是缩小目标。监狱里经常要抄号子，我们就把书藏到地板下面去。弄到报纸，就压缩文字写在练习本上，大家传着看。

可是书毕竟太少了，不能人人有书看。我们又想法子搞了点文化娱乐活动——下棋、打麻将。棋子和麻将都是自己做的。拿剩下的米饭捏成一块块，待干了后，写上字或涂上颜色，就可以做成象棋、围棋。棋盘干脆在地板上用刀划。刀也是自己做，罐头壳磨一磨就是刀。用牙刷柄锉断了磨光了做麻将，麻将要刻字怎么办呢？针药里的锉刀当刻刀。当时，搜集了全监房的牙刷柄好不容易做成一副麻将，大家很珍惜，生怕被监狱当局收去，每次打麻将都派人在检视洞口放哨。在笼子里放哨视野不宽，就在一块玻璃片背后涂上墨当反光镜。只要看守在过道上一出现，就能发觉。

五

上面说过，陆军监狱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政治犯在放风时常常谈到生活问题，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家都会最终死在监狱里。为了维护生命与健康，开始酝酿一场争生存的斗争。当时犯人没有组织，政治犯与普通犯之间因为“白饭”、“黄饭”之别一直有隔阂，可是斗争是需要联合一致行动的。经过大家商量，觉得可以发起一次要折子买东西的斗争。因为这个问题牵涉不少政治犯和普通犯的利益，斗争容易发动。抓进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的钱都被抄去了，留了折子给本人，说是要买什么东西随时可以用折子上的钱去买。实际上，监狱当局把这些钱拿去做生意了。我进去时，听他们讲，好久不让买东西了。大家都很不满。于是，我们利用放风的时候同大家商量，约定了一个时间，全监狱一起行动。

某一天，看守刚上班，有一个笼子先行动起来，对看守说要求发折子买东西。开始，看守们不理。政治犯就对看守讲，请看守长来。这时，全监狱都骚动起来，要求发折子，要求看守长来面谈。看守们这时就将看守长叫来了。看守长进来后，大家嚷嚷着非要发折子不可。看守长一看形势不对，就向二科长（管理科长）去反映。后来，折子发下来了，大家都填写了去买东西。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次胜利不仅给政治犯以鼓舞，对普通犯也是一次教育。大家都感到在监狱里只有一起联合斗争才有出路。这场斗争，也使我们政治犯与普通犯的关系搞好了，政治犯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改变了。那些普通犯觉得政治犯为大家讲

话、为大家办事。

发折子的斗争胜利了，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囚犯们的生活状况，而且并不是每个犯人都得到利益，因为不少犯人很穷，根本没有折子。因此，政治犯们商量，准备搞一次有组织的、规模更大的斗争，而且这场斗争要使每一个犯人都能参加。为了检阅一下狱中的力量，我们政治犯商量好，准备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二周年的时候，举行一次纪念示威活动。

监狱附近有个造币厂，每天上下班都拉汽笛。十二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造币厂汽笛一响，每个监房都有个政治犯站在笼子里大声讲广州暴动的意义。讲完后，三个监房一起唱起了《国际歌》。不但政治犯唱，普通犯也唱（政治犯教会的），声势十分浩大。这时，敌人非常慌张，把监房的铁门也关上了。看守长跑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我们回答：“今天是广暴二周年，我们纪念广暴。”看守长打开监狱门叫大家出去，我们都不理他，就是不出去。本来我们考虑好，如果敌人来干涉，唱一段《国际歌》就结束了。那天，除了看守长叫嚷了几声外，敌人也没更多的行动，我们将《国际歌》三段都唱完了。这一次示威行动在犯人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六

为了使斗争有领导，我们开始在监狱里酝酿建立组织。可是，被捕后与外面党组织的联系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先组织起来。鉴于白区工作的惯例和监狱的条件，往往是先组织起来，再取得组织联系，争取上级认可，这是允许的。于是，我们

就开始在政治犯中进行秘密联络，先找那些被捕后没有动摇、在斗争中坚决的政治犯谈。对以前几次斗争采取旁观态度的政治犯暂时不找他们，以防万一。另外还通过在外面一道工作过的人建立关系。比如我认识朱玉生同志，再通过他联系一些他认识的人。政治犯中既有党员，也有团员，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党团员合在一个组织里了。

在酝酿建立组织的同时，我们开始布置下一步的斗争了。这次斗争与所有的犯人都有关系，我们抓的是伙食问题。根据我们从看守中了解的情况，知道典狱长病重，快要死了。直接管犯人的二科长早就觊觎着典狱长的位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闹起来，二科长一定不敢来硬的，因为弄不好就会被上司认为管理无方而失去晋升典狱长的机会。我们抓住这个好时机，对斗争作了部署。

一天，监狱里开饭了。每个笼子突然都到检视洞口向看守“报告”，说这饭和菜太坏，实在不能吃。看守长立即将犯人的意见向上反映了。到了下午，二科长点名叫一些犯人去他那儿谈话，我也去了。二科长软硬兼施想把我们的斗争压下去。他先是说监狱里的情况，典狱长病了，大家都不要闹。并且说有的事情他也作不了主，得慢慢想办法，叫我们回去跟大家说清楚。他没有明确答应今后不吃坏的饭菜。我们说，你这样讲，至少要让每个笼子都派人来听听，然后回去可以向大家讲，跟我们这几个讲有什么用。给了二科长一点压力之后，我们又暗示，再不改善伙食就要拒绝吃饭了。二科长一听就慌了，要我们给他三天时间就解决伙食问题。我们同意了。过了三天，果然饭稍好了一点，菜也干净了，菜里面还放了一点油。

七

我们取得了这个胜利后，又酝酿下一步的斗争。我们商量了十大要求。准备向监狱当局提出来。

这十大要求的内容大概是（因时隔近五十年，记不太清楚，可能有出入。）：

一、进一步改善伙食：要吃白米饭，菜里要有油，要经常吃豆腐，逢年过节要吃肉，要喝西湖水；

二、反对打骂；

三、反对用手铐、脚镣；

四、定时放风；

五、没有衣服穿的人要发衣服；

六、定时与家人通信；

七、允许买笔墨纸张；

八、定时理发、洗澡；

九、允许买书；

十、经常洗衣服。

商量好“十大要求”，正在考虑如何向监狱当局提出时，我们得到消息，老典狱长死了。二科长想接替典狱长位置也没有如愿，上头另派了一个姓陆的人来当典狱长。这个人以前是唱“滩簧”的，故人们称他为“陆滩簧”。他信佛教，不属于特务系统的。我们考虑结果，决定进行合法斗争，打了个报告送上去。三个监房的犯人分写三个报告，集体在报告上签名。报告写好后，请一个姓董的老看守代为送上去。这里，一切都靠看守帮

助，这也是我们对看守做工作的成果。

“十大要求”送上去后，典狱长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反而到监狱里来了。他叫看守长喊几个人出去，他要谈话。我们不出去，并且告诉看守长，要谈话大家一起谈，让他把各个笼子的门打开，大家的意见可以同典狱长当面说。后来，监狱当局按照我们的要求把笼子门打开，但把监房口的铁门关了。经过同典狱长谈话，典狱长同意了我们的“十大要求”。他说：“你们的要求可以答应，但有些事情一下子来不及做，你们要给我时间。”后来，“十大要求”陆续都办到了。我记得，当天下午就给政治犯发了笔墨。

八

这次斗争以后，政治犯与普通犯之间的隔阂消除了。不久，我们成立了特别支部，下面按每个监房设立小组。支委和小组长都是大家推举的。支委三个人，都在同一监房里，我任支部书记，裘古怀同志任宣传委员，邹子侃同志任组织委员。支部吸收参加活动的都是斗争坚决的政治犯，那些旁观的、动摇的政治犯一概不要。支部和党小组的联系在放风时进行，而不放风的日子，由王屏周医生联系。后来，有一部分犯人去做“外役”，有的就给我们当“交通”。为了安全起见，支部内的联络工作都用密语。为此，我们专门编了一部密语字典，将常用的许多政治术语，都用生活语言代替，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如外面的上级党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等等。这样，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政治犯中有党的组织。

支部成立前，在改善伙食的斗争中，我从乙监调到甲监。这

时,我写了一首《囚徒歌》,并谱了曲,传到犯人中,大家都喜欢这个歌。除了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之外,《囚徒歌》也是犯人们经常唱的。后来,《囚徒歌》越传越广,一直传到江苏、安徽的监狱里。

《囚徒歌》的歌词是: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俘来,
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俘来。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凭它怎么样虐待,
热血依旧在沸腾,
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
锁得住自由的身,
锁不住革命的精神!

死的虽然牺牲了,
活的依旧在战斗。
黄饭和臭菜,蚊蝇和蚤虱,
瘦得了我们的肉,
瘦不了我们的骨。

失败是成功之母,
胜利终归我们所有。

努力呵锻炼！
勇敢呵奋斗！
总有一天那红旗，
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九

特别支部建立后，我们就积极开展工作。当然，监狱里的工作、斗争方式都应该与外面的不同。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照妖镜”，“监狱是革命者的锻炼所，不是格斗场。”列宁的前一句话“监狱是革命者的照妖镜”是比较明白的。那么，后一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当然认为，监狱是“锻炼所”，就要求我们在监狱里要坚持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又不能搞过头，在监狱里要搞推翻国民党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列宁说的不能变监狱为“格斗场”的意思。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特别支部订出了监狱斗争的方针。那时候，也有一些政治犯站在另一个极端，反对在监狱里搞合法斗争，要把监狱变为“休养所”，这种认识我们是不同意的。

监狱中的锻炼，一方面是提高政治觉悟；另一方面是保持身体健康。政治方面的锻炼就是要加强学习，上面说过，我们在监狱里弄到了一部分书，用这部分书来学习。我和黄祥生同志还凭记忆整理出一份文字的“六大”会议精神，供大家学习。另外，反压迫、反虐待的斗争还要继续搞。我们的方针是“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等待外面革命力量的发展，把监狱大门打开，重归革命队伍。身体的锻炼也是重要的，大家在这方面想了不少办法。跳

蚤、虱子多，就勤捉。采取轮流值班的办法，搞笼子内的清洁卫生。不放风时，做做徒手操、八段锦。放风时，利用井边晒衣服的铁丝作为网，用棉花做排球，一起打排球。

特别支部比较注意启发一般群众的觉悟，争取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和我们站到一起。其方法是通过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普通犯大多不识字，我们就编教科书给他们上课，既学文化，又启发阶级觉悟。教科书主要是裘古怀同志编的，先编了三本。我记得第一课内容是：“汽笛响了，大家起来，上早操，锻炼身体。”对有一点文化水平的普通犯，我们还教他们历史，通过教历史来进行政治教育。

特别支部还编了两个刊物，一个是政治犯自己的，刊名叫《火花》（Искра），刊登一些学习心得，还曾经摘登了一些“六大”精神。这个刊物开头在支部范围内传阅，后来扩大到政治犯。给群众看的刊物叫《洋铁碗》，上面简单地写一些短文，以进行政治教育。

十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外面的组织和我们联系上了，并且指定我任书记，追认我们的党支部为特别支部。外面的组织这次和我们联系上，是一个叫周金水的青年军事犯起的桥梁作用。周是诸暨人，他在监狱里学习很积极，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教育，历次斗争都很坚决，多次向我们流露出要参加革命队伍的想法。后来，他期满释放了。我们来不及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在他临走时，只是告诉他用什么途径能找到组织。周金水出去后，按照我们提

供的线索找到了组织，把我们狱中的斗争情况向组织作了反映（他不知道监狱里已有特别支部了）。不久，他就入了党。周金水在监狱里与看守、伙房的人关系搞得很熟，其中有个给犯人分菜的老头老王，与周是同乡，他们之间关系更密切。周出去后，还跟老王保持着联系。周金水跟组织接上头后，他跟老王说，他很怀念我，因为我在监狱里待他很好，央求老王带封信给我。实际上，他是想通过老王打通与我联系的渠道。老王觉得带信给我这件事不好办。周金水让他用油纸把信包上，分菜时放在我的菜碗里就可以了。老王照办了。周金水的信我很快就收到了，这是一封一般的来信，表示关心之后问我需要什么。只是在信的最后写着以后有朋友给我来信。我明白他找到组织了。没隔多久，组织上给我来了第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央巡视员竺兰芳写的，要我们在狱中组织起来，政治犯中可成立特别支部，指定我为书记，要我们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的教育。

到了春夏之交，外面又来了指示，要我们配合外面的土地革命斗争，在监狱里进行若干斗争。现在看来这是立三路线。这是为斗争而斗争，结果一次次的斗争都失败了。只好运用最后的手段——绝食。这种搞法弄到后来一部分政治犯都不愿参加了。

有一次，斗争遭到了监狱当局的镇压。五月十二日，监狱里的教悔师来监房，他说了半天话我们都不理他。教悔师就去把军法处长叫来了。这时，有的政治犯就向军法处长提出要求发书，对军法处长提这种要求是很不策略的，我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军法处长把提要求的人拉出去打了一顿，因为监狱当局打人。我们绝食了。这次绝食在局部说来虽然没失败，拿到了一些书。但从全局看是失败了，我们失去了看守们的同情，他们认为我们政治

犯在胡闹，不讲道理。本来，好的看守能让我不放风时到其它笼子去活动，这时也不行了，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困难。慢慢地，原已答应的“十大要求”也缩减了。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派了一个特务打进监房里来。他一进来，我们跟他一谈，就知道是冒牌的政治犯。派这个特务进来看守长是知道的。我们的政治犯经常故意同这个特务制造一点小磨擦，同他吵架，打他。看守长见此状况，只能换监房。到了别的监房，政治犯又采取打架的办法轰他出去。最后，他换到我的笼子里来了。我们就想，老用打架的办法也不解决问题，能不能瓦解他呢？他是诸暨人，我们笼子里也有一、二个诸暨人。他跟诸暨老乡睡在一起。我们利用同乡关系，派诸暨的同志对他进行攻心。开始，我们跟他谈，问他怎么进来的，他支吾其事说不清。后来，他说出了监狱当局派他来侦察我们的真情，他觉得上当了。我们的诸暨同志对他讲，你年纪轻轻的什么事不能做，去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你可以将这里的情况如实报告上去（他一来，我们任何活动都停止了），我们都规规矩矩在坐牢嘛。过不久，监狱当局见他捞不到情报，把他调走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三〇年夏天，外面党组织又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越狱。可是，在指示中没说到浙江的条件如何？我们越狱后又该怎么办？我接到指示后，觉得很难办。当时的情况是，陆军监狱有六、七道铁门，每一道门都架有机枪，警备力量很强。而我们手无寸铁，越狱将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支委讨论这个指示时，我跟裘古怀同志认为这样搞不行，邹子侃同志比我还年青，他同意这么干。支委内部有两种意见。邹子侃同志提出来，能不能下达到小组征求小组长意见。最后，意见收集拢来，不主张搞的是多数。我们就将意见写了报告

送出去。可是一直没回音。后来知道竺兰芳同志也被捕关进来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党领导“左倾”，下令攻打长沙。国民党就用残酷屠杀政治犯来进行报复。他们先搞了个军法会审，一共审了两批人。第一批十九人，第二批四十人，我在其中。凡是刑期重的，如十年以上的，无期徒刑，死刑（正在上诉中）的，以及在反省院被认为是捣蛋而转押到陆军监狱来的，都受审了。

第一批十九个同志在八月二十七日全部被枪杀了。那天一清早，气氛就不对，马桶不倒了，开水也不送了。突然，听到监房的东南角上传来了劈毛竹般的声音。与我同笼子的杨成同志搞过军事工作。他说这是枪声。我们意识到，敌人在屠杀了。过了一会儿，监房里有人喊口号了：“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枪声在东南角上一阵一阵地响着……。

我是第二批会审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攻打长沙失败，经毛主席纠正了“取得一省及数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我们第二批人的命才留了下来。当时我们不知道敌人为什么要屠杀政治犯。在那种情况下，特别支部的活动只能更加谨慎了。

到了冬天，敌人把我们政治犯分散了，一部分移到东监。我也是去东监的政治犯中的一个。大部分政治犯和我们党支部的成员都留在甲、丙两监。裘古怀同志在“八·二七”惨案中牺牲了，支委还没来得及补上一个人，我就把支书的职务交给了留在甲监的邹子侃同志。

（一九七九年十月）

地下航道续记

曹 达

本刊第六期刊载的《地下航道》一文，最后讲到曹达同志离开上海，乘飞机去香港，开始了新的斗争。后来怎样呢？作者追忆往事，写了续记。

——编者

到仁川开辟新“航道”

一九四七年九月，正当秋高气爽，蟹壮菊黄之时，我被国民党特务追踪，情况险恶，不能在上海再呆下去了，奉命去香港暂避。抵港后，万景光同志安排我住在他亲戚陈荣生所开的荣记进出口商行内。该行位于海滨干诺道八十九号四楼，这里是商行集中的地区，比较热闹。我一日三餐，吃在该行，晚上搭铺睡觉。老万原与行主谈妥，在该行设置四人写字台一张，供通讯联络之用。我无事可做，又不能随意外出，只好看看书，在这张写字台上消磨了半年时光。

后来，上海地下党很多同志到了香港，刘晓、刘长胜等负责同志先后到港主持工作。我除与张执一同志见过面，随同他到澳

门外海和广州观音山游览外，与刘晓、刘长胜同志没有见面。一九四八年春，刘晓同志要老万通知我，说最近因局势关系，上海来港的同志较多，开支浩大，叫我设法做生意赚点钱来补贴。我在港人地生疏，平日仅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驻港办事处有些接触，对刘晓同志交给的任务，感到一无资金，二无门路，一时无从下手，甚为焦虑。

过了几天，我听荣记行的经理说，香港商情不佳，物价看跌，银根很紧，他存有大量烧碱销不出去，汇票到期无法支付，颇伤脑筋。我知道当时上海烧碱很缺，无法进口，听了这话，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恰好这时中福会和工合驻港办事处决定结束，准备将存港物资全部运往上海，在申请上海进口证件时，吨位尚有多余，我即商请他们将荣记行的烧碱数十桶装船，一同启运。这批烧碱运到上海后，按市价结算，除归还原本外，赚了港币贰万元，完成了刘晓同志交给的任务。

此后不久，有一天，万景光很严肃地对我说，在香港的干部有一部分要到北方解放区去，但经过内地水陆交通均不安全，组织上决定要我从香港乘海轮去南朝鲜仁川港，在那里设立秘密联络站，然后设法从仁川乘小渔轮或帆船，穿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线，偷渡公海，进入东北大连（当时由苏军控制）或胶东石岛解放区，开辟一条新的地下航道。休息已久的老兵，又要开始战斗了，我感到非常兴奋，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由香港去仁川只有货运，没有客运，行驶这条航线的英商太友洋行的货轮“湖南”号，每两星期开一次，非有特殊关系，不搭乘客。而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派往哈尔滨参加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韩武成和欧阳祖润两同志，在港亟待启

程。我和老万商量，决定乘下班湖南轮动身，由他设法购买船票，同时考虑到我们一行人中，没有一个懂朝鲜语的，我的日语也很不行，结果找到了一位懂日语的陈秋生同志，他曾经做过高丽参生意，到过汉城，在开城还有过去业务上的关系。于是我和他作为商行派到南朝鲜采办高丽参的人员，韩和欧阳两位也作为贩卖人参的商人，一同出发。临行前，组织上要我利用一切关系，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我们上船后，先由船员将我们藏在夹舱里，以免被海关人员查出来。等到轮船出港，我们一行人才出夹舱（这叫“作黄鱼”），然后由船员分配我和老陈与其他商人共住一舱，韩和欧阳与船员同舱，彼此尽量避免接触。船在海上航行，历时四天，除吃饭睡觉外，大家经常在甲板上散步。我慢慢在船员和乘客中活动，得悉船上乘客只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几位朝鲜人，他们都是货主，随货去仁川的。通过货主关系搭船的，只有我们四人，情况特殊。

为了开展工作，我在同船商人中“交朋友”，和他们打麻将牌、聊天，了解情况。商人中有吴汉民、吴惕民两兄弟，崇明县堡镇人，原是该镇南杂货店店员，抗日战争开始，曾和苏北新四军做过交易，因此谈起来比较坦率、投机。据他们说，抗战初期，有一年夏天，崇明岛外刮大风，有只北方帆船，装载大批夏布，飘泊到崇明，货主山东人丁某，是从山东烟台往朝鲜经商的。此人在崇明上岸后与吴氏兄弟相识，结为朋友。一九四七年初，丁某开始在仁川经商，与解放区进行贸易，邀吴氏兄弟参加。还说，这次湖南轮所装货物，大部分是转运去山东石岛的，也有去东北大连解放区的。这样，我进一步对他们表示亲热，并要求他们

对我们上岸入境、居住旅店、探亲访友等问题给予帮助，他们满口答应。后来，吴惕民还告诉我，同船有一人是旅朝国民党伪国大代表，在仁川开设中国商行代理店，一般行商很少委托该行代理业务。既是同船，总要敷衍一下，我被吴拉去同他打了一场牌。四天时间就这样消磨过去，但收获不小。船抵仁川，停泊在港口外，因未得当地海关同意，不能进港。此时，吴汉民因有事急于在口外下船，吴氏兄弟向我建议，由他带韩武成、欧阳祖润两人一同偷渡上岸。我与陈秋生则由吴惕民担保，领得登陆证。我们四人先后登陆，经吴惕民介绍后，住在仁川涌胜和代理店，他们忙于报关提货，办理转运手续。

初到仁川，满目异国风光，市面繁荣，男女老少一律穿着白色夏布衣服，走路时大都头上顶着东西，往来频繁。他们睡的是“塌塌米”，这也是当地的风俗吧。旅居这里的中国同胞很多，有的开设商行，代客转运货物；有的开设菜馆，生意都很兴隆。次日，我问吴惕民，他们的货物何日偷运去石岛，他说由于提货、报关、雇船等一系列工作事先没有准备，暂时还不能去石岛。但韩与欧阳急于起程，于是他答应我，一有小渔轮去石岛便通知我，要我随时做好准备，说走就走。当天上午在仁川，大家洗了澡，将衣服交给洗衣店去洗，打算第二天去汉城。结果，当天下午即得到通知，有一只货船去胶东。韩和欧阳当即一齐下码头，上了小舢板，躲在舱内，装作游览，逐渐摇到停泊在港口的一只木帆船边。韩、欧阳两人上了木帆船后，即被藏进货舱“作黄鱼”，俟港口检查后，直驶石岛。他们安抵后，经解放区党组织协助，输送到大连，然后乘汽车到丹东，经通化至吉林，再乘火车去哈尔滨，赶上了六届劳大的会期。

韩和欧阳离开仁川后，我即电告香港老万，请其继续组织前去解放区的同志来仁川。后来又来了两批，一批是周明等同志，安全到达石岛。另一批是胡愈之、沈兹九等同志，是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我亲自护送出仁川港，搭上小渔轮去大连。至此，我在仁川输送干部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从仁川乘小渔轮去石岛，进入解放区。刚巧济南城解放，我即进城找到徐雪寒同志联系工作，复经仁川回返香港。

开办张利记船务行

我在离沪去香港“避难”之前，张执一同志向我布置了三项任务，其中之一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买一条装备有自卫武器的机帆船，准备开航长江中游的黄石港，打通新四军五师地区与上海之间的物资运输线。

一九四七年五月间，我负责的同建西药行曾与蒋椿木合作，用他的机帆船装运药品去解放区，中途被口称“自己人”的还乡团巡逻船扣留，解往青岛。经我们设法营救，药品被没收，船只与人员获释，从此我与船主蒋椿木交上了朋友。我接受购船任务后，与蒋谈起，经他和陈嘉瑞多方奔走，介绍我购买浦东“忠义救国军”头目张惠芳（即张阿六，抗战胜利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交通警察第十八总队副队长）的一只机帆船，船上装有美国制造“轧来买令”柴油机两台，并装备有自卫武器驳壳枪两支，步枪十二枝和子弹若干发，备有自卫用的护照。船主愿意出售，条件也合适，但同建行的同志们认为张阿六做事翻脸不认人，手段毒辣，与他打交道，弄不好恐有生命危险，极力劝阻。其实，浏河口被

国民党海军封锁后，我们曾通过陈嘉瑞与张阿六谈过交易，拟在浦东沿海海滩开船出海，直放解放区，由张的部队发给小黄旗一面，作为他们的海上供养船只，条件是经过他们地区运走的物资，出点“买路钱”，解放区运来的土产，由他们经手销售，收取佣金。后因苏北在沪的补给机构被破坏，国民党加强对海运控制，没有实现。所以，我对张阿六的底细有些了解，但对向他买船也确有顾虑，因此并不积极。后经张执一同志一再催促，才决定向他购买。经双方同意，看船议价，立据成交。

机帆船买下后，解雇了原有船员，除机舱部门由组织上派地下党员林克光同志下船掌握外，其余船员均另行新雇。在上海山西北路福荫里四号成立“张利记船务行”，聘请张菊笙同志任经理，蒋椿木任副经理，并请赵朴初居士为公证人，向国民党航政局和海关申请登记，并将船名改为“金安利”号，领取营业执照。这就是地下党组织开设的“张利记船务行”的经过。

开业后，具体工作由我和蒋椿木共同处理。不久，因环境险恶，组织上命我去香港，由蒋通过陈嘉瑞利用国民党交通警察大队的交通车，护送到龙华机场上了飞机。船只暂时由蒋保管，并与蒋约定双方都用化名通信联络。后来组织上派去地下党员余石泉同志与蒋共同办“张利记船务行”，准备经营货运业务。此时因局势关系，长江开航已有困难。首次开航去福建装运木材，再次去浙江海门装运木炭和柴引。后因时局动荡，物价剧烈波动，运价又在限价之内，颇难维持。一九四八年夏，山东解放区已与东北解放区大连通航，缺乏船只。余石泉与蒋椿木商量，借了蒋四吨柴油，将船上职工除林克光外全部辞退，另招一批船工，装了一批货物，报航政局和海关，声称装货去天津。实际上，该船由香港来上海的

徐雪寒同志率领，去了山东解放区，参加那里的运输工作。事前徐雪寒同志在港曾向我了解过情况，而蒋椿木也是心中有数，积极支持。事后，由于该船未回上海，蒋曾受到威胁，结果是谎报该船在洋面上失事，注销了事。

苏北驻沪补给机构被破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共匪在沪办理补给总机关破获”，内容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最近会同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及国防部所派人员在沪破获共匪补给总机关，现已人赃全获，案情复杂，至为惊人”等等。

我在香港看到这则新闻，非常惊讶。尤其担心的是我出走不久，是否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谍报组因追捕我未获，而引起对苏北驻沪机关的破坏。当时我对解放区驻沪各单位在上海的活动，虽然人事上有些熟悉，但没有横的关系，各人干各人的，彼此不通信息。而且此时因从上海到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交通障碍重重，我们正在设法开辟其他地下航道，为什么苏北补给机构遭到破坏呢？

后来得知，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我方海上运输比较顺利，于是华东财委和苏北财经当局均在上海设立机构，从事采购供应及秘密运输工作，前者由徐雪寒、陈明同志负责，后者由忻元锡同志负责。一九四七年，华东财委在沪人员大部撤往香港，另辟航道。而苏北地区因情况特殊，在沪机构未能撤退。其中的缘由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优势兵力向我苏北沿江地区进攻。在粟裕同志领导下，我军

坚守阵地，予以迎头痛击，打过闻名的“七进七出”战役。这时，我后勤机关撤至盐阜海边，集中在阜宁县合德镇。为了支持自卫战争，后勤任务非常繁重，当时负责苏北财经工作的忻元锡同志亲自来上海开展工作，利用他哥哥忻慰之的关系，在圆明园路女青年会大楼六二三室设立大华企业公司，由忻慰之出面当经理，并派苏北来上海的荣廉泉同志任总会计，实际上负责全部工作。该公司下设大华船务行，拥有三只小火轮，行驶于上海与苏北中洪港之间，经营客货运业务，后因局势恶化而中止。此后，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雇用帆船进行地下运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支持解放区急需物资，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七年初，忻元锡再次秘密来上海。他与老同学金振华同志合作，筹设吉泰商行。合夥者有金芝轩、陈渭滨、忻慰之、忻元锡和金振华，由金振华任经理，傅才康（即忻元锡）任监理。吉泰用黄金七十两顶下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七〇三室一套房间作为办公地点，开始营业。由忻元锡派朱沫同志为驻该行的负责联络员。此外，为了开展地下运输业务，还在宁波设有鸿昌商行，在定海设有安记行。一九四六年金振华与叶进明、后奕斋同志在青岛设立了恒泰贸易行，搞青岛与山东解放区贸易工作。因此，金对青岛情况也比较熟悉。于是，又设了一个吉泰与青岛的联络点。货物交流，一般是从上海运往宁波或定海，然后雇用帆船出海，绕道驶向阜宁县合德镇，由该地合兴公司经理冯昌伯同志验收。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海大华企业公司由宁波发出帆船一只，驶往合德镇港口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四千匹、颜料数十桶，由杨立平同志押运。随船去的有李明同志等数人。该船出海后，因

风向逆转，不能前进，被迫停泊在崇明岛堡镇，被南通地区第一绥靖区下面的通如启海渔民联防大队游弋发现，全船被俘，所带各项秘密文件都被敌人取走，于是苏北解放区设在上海的大华企业公司全部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如获至宝，国防部派来少将特务会同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亲自主持其事，一面组织大批军警带同特务张瀛洲（原系忻之锡、金振华、陈昌吉等在定海县定海中学的同学，知道忻等底细）和叛徒金柯等前往搜捕，一面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气焰十分嚣张。出事后，被捕人员有荣廉泉、金振华、忻慰之等五十五位同志。忻元锡同志因早已离沪到达苏北解放区而幸免，其爱人张未同志也被捕，后来因属嫌疑犯，花了一些黄金行贿，取保候传。这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查抄没收的物资很多，损失颇大。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荣廉泉获悉帆船在崇明被扣后，曾到吉泰商行通知金振华作好应变准备。当天，国民党特务和浙沪警备司令部水上警察大队将荣廉泉、金振华、忻慰之等先后逮捕，由毛森亲自审问，当场威胁金振华要交出忻元锡。金说忻已去山东青岛（当时已知忻安抵解放区）。当金振华被押到吉泰商行时，朱沫正在，见金示意，朱即从边门避走。老金在吉泰乘机偷打电话到家中，嘱其爱人陈华同志立即打电话给解放区来沪工作的老同学陈昌吉（即叶贻中）同志提防。陈与我向有来往，我曾为他在浏河口雇过帆船，装运电讯器材去山东解放区。这次因得到通知，未遭毒手。特务张瀛洲因同学关系知道陈昌吉底细，因此将金振华押至宁波路三阳南货店货栈楼上陈昌吉的姑母住处寻找。他们到达该处，金即大声呼唤：“昌吉兄在吗？”有意识地通风报讯。陈的表弟很镇定地应付过去了。陈昌吉当时住在静

安寺路成都路口修德新邨，金是很熟悉的。敌人再三逼迫，金坚不吐露。后来陈安全转移去香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新闻报》又刊登了一则新闻，说苏北驻沪补给机构案已初步审结，荣祥生（荣廉泉）等解赴南通，嫌疑犯七名就地取保候传。金振华在南通坐牢，通过行贿也取保候传，他乘机与爱人陈华赴香港暂避。南通解放后，荣廉泉同志获释，金振华夫妇则在上海解放后返沪。

三十四年过去了。一九八一年春天，正当春光明媚，桃李争春之际，我有机会去无锡，拜访了金振华、荣廉泉两位老同志，恰好陈昌吉同志也在太湖疗养院休养，大家见了面，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大家认为白区环境复杂，我们尽力工作，虽有一定成绩，但更应该记取严重教训。廉泉同志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卧病在床，但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仍然信心百倍。振华同志精力尚健，在无锡人民银行工作。他衷心感谢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对他落实政策，心情十分舒畅，大有“满目青山夕照明”之感。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朱剑帆和长沙周南女校 大革命以前的

朱伯深
遗作

从毛泽东同志与外宾的一席话谈起

一九五九年,我在对外文委任党组成员兼欧美司司长。有天午后临下班时,廖承志同志来电话,嘱我立即与民航联系飞机,明晨陪送在北京访问的美国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伊斯夫妇及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去武汉会见毛主席。我忙了一夜。

次晨我和丁西林、唐明照、浦寿昌三位同志陪送三位美国友人飞抵武汉,驱车直抵武昌东湖。毛主席和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在一所别墅门口迎接。主客九人进入客厅,聚坐在会议桌旁,马上开始了对话十分活跃的茶会。记得毛主席谈到“社会分化”时,曾风趣地指着我向外宾说:“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随即又指着浦寿昌同志说:“这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现在都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和外宾共进午餐,餐桌中央放了一盘大蒜辣椒红烧肉,毛主席举箸请客人尝尝湖南烹调风味,大家都吃了。

饭后又回到会议上。毛主席首先笑问在座客人:“你们不知道刚才那盘湖南风味的菜是什么?”在大家还没有搞清这句问话的用意之前,毛主席已笑了起来,说:“那是狗肉!我若指明是狗肉,你们之中大概有人不吃。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也就都

吃了。”大家也都笑起来了。

以上是二十年前的旧事。毛主席即情即景深入浅出地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论，我很幸运地得以聆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六十年代后半期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我为诬陷所厄困，蛰居京都郊外十多年，直到一九八〇年六月才得恢复名誉。这期间全国妇联、湖南省妇联、北京市文化局、新华社几位同志几次来访，要我谈本世纪初向警予烈士在长沙周南女校肄业的事迹，并特别问及先父朱剑帆提倡女子教育，创办周南女中的经过。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在武昌东湖谈“社会分化”的往事又不止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童年是在周南附小度过的。迄一九二五年夏我去上海进沪江大学为止，周南校园一直是我课余游憩之地。解放后又从徐特立等同志那里，听到了许多故事，因而知道有关周南的人和事较多。先父的家庭背景、社会活动及其历年的思想变化演进，我也有所了解。现在把我知道的写出来。

先父是一九三二年夏在上海白色恐怖极端凶残的日子里患胃痛去世的。直到弥留之际，他对中国革命“无论道路怎样艰辛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始终是乐观的。先父的一生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是怎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中承受考验，终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汇入历史洪流的。解放后，深知先父生平的徐特立同志告诉我，他四十年代在延安曾写过一篇先父生平事迹送给中央组织部。我的回忆录可作为有关革命史料的补充参考，不尽不实之处，还望就正于健在的老一辈。

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

我家属湖南宁乡道林大屯营周氏宗族。祖辈相传：明末清兵渡江，原明宗室吉王有一后裔，得到大屯营周氏某族人的庇护，认为己子，得免俘杀，以后繁衍甚众。这就是毛主席向外宾提到我家是明朝皇帝子孙的原委。辛亥革命后，我家这支周氏族入报官恢复姓朱的人很多。清时先父名周家纯，号吕生，入民国后换姓改名朱剑帆，“帆”字后又省写为“凡”。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发展到了湖南。当时我祖父周达武是大屯营附近炭子冲一带（花明楼公社）采煤为生的矿工。应湘抚骆秉章招募，周达武投军，为清廷效命，先后受到骆秉章与左宗棠的宠信，在湘川云贵陕甘新疆各省平定回苗等少数民族，围攻太平天国石达开西进的部队，由于他作战勇敢，官职升迁很快。左宗棠指挥湘军进入西北，周达武部驻兰州充总预备队，周达武本人任甘肃提督达十九年之久（一八七五——一八九四）。当时英俄帝国主义垂涎我西北，不断挑起西北回汉之争，左利用英俄矛盾与清朝在边境上的军事优势，影响清廷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夺回了汉代即已属于中国的疏勒等地。新疆改省，左保奏其营务处长魏光焘为第一任巡抚，魏以后连续任过陕甘、两江，闽浙等地区总督。一八九四年，周达武受清廷之命调升新疆巡抚，未及交卸原职即患病去世。魏、周同隶左部，结成儿女亲家，我母亲魏湘若是魏光焘第四妾所生的第二个女儿，我父亲母亲是庚子年在长沙结婚的。

先父生于一八八三年，是独生庶子。嫡祖母戴氏没生儿子，她曾瞒着祖父，伪装有孕，回到原籍，秘密买了个男孩冒充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先父的生母是周达武的第二妾姚氏。她在家庭中

一直受着戴氏的歧视。先父嫡兄周廉甫沉溺声色，嫡嫂汤氏嗜赌若命，还有他们的独生子寿峰也纵情烟花。周达武长期任清廷武官，劫夺民财，克扣军需，积资甚多，在原籍湖南宁乡道林一带置有田产万余亩，并筑有冠甲湘中的一座城堡式大庄园（现为宁乡四都石家湾公社所在地）；在省城长沙还以巨资购得座落城西北、占地八十余亩、全城首屈一指的一座苏州式园林。相传唐代有一个名叫刘蜕的进士在这里住过，故名蜕园。园的南部临通泰街为一大宅第，园的北部引水为池，叠石成山，池中石船水阁南北对峙，池的狭处还有石桥连接两岸。走廊斋榭分布四周，戏台及可容数百人的宴厅在园的中央。其后堂为高三层的魁星楼，登临其上，即可俯视长沙全城，纵览湘江麓山景色。园的庭院隙地遍植四时名花；更有乔木成荫，如银杏、梧桐、核桃、海棠、丹桂、紫荆、椿、柳、槐、柚等穿插于高台亭阁之间，倍显得园林的格局幽雅清秀。一八九四年先父随祖父之丧回籍后，全家都住在这里。一九〇五年在这座园林里开办了周氏家塾，民国后改称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解放后改为长沙第一女子中学，以后又改为长沙第四中学。几十年来移石填池，增建校舍，园林早已不复旧观了。现在四中东部沿北门正街的一部分校舍是解放以后民革的李觉先生捐赠的。

由于先父的嫡兄嫂及其独子奢侈无度，不出十年，祖父遗下的田产已变卖过半。同时，先父生母姚氏是祖父率领湘军随骆秉章入川，在忠县掠得的农家贫女，纳为侍妾，得祖父宠爱，一向为嫡氏所妒。祖父死后，仍时受嫡氏鞭挞虐待。先父处于封建宗法统治的高压之下，异常痛苦。他对封建官僚大地主家庭的专制淫威，及其兄嫂姪子的糜烂生活，怀着强烈的反感。结婚之后，他便要求分家，安置了祖母及我母，自己则带了许多当时他不能解

答的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的问题，东渡日本留学去了。

就学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

二十世纪初，距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已一百五十多年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更加腐朽，濒于总崩溃前夕。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许多丧权辱国的事件，造成了中国日趋危殆的被瓜分局势，人民十分不满，发生了白莲教、洪杨、捻军、苗族、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等遍及南北的人民起义。思想界也涌现出各种救国济世的主张。先父当时对现实不满，思有所作为，但入世未深，最初所考虑的，也只限于富国强兵教育生聚等朴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青少年时读过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魏源、谭嗣同等人的著作。到日本后，他进了东京成城中学学习日文，后曾考士官学校，以近视未被录取，改入弘文学院学习师范。

在东京的中国留日的各派政论家，就康梁保皇与孙黄革命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戊戌变法之后，康梁在国内外的号召力锐减。先父原来接近康梁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他认识了华兴会的周震麟（道腴）先生。周后来参加了同盟会，解放后任政协委员，五十年代中期去世。

日俄兢夺满州，在辽东半岛作战。一九〇三年，中国留日学生倡导组织驱俄义勇队。先父与留学日本的三舅魏肇文参与这一运动，曾归国到南京动员外祖父——两江总督魏光焘反抗帝国主义入侵。魏异常震惊，勒令二人重返日本学习，不许再参与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先父对当权人物的幻想破灭了，仍返东京弘文师范学院，读完了他的课程。先父留日期间，认识了华兴会的周震麟（道腴）先生，思想上受他教育救国的影响较深，道腴先生

鼓励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先父在弘文师范学院的一些湘籍同学，如胡元倓、陈润霖、杨昌济、李士元等也都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他们回到长沙以后，胡创办明德学校；陈创办楚怡工学与小学；李曾任周南教务长，马日事变以后为周南女校校长；杨随后又去英学习，返国后任教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后又任教北京大学。这些留学生与徐特立老人都是清末民国初期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但在以后国内大动乱的三十多年中，思想与活动都有较大的变化。

从周氏家塾到周南女校

一九〇四年夏，先父返国，道腴先生在长沙兴办宁乡速成师范，先父参与教学。徐特立老人曾在这个速成师范学习了四个月。这是徐老和先父订交之始。徐老对先父的感情一向是诚朴的，非常尊敬先父，直到先父去世，他那怕写一个便条给先父，署名都是“受业徐特立”。

一九〇五年暮春五月一日，先父将住宅北的半边园林开辟为校舍，创办周氏家塾。园林的另外一半，也由伯父廉甫租赁给胡元倓创办明德中学，直到辛亥革命前不久，明德在周南西园的对街自建了校舍才搬走了。当时风气未开，不让女孩读书，一九〇三年长沙才先后开办了民立第一女学和淑慎女校，但这两校在一九〇四年秋均被清廷勒令停办了。两校一些失学学生如蒋保仁、蒋岱荪、罗正圭、罗正璧、郑业恒等都进了周氏家塾。近人追述，多把周氏“家塾”写为周氏“女塾”，“女”字实为“家”字之误。封建制度下的家塾才是传统合法的，先父以家塾名女校，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道腴先生热诚帮助先父筹设周氏家塾，曾任

地理教员，一面谈列强侵华形势，一面灌输革命思想。徐老学识渊博，在师范科教的课目较多，并兼任附属小学主事。最早的教职员还有：姜济寰（国文）、彭伯樵（数学）、谢仁仲（英文）、吕筱山（物理、化学）、陈润霖（学校管理）、辜天佑（地理）、谭莲生（女，舍监）、杨起权（女，体育）。先父痛心自己母亲姚氏的遭遇，这是他办家塾的直接动机。我的母亲魏湘若是周氏家塾第一届速成师范科毕业生，担任过学校会计，二十年代初曾代理周南校长，拿出自己全部陪嫁的金玉首饰、珍贵皮服，资助先父办学。但我也留下了先父多次跪在姚氏祖母膝前，撒娇啼哭，乞求给钱，支付家塾经费的印象。祖母辛亥逝世后，先父才有家庭财权。嗣后，周南历年填池筑地建筑校舍等土木工程，及置办教室桌椅、教学仪器、体育设备等费用，都是先父变卖田产支付的。

辛亥革命后，先父呈准湖南省府改周氏家塾为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并将自己宅后的全部园林立契捐赠周南。原来这座园林系先父与伯父廉甫所共有，先父以宁乡石家湾大庄园自己享有的一半与伯父兑换取得长沙城内园林的全部所有权，转让周南永为校址。先父留出了园林的南部住宅自用。这部分房屋，一九五二年我先母来北京定居，临离湘时呈报了长沙市委曹瑛同志将这住宅交公，划入长沙第四中学校舍之内了。解放后四中校内仍留下纪念先父的剑帆堂（礼堂）。但林彪“四人帮”肆虐期间，该校自清末以来几十年所积存的档案卷宗和珍贵文物，均遭摧毁，荡然无存。剑帆堂的名称及先父遗像也曾一度被摘除。前几年据说已恢复了剑帆堂的名称。但长沙第四中学是周南女校的原址，由于缺乏现场标志与史迹介绍，日久天长，仍有湮没的可能。

从早年与陈作新、谭延闿的交往看先父的为人

清末，长沙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刚十天，湖南立宪派的代表大官僚地主谭延闿就制造政变，杀害了焦达峰、陈作新正副二都督，自己夺得湖南省都督的职位。先父结识陈、谭都很早，突遇此变，受的刺激很大。私交、正义感和革命觉悟，一时都纠缠在一起了。

陈作新原名辅庭，醉心科举不中，探求变法失望，乃改名作新，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由“辅庭”到“作新”，实际上反映了他政治觉悟的飞跃。他居住在我家邻近的玉皇坪。他科场失利，投奔接近康梁的唐才常。唐在湖北搞自立军，谋泄遇害，陈才参加同盟会，入湖南兵目学校，毕业后在新军炮兵营及四十九标任排长。他在部队中鼓动反清思潮，几次暴露，终被撤职。幸而他诗文书画无不精通，素为士林推重，因而在长沙多有同情者，得以潜伏下来。新军中，我家的一些族人与亲戚都是班排长，如周树臣（炮营）、周声棠、鲁涤平（四十四标）等，常是先父的座上客。陈作新给我家写过春联，他于辛亥春间结婚，夫人原系我家姻亲汤姓的寡妾，美貌贤慧，与先母同年生，我们叫她同年妈妈。她和先母一向交往密切。陈被害，我们全家都为之悲戚。当年他蹄声得得，跃马来访，谈笑风生，语惊四座的潇洒英姿，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先父晚年回忆辛亥陈被害事件曾对我说：谭延闿为人柔懦难测，但陈为人豪爽，才华卓越，过目成诵，领悟力奇强，死在谭手，实在可惜，叫人很为之寒心。先父又说：辛亥谭在湖南夺了权，曾邀他主管教育行政，他婉言谢绝了。总觉得接受谭的邀请做官，就对不起

牺牲的陈作新。他向谭表示，不做官，只搞具体的教育工作。他自民元起兼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长沙城区小学学董，以后还任过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各两三年不等。先父兼职各校从来是义务的，拒绝领受工薪车马费等津贴。

谭延闿是官宦子弟，清末最后一批翰林之一。其父谭钟麟亦系左宗棠旧部，曾负责左的西征兵站供应工作，以后官至总督。谭延闿亦为婢妾所生，自幼与先父建立了世交友谊。先父曾参加立宪派的辛亥俱乐部，与谭组织的宪友会相互呼应。谭对先父办女学是很支持的。长沙有名的四所私立学校——周南、明德、楚怡、修业——受到官方常年津贴，也是谭第一次督湘时批准的。一九二〇年驱张（敬尧）运动之后，谭又主湘政，他批准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周南代用女子中学校（当时湖南还没有官立的女子中学），增加了常年津贴，并亲自来校，召集学生讲话。军阀混战，谭逢源于南北两政权之间，是典型的投机派，其部下赵恒惕倒向直系吴佩孚，谭又再度追随孙中山（谭氏民初参加过国民党）。先父从这时起才参与谭在湖南抵制赵恒惕的政治活动。以后先父随谭赴粤，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参加了左派国民党。

“马日事变”时，因先父任长沙左派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长（即长沙市长）、长沙市公安局长，为何键、许克祥所通缉，家庭被抄封。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先父脱险到达武汉，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接待了他，一同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原湖北督军肖耀南的住宅内。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以富春同志为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军部所在地，军长是谭延闿。先父到楼上谭的书房里看他，谭问了“马日事变”的情况后，第一句

话就是：“湖南的群众到哪里去了？”带有责难的口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果何、许的阴谋不得逞，暂时同路人谭延闿，也可能不会那样快地倒向敌人。

也是在这些日子里，肖宅楼下先父住的左正房里，毛泽东同志经常来谈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革命战略。先父患胃病睡在床上，聆听毛泽东同志的伟论，十分钦佩。七月下旬先父抱病去庐山，“八一”前夕由夏曦同志陪送，我与六弟朱叔平亦随侍在侧，取道星子县乘小舟渡鄱阳湖北驶，中流遇到飓风，幸得老舵工稳重救险，但已误了行程，没有赶上南昌“八一”起义。夏曦同志舍舟登陆追赶南进队伍，临别时嘱先父去上海养病等候消息。我随先父折返武昌会合母弟去了上海，自此先父开始了较艰苦的流亡生活。

宁汉合流，谭延闿倒向了蒋介石。谭为暂时下野避开孙传芳渡江反攻的蒋介石作留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春，我奉父命自上海去南京谒谭谋职养家，谭安置我在农矿部任科员，未到差即被南京市公安局捕去，诬我潜来举行暴动，并向我追询先父下落，我拒作答。谭派其秘书吕苾筹出面，将我移交法院特种刑庭，经查明并无暴动证据。法院开庭宣判我无罪释放。（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查我的历史，一位青年同志谢友新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当年南京特种刑庭的主审法官王龙，为这个四十多年前的旧案，提出了我当年被捕没有出卖任何人的实况书面证明。）随后我返回上海家里，先父和谭延闿三十年的个人私交也就到此终断了。

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到的周南女校师生

先父一向不畏强暴，不信鬼神，早年就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

的无神论者。辛亥革命他不仅剪掉辫子，还砸了家里正厅供养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龛。民国初年，孙、黄反袁失利，云南蔡锷起义反对帝制，溥仪复辟未遂，各帝国主义者挑起各派军阀混战。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先父一腔办女学为人民服务的热忱，才和全国各地进步力量一起，找到了可靠的政治领导，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

周南女校诞生于反动黑暗势力猖獗之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争取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与自由而战斗的集体。以家塾名学校，男教师在最初一段时期内，隔着竹帘讲课，这是为防止封建势力非难破坏的措施。由于教师们辅导认真，学生们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礼教习俗压迫，走出了闺门，带着严肃慎重的自尊心与世接触，因而树立了淳朴踏实的校风，取得家长的信赖与社会的称誉。周氏家塾总算坚持阵地站住了脚。辛亥革命后，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子学校，赢得公开合法的社会地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周南女校前后毕业的几千女青年与教师们一起参与社会活动，终于为民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女战士，培养了一批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周南作为中国革命在湖南地区培养女战士的摇篮，并且团结部分师生成为一个小小的革命尖兵班，迄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学校落入反动派手里为止，短短二十二年，终于较出色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以这样如实的评价，载入史册，是周南师生当之无愧的。

以下简述的都是与周南有关的一些人和事。

北洋军阀汤芑铭主湘时，地方顽固的封建势力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先父被迫辞卸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城区小学学董职务。第一女师一批优秀学生如向警予(俊贤)、陶毅等都转学

周南。湖南拥袁的筹安分会以叶德辉、符定一为正副会长，排挤一向较为正派的省教育会长陈润霖，煽动帝制派改组省教育会。先父挺身而出与符在会议上斗争。符解放后任政协委员，对革命已有认识，但当年依附汤、叶损害湖南教育界的团结，也确有其事。不过当年受迫害的陈润霖到大革命时期却又成了顽固分子。

先父办女学随时为学生及社会的需要着想，不断改进学校的教学内容，解决师资教材和设备的困难。周氏家塾设有幼儿园和幼稚师范科，先父特聘来了两位日本专家：佐藤操子和春山雪子，帮助教学；办体操音乐科也特自上海聘来范慕英老师；办缝纫科更是不拘一格，选聘了在我家附近开成衣店的皮师傅任教师。皮师傅年近六旬，戴着老花眼镜，从镜框上看人，耐心讲解黑板上裁剪衣裤的粉笔图画，完全有老教授的风度。周南早年有一位摇铃工人袁顺生，刻钢版、油印讲义、教小学生做手工，糊彩色风筝尤为出色。先父就提拔他负责教学办公室的行政工作，解放后受到退休养老的待遇。先父还自编写“教学法”、“儿童心理学”等教材，刊印成课本免费供学生学习之用。

徐特立老人和周南早年的关系最为密切，清末他教师范科还兼小学主任。他和另一位鲁景森老师，民初曾由周南资助日本进修并考察日本各地小学教育。徐老自旅法勤工俭学返国后，还在周南中学教过修身、国文、数学等科目。徐老善良、严肃、热情、正直的高尚人品，六十年前在湖南即有定论。他的修身课在长沙各校是最受欢迎的，他自身的行动也为学生树立了革命的榜样。一九〇九年深秋，有一次在省教育会的演讲台上，徐老发言谈到当时政治腐败，国势危殆，异常气愤，竟挥刀断了自己的左小指，以激动人心。他回到周南教员宿舍，先母为他裹伤熬参

汤。许多学生就用徐老断指流的血，在纸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这次演讲会与当时立宪派遣派代表北上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有关。

先父以“欢迎大家都负起责任办好周南”的方针，和以上所提到的各位前辈（要列举的实在太多了）先后合作无间，写下了他这段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寻求革命道路的历史。

当年在周南校园中，教职员与学生，无论是上课还是课余，对国际国内形势、学术问题、社会问题一直有着自由讨论研究的风气，足以比美于民初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大。周南虽仅是长沙城内一所女子中等学校，但对全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来讲，其星星之火的影响，还是深远的。

周南室内运动场的墙壁上时常贴有学生的论文与绘画。五四运动高潮的日子里，这个场的四壁贴满了墙报，主笔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高小学生黄彰定（慕兰），文采辞锋都十分动人。五四运动初起时，高小毕业班班主任教师黄厘叔阻止学生参加罢课，积极分子周敦祐等得到先父的支持，组织全班和中学姐姐们罢课。周南还有学生自己组织的南化学会，毕业校友和在校同学藉此时常集会，交换见闻，联络感情，讨论研究学术问题。成员中如向警予、蔡畅、陶毅、熊季光、劳启荣、魏璧、周敦祥、贺延祐等，以后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组织的新民学会，其中向、蔡、熊随后又是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女党员，在全省以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起着积极的先锋带头作用。

一九一九年，先父本人还参加了长沙教育界进步人士所组织的健学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徐特立、何叔衡等。先父有一次在健学会的学术讨论会上讲了《中国人对生与死的观念》，曾被毛泽东

同志选刊在《湘江评论》上。我家里时常有周南学生来访，和先父谈各种问题：学习方面；择业方面；世界观；个人困难；家庭纠纷等应有尽有。如玉钰要在城南办培德小学；蒋葆仁要在城外碧湘街办幼幼小学；陈舜琴回麻阳，李宗莲回湘潭，向警予回淑浦，都在自己的县城里办小学；蔡畅同志、劳启荣、魏璧等要赴法勤工俭学；彭琦想学医；已故首都医院眼科罗宗贤大夫的母亲要求带了儿子住校，母子分别在师范科和附属小学学习……他们都曾来访，和先父商谈，总是带着疑难而来，又带着笑脸离去。

还有较突出的一桩事：曾国荃以攻破太平天国天京有功被清庭封为伯爵，他的未亡幼妾养了一名吃斋念佛的清客友姑。由于我家和曾家是亲戚，友姑也时来我家。她善刺绣，先父聘她到周南教刺绣，说服了她抛弃在曾家念佛的清客生活，取名李淑仪，作为工读生，一面教刺绣，一面进了周南最后一班的师范科。李淑仪年近半百，学习甚勤。我常见她在学校池边，高声诵读《李密陈情表》一类的古文，音调清越，不顾其它青年同学在一旁仿效其声，发出天真的笑声。这位老大姐约在大革命失败后受聘到印尼教书，不幸在海船上患病身故，海葬在西南太平洋了。友姑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但她做人的认真努力，使周围认识或不认识她的人都曾为之感动。先父一向以姊礼待李淑仪，为她开斋的那餐饭，先父首先敬她一箸豆芽肉丝，友姑神色自若地接在饭碗内，先父像个顽皮小孩那样，高兴得笑起来，带动了全桌先母和五个小孩的欢腾。先父曾称赞她是醒狮。她的死讯传来，先父患胃癌已势将不起，他缠绵病床受到震惊，以手按了剧痛的胃，随即忍痛平静下来使劲说了：“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又说：“友姑的精神不死。”先父虽然由于有了毛泽东、徐特立、向警予、

蔡畅等知友和战友，而越来越感到不会虚度此生，但他同样看重李淑仪这类人的友谊，而且希望有成千上万的李淑仪涌现出来，这是他涉世之始就有的朴素天真的愿望。

周南的许多学生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烈士，无名英雄，当代知名人士，也产生过少数历史悲剧人物，在回忆周南时值得尽量列举其事迹作为史料补充（记忆不全，请知情者补充）。

师生中业已牺牲或谢世的有向警予、徐特立、方维夏、张唯一、周以栗、周竹安、陈启明、陶锡琪、陈章甫、沈望三、锺楚生、周毓明、劳君展（启荣）、陈书农、陶毅、曹孟君、杨云、朱坚（叔平）、周敦祥等，都是革命后代所景仰的人物。

目前健在的有蔡畅同志、章蕴同志（杜蕴章）、丁玲（蒋冰之）、黄慕兰（黄彰定）、刘昂、邓裕志、邓裕兰、彭琦、苏镜、周砥、陈咏声、周敦祐等及我家的仲止两姐妹。

周南附属小学的少数男生现健在的还有我的兄弟仲硕、竟之与谭礼智、李铁铮等同志。李在我记忆中仍是一个戴银项圈的圆脸小黑炭，七十年未见了，只知他在北京仍较活跃。北京首都医院已故的罗宗贤眼科大夫及我六弟叔平（又名坚、觉，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组织派赴鄂豫皖苏区；后牺牲，年仅二十岁），他们都是周南附小男生。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服务于湖南文化教育界的妇女很多是周南学生，如李咏南、吴剑、郑业恒、唐仲元、陶志武、文惠中、吴特民、李左汉、胡仲敬、张家绂、吴珊、张敏文、罗正璧等。

解放后湖南文化教育界的骨干更不乏周南学生。如朱超（已故）、曹国智、贺益昭、旷璧城、贺益恩、周昭怡、周昭亿、任淑纯（现名任重威）、向大威等都是。

但在周南女校也有一些学生摆脱不了旧制度旧思想旧环境的束缚，仍旧与世浮沉。谭延闿的两个女儿曾在周南附小学习。谭淑以后嫁给了清末海关道袁海宽的儿子，上海滩上二十年代有名的浪荡公子袁老六；谭祥跌入了蒋介石宋美龄的政治婚姻的罗网，宋美龄把她介绍给陈诚做夫人。师范毕业生里则有宁乡大地主童子浩的女儿童锡翰，嫁给军阀赵恒惕。其妹童锡楨以裙带关系当过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小军阀吴剑学的侄女吴家璞当上了赵恒惕的省宪议员。向警予同志和吴展开了有关社会政治的尖锐论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向警予同志还有一个同班生吴琛当了蒋介石的伪国大代表，去了台湾。

还有几个小人物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社会悲剧，也属于周南史料之内的：

1、宣统二年（一九〇九年），校工欧嫂子被舍监彭润皋诬陷有盗窃行为，她愤而投井自杀。其夫在传达室工作，县官来校园验尸，命皂役打她丈夫的屁股，勒令交赃。学生不平，质问彭，县官溜走，彭亦羞愧辞职。一场小风波说明：即在封建制度下的妇女也不是好欺负的。

2、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周南体育音乐专科毕业的朱宗陶在麻阳任教，被其养父县知事朱家缙迫作侍妾，愤而自杀。朱是蔡畅同志的同班生，蔡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知朱自杀，曾为之气愤不已。

3、袁舜英在校园内投池自杀。事情发生在一九二〇年秋。其夫李震鹏在周南教英文，嫌袁脚小貌丑，袁受气寻了短见，引起学生公愤，李也不敢再来周南上课。

这之前，长沙城内曾发生过新娘赵五贞反对父母包办婚姻，

在花轿内用剪刀自杀的惨事。还有长沙师范学生王绳武、李宗揆捣毁长沙城隍偶像，被迷信乱民活活烧死的惨案。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在周南校园中的反夫权父权神权的封建势力的斗争。

周南教职员间亦曾有新旧思想之争。新的以周以栗、周竹安等同志为首；旧的以教务主任李士元为最顽固，时有争论。一九二四年有一次周以栗同志和李士元在吃饭交谈时发生冲突，扭成一团。李士元大喊大叫，挑动了不明真相的学生，认为李挨了打，为之不平，群趋会计室要求退学费离校。反动报纸亦推波助浪，将之作为第一版新闻。当时先父已去广州，先母代理校长，经周以栗同志及其它老师们向各方说明真相，学生也知道是新旧思想之争，不久事情就平息了。

最后还谈一椿先父拒绝纳妾之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一五年，我的八妹出世后，魏光焘的四妾，我的外祖母董氏提出：先母的孩子已生得太多了，不宜再生育，并由邵阳来我家探亲，买了一个女孩子名唤春燕，携来送给先父作妾，先父拒绝了。周南女校的师生和社会舆论都关心此事。春燕很快就由我家亲戚陈姓姨父领去了。不几天，长沙民国日报主笔鲁蕩平作了一首“佳人难再得”的诗，登在《民国日报》副刊，其中我还记得有“不知春燕伴谁飞？”的一句，说明春燕已离开我家了，这才止住了社会上的议论。先父为了反对这类事情才办女学，因而对这类事情先父从来就是特别严肃的。

先父与毛泽东同志之交及广州之行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中国历史从此展开了新的篇章。

先父很幸运地早在袁世凯称帝期间，由于和杨昌济（怀中）老人有留日同学的友谊，就知道了毛泽东同志。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杨老在省立第一师范执教时常来访先父。我有时陪侍吃饭，曾不止一次听到杨老谈毛泽东同志在一师学习的一些情况。据杨老说，毛泽东阅读课外书籍极勤奋，不顾作息制度，预备几个烧饼，留在锁上门的集体宿舍内看书，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每逢熄灯之前，他停止阅读，必跑到水井旁洗冷水浴，舍监点名找不到他；考试他只选称心的题目作答，其它都不理，写起文章来洋洋万言，才华超众，见解精辟，一师的教员先生们都为之惊服；但监考老师以陪坐等候为苦。杨老还说，一师教务会议曾研究过毛泽东同志与众不同的这些特点，有的主张要以校规约束他，但许多老师如杨老、徐老、王季范老人都主张尊重其认真地学习锻炼精神，后一派意见占了优势。

二十世纪初，湖南许多教育界老一辈对毛泽东同志的期望是异常殷切的，其中最为热诚的是杨怀中老人。毛泽东同志对杨老所研究的伦理学曾有兴趣，是为二人忘年交往的密切关系之始。毛泽东同志渴求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有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伦理学范围内，是得不到解答的。杨老为人正直，忧国忧民并不后人，当他发现毛泽东同志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所鼓舞，冲破了伦理学的樊篱，展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站到五四运动的前列之时，他自己也不再为伦理学的唯心论所束缚，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飞跃，益加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见解和行动，由师友关系进而结为翁婿。

我不清楚先父何时何地第一次认识毛泽东同志，只知道一九二〇年夏，毛泽东同志作为先父的客人，住过我家后面的周南校

园。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他。在校园里，他时常闲步庭院，凝目四望，若有所思。我当时还是一个十七岁较为腼腆的青年，没有和他交谈过。有一天我独坐房内温习功课，听见房外大厅里有人打电话。话音刚落，又听见了打破瓷器的声音，并有向外急走的脚步声。从那一口带湘乡话尾的湘潭话来判断，打电话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我正在纳闷。传达室的苏树藩师傅走来，手拿二十枚铜元向我说：“毛先生要我寻个补碗匠将打破了的痰盂锄好。”我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挂电话时失手，听筒将电话机下面的痰盂打破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后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不是偶然的。

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先父积极支持五四运动以后湖南历次的进步学生运动。先父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设新文化书店，先父为之筹措开办费，自己出了一百元。毛泽东同志主编《湘江评论》，先父为之写稿，也鼓励周南学生周敦祥等出版《女界钟》。谭延闿、赵恒惕争夺湖南政权，都想利用湖南省宪以左右全国政治。谭倾向于孙中山，先父竞选作了谭派的省议员。一九二三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谭奉中山之命，率部离湘援粤。先父丢掉省议员不干，随谭去了广州，开始参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活动，周南由先母代理校长。

先父行前还为周南新建了一所理化实验馆，建筑费不足，以周南房地契向上海恒丰纱厂湘籍资本家聂云台抵借了六千元。聂之父聂缉渠是官僚资本家，母曾纪芬是曾国藩幼女。聂家在洞庭湖畔围湖造田，是特大地主。一九二七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时，聂家曾申明将这六千元捐赠周南。一九二四年长沙基督教遵道会美籍邓牧师表示愿支援周南几名由教会付工资的英文数

理教员，先母毅然加以拒绝。官僚资本家借钱支持教育基建，以校舍地契为质，是好意还是恶意，很值得分析研究。而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无孔不入，对教育事业更十分注意，先母政治警惕性高，才未为所乘。

周南女校与先父母的关系在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时结束。当时反动军警搜查学校，勒令停课。经李泳南、吴珊、陶志武、魏友兰、朱佛根等以校友名义吁请教育界老前辈向政府交涉复课。原教务主任李士元乘机向何键、彭国钧（国民党C. C. 骨干）等国民党军阀官僚投降，出卖了周南的清白，启封学校，恢复上课。李士元自封为周南的校长，直至一九四九年长沙和平解放时为止。

解放前湖南地下党对周南是很关心的。较后一辈的同学们参加秘密革命活动情况，由于我已远离家园二十多年，不甚清楚，只好请其它知情人另文补充。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和平解放长沙，肖劲光同志是军管负责人，周南曾组董事会，选出劲光同志任董事长。随后周南又被编入长沙市中学建制，现列为第四中学校。从此周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新生。

参加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时期的先父

一九二四年春国共第一次合作。先父赞成国民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加入了国民党，在党内是左派，并代表以谭延闿为首的湘军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胃病大发，在广州珠江海珠小岛上的颐养园开刀后，又去澳门疗养了大半年，身体平复才重返广州，积极参与了北伐的准备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及其它湘军培训入湘后的地方干部。先父在以李

富春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训练班任教育干事，并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一九二五年冬，我自沪赴粤探亲度春节，听到了先父谈当时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形势，提到许多重要的观点之时，他总要添上一句：“这是毛润之的见解，很有道理。”

一九二六年先父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取道香港、上海回湖南。这时北伐大军已进入湘赣。路过上海时我见到他，他和我谈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党内部分化的情况，特别提到中山舰事件，表示对蒋介石不信任。夏末先父返抵长沙，任左派国民党市党部常委。二十年代初，湖南先有共产党组织，然后才成立各级国民党。北伐军攻克湖南时，全省国民党组织几乎都在共产党参加的左派领导之下，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声势极大。先父与徐特立、熊瑾玎、张唯一诸同志都是长沙国民党市党部建立时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两湖主要抓的是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起长沙陆续开了湖南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在这时候蒋介石率部在江西北伐途中杀害了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长沙国民党市党部由先父领函通电谴责蒋的罪行。同时，两湖农村涌起了反地主恶霸，反封建宗法，要求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革命高潮。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传达开了，各县镇压了一批土劣。武汉中央政府宣布改组湖南省政府，先父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和市公安局长。国民党右派在湖南搞了一个叫“左社”的反革命组织。先父积极地领导并参加了“与左社阴谋针锋相对”的斗争。长沙市公安局的特种刑庭也处决了一批臭名久扬的土劣，如叶德辉、俞浩庆和李右文等。不久何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来自武汉的右倾错误路线损害了湖

南群众的积极性，否则，何、许两军阀的反革命政变是不堪几百万有组织有初步武装的工农群众一击的。经过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先父和更多的我党负责军事、党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同志，如李维汉、王震、郭亮、夏曦等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大革命虽失败了，但他却更坚定了，愿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再接再励革命到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我当日因号召所在的沪江大学同学罢课抗议，被迫离校，反湘途中遇到夏斗寅叛变，火车交通在汀泗桥中断。我自蒲圻雇船到达岳州，再偷偷地爬上一列专车到长沙，已是马日事变后三日。先父避居在西城姑母家，我为先父化装并携同三妹仲止乘国民革命军二军粮车安全到了武汉。先父在武汉，以及随后参加“八一”起义在鄱阳湖遇风，折返武昌，全家迁居上海等情，前节都已谈过了。

一九二八年夏初，我侍先父去到日本长崎，和姜济寰、邓寿荃一同住在大埔片岗。姜与徐特立老人清末在长沙的宁乡师范同学，也是先父的学生，曾任谭延闿的秘书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撤离潮汕，来到日本。邓是唐生智的谋士，曾任湖南建设厅长，当时随唐下野住在日本，其夫人毛士珍是周南学生。姜、邓二家比邻而居。先父化名“吕还庵”住在姜家。我进了长崎高山中国留学生补习班，先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报名学英文。他赞成我投考长崎医科大学，以后可以藉行医掩护革命活动。但筹不出学费，学医的计划吹了，随后我与先父回到了上海。我找到了社会职业，在镇江做过江苏省土地测量局的绘图员，又去庐山鲁涤平的别墅辅导他的儿子学英文、数学。一九二

九年底，我自南昌鲁家回上海省亲，先父很高兴地告诉我，经过总结经验，重整队伍，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活动，又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活跃起来了。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在筹组中。先父是发起人之一，我亦签名加盟。鲁涤平在报上看到了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宣言及我签名加盟的消息，很快来信（寄我舅父魏肇文转交），开门见山地说：“贤侄既另有政治活动，请不必再来南昌。”鲁的母亲是先父的从姑母，我们一直叫他表叔，他从清末在四十九标当班排长时起就常来我家。宁汉合作后，他已是谭延闿系的实力派头头，我家和鲁家从此断了亲戚来往，也和谭延闿集团最后断绝了一切关系。中国革命进入了最艰险的阶段，白色恐怖在上海日趋严重，先父的胃病更加重了，但他对革命前途表现得异常乐观。直到一九三二年夏他胃癌扩散，弥留之际，听到党中央已在江西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以十分欣慰的神态含笑而逝。

坚 持 晚 节

先父病中时常深入浅出地将他的学习心得说给身边的儿女听，谈话中他爱援引毛泽东同志的话，总是说：“还是要照‘毛老爷’主张的做才行。”（“毛老爷”是先父晚年谈话时对毛泽东同志的昵称）。他的上海寓所时常迁易，以策安全，来往的也正如唐朝刘禹锡《陋室铭》所说的，“谈笑有鸿（红）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寓所一直是他所认识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联络通讯、会谈休息文娱的秘密地点。到过我家的，在地下党中央工作的同志有：李富春、蔡畅、李维汉、肖劲光、熊瑾玎、朱端绶、张唯一、董维健、周以栗、方维夏、柳直荀、龚饮冰、周毓明、曹伯韩、夏曦、凌炳、毛干卿等。先父寓所，总有同志们来下围棋，打麻

将。先父看到这些同志们在战斗闲隙中还可以轻松半天享受些文娱，总是乐不可支地亲自当炊事员预备茶水。记得有一次富春同志曾陪同聂荣臻同志来先父寓所作客，谈笑很起劲。当时党组织经由李维汉同志与先父有联系。最近李老听到我在写有关先父这部分的回忆录，特给我们兄妹来信，对先父晚年在上海的政治情况也作了回忆，来信说：“那时党内许多同志也都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谈及剑老时，对他有好评。那时间我和他来往，他曾提出申请入党问题，我表示他的愿望很好，可以向中央转达。同时希望他多看点马列主义书籍和我们党的宣传刊物（我给他看过党的刊物），考虑成熟再正式提出申请，不幸他不久和我们永别了。”

一九三一年，先父开了一个酒店作居家掩护，最初在上海旧法租界辣斐德路，后迁沪东提篮桥旧公共租界东西华德路，一九三七年日寇攻上海毁于炮火。开了酒店不几天先父胃癌恶性发作，进入旧法租界原霞飞路马浪路口刘之纲医师的申江医院，不久又迁入宝隆医院，没有麻醉剂就止不住痛，终无起色，延至三二年春末去世。张唯一、董维健、戴晓云等先父的生前友好主持丧事，安葬在上海公墓。葬毕舅父魏肇文在申报上登了一则代讣通告其他亲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上海，强将上海公墓铲平改筑飞机场。幸得周南的学生周砥同志闻讯将先父遗体移厝附近庙行。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先母在北京逝世，经领导批准，将先父遗灰运来北京与先母遗体合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徐特立同志为立碑题名，张唯一同志三二年写了一篇悼词，在敌区白色恐怖之下，我将原稿保留下来了。熊瑾玎同志一九五三年亲为之书，石刻成墓铭；铭曰：

“树植女校，肇公之业；拥护革命（原稿为‘辨识群界’，一九五三年张唯一同志改为‘拥护革命’）竟

公之节；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公已寄期望于嗣哲；物化歆虚，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

一九六七年极左思潮肆虐，个别狂妄之徒，倡导去八宝山刨掉先父母的坟墓，幸得陈镇雄、谢友新二同志驰报熊瑾玕同志，熊老出面极力劝说：“朱剑帆一贯拥护党，生前是毛主席的知交，他两老的坟动不得。”才免于难。

结束这篇回忆录时又不禁想起了本文首段所记的国庆十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东湖和美籍历史学家杜波伊斯等谈话的精神：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要怕鬼！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谭祖尧、吴平地烈士殉难始末

龚 灿 滨

我早已不写任何文章了，但几十年来，一些烈士的崇高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让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湮没下去，作为后死者，会毕生感到内疚，因此，写成这篇回忆。

谭祖尧烈士(一九〇二—一九二七)，字述尼，四川江津高站公社人，贫农出身。他八岁入私塾，五年时间，熟读了儒家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历代诗文，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十三岁肄业于白沙镇立小学。他对中国画很感兴趣，三年的临摹和创造，乡里张挂的屏堂条幅，多出自他的手笔。一九二〇年，祖尧入江津中学，一年后转学到重庆联中。恰值白沙的一位同学田俊杰也在这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次，田俊杰病了，祖尧在寝室里夜以继日地护理了五天。田的病情还在恶化，有人介绍郊区一位名医，祖尧深夜步行了十余里，天明时才和医生一起来到学校，终于治好了田俊杰的重病。一九二二年秋，他得到田的资助，升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军阀、官僚、豪绅压榨的苦难日子。北京的一些进步青年受到李大钊同志在报刊上及各种讲演会上宣传马列主义的影响，认清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谭祖尧同志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当时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又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负责人，谭祖尧同志兼任两处的秘书。

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办的《新青年》杂志停刊以后，谭祖尧同志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在北京建立“新军社”，并创办《新军》杂志，时人誉为《新青年》杂志的再现。

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的一位女同志李婉玉，原籍浙江，父亲作官定居在北京，因此算是北京人。她和谭祖尧是美专的班同学。一天下午，她在教室里画一把杭州摺扇，左半面一丛芭蕉，旁边站着个妙龄女郎若有所思地遥望着天际，右半面题了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傍芭蕉立，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同志静静地仁立在旁边观看，李猛一下抬头发现了。她把摺扇递过去，爽朗地说：“请你也题上一首诗吧。”

谭略一沉思，就用课桌上的笔墨也写了一首：

莫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足风流。

碧天翘首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愁。

李婉玉看了，莞尔一笑，把摺扇递给他：“赠给你！”不久，李婉玉同志加入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她是中共北方区党委和国共北方执行部的地下交通员，谭的亲密战友。

一九二四年前后，是国内大动乱时期。孙传芳霸占江浙等省，自称五省联帅。西南军阀各踞一隅，关卡林立，弄得民不聊生。华北和东北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分别盘踞。

吴佩孚拥戴的曹锟，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为了统一祖国，挽救危亡，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创立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准备北伐，扫平军阀。一九二四年秋，直奉两系发生了第二次战争，战场延展在京奉、京汉铁路沿线。直系军人冯玉祥被吴佩孚调在左翼作后备。冯玉祥行伍出身，清末由一个列兵升到标统，当时任吴佩孚属下的混成旅长，所部近万人。他尽管是一个旧军官，但思想却有进步的一面。他是赞成北伐，统一祖国的，与国共两党早有默契。同年十月，正当直奉两系鏖战正酣之际，冯玉祥率部一个急行军，占据北京，拘囚了曹锟，把清朝最末一个皇帝溥仪赶出宫廷，消灭了封建余孽。他商得张作霖同意，迎段祺瑞作临时总执政。一九二七年春，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势如破竹，攻下长沙，直取武汉。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东北已久，便怂恿张作霖出兵驱逐冯玉祥，从而占据北京、廓清华北，好让自己霸占东北三省。这一阴谋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北京学生的愤怒，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谭祖尧同志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高仁山先生担任大会的主席。会毕，八千多人由高先生率领，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议，不准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制止张作霖发动内战。执政府卫队竟用大刀、刺刀对付群众。群众毫不示弱，向大门直冲。卫队开枪了，当场死者四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被迫下台。张作霖在日本军舰的配合下，进占北京，冯玉祥退往南口。日本政府和张作霖认为，北伐军进展很快，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

的五省部队被击溃，即将挥戈北上。北京国共两党的活动，对他们是心腹之患，非铲除不可。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一位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偶然透露出张作霖不久将实行大逮捕、大屠杀的消息，我得知后，深夜赴东交民巷苏联使馆通知谭祖尧同志。他立即转告李大钊同志，劝李立刻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在室内踱了几步，以坚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张作霖不敢冒此大不韪……”接着又说：“离开，北方的党组织会解体，至少党的工作会停顿。北京嘛，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和祖尧同志肃穆地站在一边，最后怀着忧虑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路上，我悄声对祖尧同志说：“你们住在苏联使馆，尽管按照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仍必须提高警惕。”他答道：“没关系，我们白天从不外出。即使有重大任务，我们都要化装后深夜行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夜十二点，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派一千多名侦缉人员和军警相配合，按名单搜捕，在苏联使馆捕去李大钊、谭祖尧和另外两位同志，在四川会馆捕去吴平地，其余在各大学宿舍搜捕了大约五六百人。

事后得悉：公使团（除苏联外）为了消灭“赤党”，暗地允许张作霖派中国宪警进入使馆区作一次搜查。中国独立富强之日，即帝国主义在华失利之时，这道理他们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即使违反他们在中国取得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也顾不得了。

吴平地烈士，别号吴雷（一九〇三—一九二七），四川江津永安公社人，一九一七年入江津中学八班肄业。一九二三年升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吴平地同志一向坚持

真理，刚正不阿。平常讨论问题，他立论雄伟，声震屋瓦，别人说他象打雷似的，他说：“‘平地一声雷’，我就别号吴雷吧。”

他被捕后和同案人一起关在京师第一监狱。一个狱卒是四川人，曾亲眼看见当时审讯吴平地同志的情况：

茶几上泡了两盏盖碗茶，左右各放一张旧式木椅。吴平地同志被带到审讯室，审判官用手一指：“请坐！”接着问：“你叫吴平地吗？现年多少岁？哪里人？住哪所学校？”

“我叫吴平地，现年二十三岁，四川江津县人，住师范大学中文系。”

“请你谈谈，三民主义有哪些好？”

“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地主和资本家不再剥削工农大众，人人有衣穿饭吃。”

“共产主义有哪些好呢？”

“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中国独立富强。”审判官狞笑了一下，摆摆手：“带下去！”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在京师第一监狱绞杀了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二十人。当时各大报纸，如《北京晨报》、《世界日报》都登载了二十位烈士的姓名，有的还刊出了烈士行刑前的照片。

这次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学术界以及南方革命党人的无比愤怒。北京的进步青年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同国民党员纷纷南下，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北伐军胜利的步伐，也加速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彻底灭亡。

我和乡人吴清汉，向江津留津京人士募款一百六十余元，买了两具棺木、两匹白绸，从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吴两位烈士的

遗体，雇汽车送往北京南郊四川义地安葬。当薄薄两具尸棺被揭开时，烈士颈上还有一圈乌黑的血痕。谭祖尧烈士胸前有盘大一团血块。李婉玉同志和她妈妈是亲临义地的。她目睹惨状，奋身向尸棺扑去。我和吴清汉手急眼快，趋前扶住，她已晕过去了。我们叫汽车先送她母女回转家里。

坟墓垒成了，举目一望，衰草离离，凄风阵阵，我和吴清汉相对无言，不免流下泪来。遗憾的是，我俩也必须马上逃亡，无法为烈士们刊碑立石，供千秋万世的凭吊。我们肃立在坟前，默默地祷祝：两位同志安息吧！你们没有死，你们的英名将与世长存！

三年后，从北京归来的一位同乡对我说，李婉玉同志回家后一直神经失常，在家里不时呼号打倒张作霖。她弄来一把锋利的匕首，藏在腰间：要杀死张作霖报仇。一个深冬的夜晚，她守候在张宅的胡同阴暗处，彻夜未归，第二天发现，她已经冻死了。李婉玉同志愤恨以死，我认为不是家恨而是国仇。她和当时死难的二十人一样，应该尊称为烈士。回忆祖尧同志的题扇诗：“不为家愁为国愁”，这也许是“诗谶”吧。

（一九八一年八月）

穿针引线

——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

杨 德 华 遗 作

受命传达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后，邹韬奋先生介绍我到新疆协助杜重远办《新生命》刊物。同年十二月，我便启程赴新疆。至张接时，突然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万分高兴，认为这是时局的转折点，应暂不赴新，赶回上海为宜。于是我便回程，十二月底到达西安，又获悉张学良已释放蒋介石并送回南京了，我即找上海救国会西安分会商定行止。一九三七年元月初旬，由救国分会负责人车向忱介绍我到西安七贤庄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他俩和我作了数次十小时以上的谈话，详细地向我说明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解释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联合各阶层、各党派抗日救亡的统战政策，使我尽释疑虑。接着，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我立即回上海向救国会传达党的政策。我领会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意图，便欣然从命，立将周、叶所谈

摘记为十要点，以带回传达。

这十要点是：1、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阶层、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各群众团体走到抗日救国的阵线上来；2、组织联合抗敌委员会，共同争取抗日救国的胜利；3、停止分田运动，实行减租减息；4、切实保护工商业；5、号召各阶层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主意出主意、有办法出办法；6、国共不要敌对，反对摩擦消灭异己；7、共产党主张不杀蒋介石，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谁与蒋介石有深仇大恨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上亲日派何应钦的当，避免引起内战；8、送蒋介石回南京是恰到好处，蒋介石回南京如不实行抗日诺言，就会众叛亲离；9、抗日战争开始后可能有困难有挫折，但只要本着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去做，光明胜利必属于民主力量；10、只要各方面开诚布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厉精图治，中国复兴大有希望。

周恩来同志十分精细，临走前要我复诵一遍传达要点，我毫不遗漏地复诵一遍，他才满意地让我告别。

我回到上海向救国会成员传达；再到南京在田汉同志家里向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三十多个进步师生传达；又转至汉口、武昌分别向新生命书局、生活书店职工及武汉大学进步师生传达，当时武大外语系代表李锐（共产党员）也在座，参加听传达的共约三十多人。在广州我向中山大学、私立勤勤大学进步师生四十多人作了传达，记得石不烂同志（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到广西梧州李济深先生家，他和他的侍从副官黎民任等人也听了传达，并议论了半天。第二天我与李济深先生回香港一同在蔡廷锴先生家传达，商谈半天，决定由香港《大众

日报》主编任毕明主持，举行中外记者、作家、文化界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三十多人。我根据十项要点又作了传达。第二天由《大众日报》刊出，后在香港九龙李章达、何思敬两先生家也曾分别作了传达，总共历时一个月才完成传达任务。

李济深、蔡廷锴两先生听传达后，极为振奋，但仍有疑虑，深恐蒋介石流氓成性，出尔反尔，回南京后会背弃诺言，发动内战。于是李济深先生亲笔写了一封信（蔡廷锴先生也附笔），托我亲送到西安给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转毛主席、朱总司令共阅，并请求复示。信中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误国害民深表不满，说昔福建人民政府大政方针基本正确，未能实现深为遗憾，现仍请考虑采纳，并要求迅速开全国政治会议，他两人下破釜沉舟决心，准备随时赴延安出席会议，是否可行？请毛主席决定。详情托我面呈，并口头交代我传达他们的想法，说不应送蒋介石回南京，恐遗后患，不堪设想。

我带了李的亲笔信，作为李济深先生、蔡廷锴先生的密使，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到西安。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介绍我到延安，经伍修权同志安排，在延安旧城石窑洞晋謁毛主席。毛主席说，欢迎李、蔡两先生来信，所陈意见，主要是联合抗日反蒋救国，有积极意义。又说，李、蔡两先生都是国民党的抗日民主派，蔡先生还是上海抗日十九路军名将，李先生又为倡建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席，只可惜当年我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王明有关门左倾教条宗派主义等偏向，以致李、蔡先生派代表到瑞金协商联合反蒋抗日救国没有成功，甚为遗憾，应请李、蔡两先生谅解。毛主席又说，可是如今不同了，我们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决心搞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特别是当前要做的以抗日救国

为首要任务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李、蔡两先生的意见我们赞同，唯有一点不同意，就是李、蔡两先生想即来延安，共商国事。我们认为还是暂缓来延，仍安心在国民党区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适当地批评蒋介石恐日投降、联美反共、误国求荣大错特错的老一套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大力联合各方力量，推动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人士行动起来。将来主客观条件成熟时，我们共产党再请李、蔡两先生命驾西北共商大计，共同策进。今天，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吸取北伐国共合作，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能开诚布公保证长期合作。当然，来日道路可能有曲折，但应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伍修权同志引荐下，我又一一会见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廖承志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分别与我晤谈两小时至三、四小时。在延安一周，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中央各领导的细心教育。

从延安转回西安又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他俩主张我即再回香港向李、蔡两先生汇报党中央的意见和延安的见面概况。

我返回香港向李、蔡两先生复命汇报后，他们皆大欢喜，欣然同意，并叫香港《大众日报》主笔任毕明召开香港新闻界数十人的座谈会，我化名杨萍介绍西安事变前因后果，和在延安的参观见闻。在座谈会上，记者问我对延安的印象如何？我回答了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印象。当时香港《大众日报》等对座谈会都作了报导，扩大了宣传，影响很大，提高了群众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争得了海外华侨、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拥护。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我从香港回上海，再到南京傅厚岗

中央办事处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汇报了李、蔡两先生的积极态度后，周恩来同志说：“特别希望你今后在李、蔡和李宗仁、白崇禧及两广军政界方面做些统战工作，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奋 战 在 五 战 区

“七七”事变后，我随李济深、蔡廷锴两先生到上海南京从事抗日组织宣传活动。李济深应阎锡山之请，将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济深、蔡廷锴劝我随去作幕僚以协助工作。经周恩来同志同意，并介绍我到太原接任后，与彭雪枫同志取得秘密联系（当时彭雪枫同志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不料到太原后，李济深不满阎锡山放弃太原降日的不抵抗主张，一周后即愤然而返南京，我也随返南京。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同志主张我到桂系工作，因我较了解桂系情况，在桂系军队中有不少武汉军校的同学，很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于是我又通过李济深先生的介绍，于一九三七年初冬到徐州，参加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筹备工作，任司令部中校参谋。初时由我综合办理作战、情报、后勤、战教、备战等工作，后分工主管后勤与情报等，最后又主持战教动员等业务工作，兼与李宗仁的主任秘书夏次叔办理五战区总动员会工作。那时按约定，每月我到汉口参加战区代表会时，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李克农等同志汇报情况，使我党随时掌握五战区所辖二亿人口地区敌、友、我动态，和所指挥的五十万地方杂牌军概况。我每隔两、三个月将五战区作战计划送给八路军办事处作分析敌、友、我动态的参考，有时

交章汉夫同志代送，因章为新华社特派记者。

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不战而奔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曾誓言与首都共存亡。南京失陷，他只身逃到徐州，李宗仁问他：“你不是讲与首都共存亡吗？”唐生智答说：“我是一个光杆司令。宋希濂等人带着十万蒋家军经浦口逃跑，我追问时，他还说是奉蒋命撤退的，所以我也只好逃亡以待时机。”那时我正在写一本《抗日必胜之路》的小册子，于是在小册子里引用唐生智的以上谈话加以评论：“古有名训，只有亡国之君，才有亡国之臣，只有亡国之官，没有亡国之兵。难道代表五亿人口的首都南京，还不如只代表千多万人口的马德里吗？！我们黄帝子孙，深望守土保民有责的当道者，猛醒回头团结御侮，秣马励兵，抗日救亡，才有前途，否则遗臭万年，后悔莫及……。”不久我到武汉见周恩来同志，请他对我写的小册子提些指示意见，他很坦率地说，关于唐生智一段评语有点过火，易招误解，反遭攻击，希我注意在团结抗日中搞好革命统战工作。周的指示使我此后在统战工作中注意防止极左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徐州突围，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要我代理五战区参谋处长，计划并指挥从徐州到阜阳与信阳的突围。突围中有二十担机要文件和作战地图，由少校参谋蒋元押运。行军第三天，情况紧急，蒋元以电话向左翼指挥官曾志沂、蔡灏请示，经他俩同意将二十担机要文件和作战地图淋上火油付之一炬。后来曾、蔡不认账，先给蒋元降职处分，又阴谋诬害我，密电请蒋介石军委对我执行军法处理。机要处长李扬将电报内容私下通知我，要我注意应付。我乃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蒋介石嫡系分子阴谋排挤打击我桂系人员的真象，同时向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同

志汇报，坚请离开五战区司令部。叶剑英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并当面告诉我，中央已批准我入党，以一九三七年为后补期，于一九三八年转正。又嘱咐我说，今后党和我只单线联系，要我遵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方针，没有上级通知不能发生横的组织关系，坚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以保安全。李克农同志当时亦在座，还对我说了些赞扬鼓励的话，从此我成为光荣的共产党的一员，感到党对我十分信任，党交给我的革命工作，责任是多么重大！

为了离开五战区司令部，一九三八年七月，通过李济深先生的关系，经李宗仁、程潜的批准，我以五战区上校高级参谋兼河南省商城县长名义到商城县工作。中共长江局通过叶剑英、李克农同志介绍共产党员魏文伯到商城做地下党县委工作，行政职务是县政府主任秘书，共产党员马纪新任县常备大队主力中队指导员，亦参加地下县委工作，我们相互配合，决定相机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

商城是有三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物产丰富。原县长陈守常是蒋介石派来监督李宗仁的蓝衣社分子，任县长不到一年，即贪污毫洋十万多元。土匪出身的大土豪劣绅顾敬之自封第二纵队司令，拥兵五千，鱼肉人民，全县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我和魏文伯同志商量，决心除此两大害以争取群众，乃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他们压榨人民的罪状，准备将他们押起来审判治罪。陈守常闻风带一个班的兵连夜逃跑，我们派兵追了两天两夜未获，他终于跑到重庆去了。顾敬之也买通河南省民政厅长，把他调走包庇起来了。陈、顾虽然走了，但已大大地伸张民主，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情绪，群众认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民主廉洁政府，非常

拥护爱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凭着他掌握战时军政大权，藉口英山比商城县更为重要，是安徽省战时省会金家寨南面的屏障，要调我到英山，仍以高参兼英山县长。我知这是他的调虎离山计，便与魏文伯、冯纪新等地下党同志商议，决定率领现有一千人枪武装起义，到鲁南枣庄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特派冯纪新和魏棣华同志到立煌县找中原局的联络员张劲夫和周维等同志，转请中原局负责人郑位三、李先念等批准行事。但他们很不同意，并且批评我们将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错误，我们只得将县政权和平移交。

一九三九年元月初，我奉命调到英山县工作，魏文伯同志也转到英山任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原商城工作人员大部也来英山工作。县府科长、组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县常备队长及分队长以上多是共产党员，区乡抗日救国小组长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岳平是英山乡工作组长，甘怀勋初到英山时也是乡工作组长。英山县只有二十五万人口，比商城县人口少十万人，但属老苏区，群众基础比商城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抗日的十九路军仅存的一七六师区寿年（蔡廷锴的外甥）部约一万五千人枪，这时也调驻英山，与我们密切合作。当时英山县基层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这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利条件。

我们到英山后，总结商城的经验教训，注意斗争策略，在不影响抗日统一战线前提下，作有利、有节的斗争。首先，大力号召群众检举贪官污吏、土匪汉奸，群众揭发前县长傅块梅贪污毫洋三十万元，走私漏税做鸦片生意，无恶不作，他和他的两个老婆都抽大烟。但他的后台是陈诚，投鼠忌器，我们决定放过他，

只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斗争了傅块梅，后由陈诚将他调往重庆。对其他四十八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土匪和有严重贪污勒索的区长、保长，经过公开审判，全部报上级批准处决。对此，英山二十五万人民无不称快！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集中全县人力、财力、物力干抗战，我带头减薪，我原每月领上校薪金毫洋二百四十元，自动减为每月领薪金十元，县府五百工作人员，一致响应减薪，每月节省开支两万余元。

我们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十大政纲，在全县实施。十大政纲是：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减租减息，保护工商业，规定合理利润；节约财政，发展生产；任人唯贤，县、区、乡村长实行民选，县长三年改选一次；政府军队严明纪律；区乡联防，坚壁清野；发展文化教育，每乡办一小学，每区办一中学；扩大统一战线，镇压汉奸敌特等。实行民主改革一年，英山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二十五万人民和两万军队的粮食供应绰有余裕；还在一年中举办了七、八期抗日救国训练班，每期五百人，训练乡村骨干和游击队民兵骨干，其中党团员约占四分之一，党员发展到三百人之多。由于做好统战工作，基本上达到党、政、军、民、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联合在抗日旗帜下，取得多次反扫荡的胜利。

一九三九年夏季，日伪军八万人从湖北黄梅县向英山扫荡，被区寿年一七六师（包括四十八军一部，三万人）和地方部队（两万人）共同击退，俘日伪军一百余人，人心大振。一九三九年秋，日伪军五万人自浠水、黄冈向英山进犯，又被一七六师和一万地方部队击溃，俘虏和击伤日伪军三百多人。一九三九年冬，

日伪军三万人从宋埠县、麻城县向大别山区作第三次扫荡，新四军江北部队高敬亭支队五千人与英山县地方部队五千人，加上第七军张淦一个师，区寿年一七六师半个师配合作战，又将敌人击退。连战皆捷，震动了中原地区。廖磊便假装开明，到英山县视察，他不得不承认说：如各县都如此，抗日一定胜利。他回去汇报后，李宗仁即授英山县为第五战区模范县称号，传令嘉奖。当时曾编印了一本关于英山抗日建政保乡救国工作纪要的小册子。一九四〇年冬，我到重庆，在新华书店见沈钧儒与邹韬奋两先生时，他们说准备翻印那本小册子。后来我向周恩来同志请示，他说：英山县工作虽有较大成绩，可是人家说比解放区建政工作还左。党中央的策略是要你在白区长期潜伏，避免过早暴露，因此暂不要翻印。

一九三九年冬末，国民党反共暗潮已起，我被通知将调离英山县，我们又决定组织一万人枪起义，到皖东洪泽湖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派郑重与陈保华同志到立煌和望江东汤池新四军办事处汇报，并向安徽省动委会总干事张劲夫及何伟、周维等同志（他们是鄂豫皖边区党委的同志）报告，请他们转报鄂豫皖边区党委郑位三、李先念等负责同志批准行事，结果还是不同意，并受了与上次同样的批评。于是，我只好服从上级组织决定，被迫将县政权又作了和平移交。

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英山仅实行了一年，英山县人民普遍称英山政府使“万家生佛”。我于一九四〇年元月初奉调离开英山时，上万军民集队挽留我，自英山至罗田河四十华里沿途有数千军民欢送，很多人流泪哭别。这是全县军民对共产党的衷心爱戴，是对党的统战政策的真诚拥护。从此使

我更加相信群众，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更加认识到统一战线是我党的重要法宝。

我到了立煌（现金寨县，当时安徽省临时省会），初任皖干班上校军事科长，一月后调到潢川任第五战区抗日第三纵队代司令兼参谋长，并兼政治部主任约半年，我再连续派人和张劲夫、周维密商，请新四军望江指挥所速派军事、政工与电台主管等数十人来协助工作，准备不久在罗山组织二三千人枪起义。但也因上级组织不批准而作罢。

到延安学习

一九三九年底，廖磊在立煌（今金寨县）病死后，由非常反动的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兼大别山区抗日总司令，我不得已乃于一九四〇年夏借故离开潢川到信阳一线的原驻防地区，直往老河口见李宗仁，借口母亲病危，回桂探亲。我到重庆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向他们汇报情况后，又到桂林见李克农同志。后来，得恩来同志同意，我于一九四〇年冬初又返重庆，年底到延安学习。以后并参加整风运动。

一九四一年初，我调到延安中央统战部，总结白区统战工作，住在柯庆施处，草写我在中原大别山四年的工作总结。总结中提到这四年，我们曾为中原党组织和新四军输送了青年学生骨干一千人以上，枪枝千枝以上，法币千万元以上，子弹百万发以上。毛主席看了我的总结报告，便由柯庆施陪带在杨家岭住处接见我。座谈了两小时，毛主席说：“你写的中原大别山工作总结报告我已看了，虽然两三万字长些，但内容甚好，有些独特的创见。例如，执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取消反动保甲制度，改

为民主选举区乡村长制等十项施政纲领，可供参考。可是也有遗憾，在总结中所提到的商城、英山、罗山准备先后三次武装起义，都未得到上级批准，值得注意！可能是中原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的郑位三等同志不了解全面情况，有右倾保守偏向。”最后毛主席还问到一九三九年夏秋间，叶挺、张云逸、朱克靖三人到过英山否？我答：“叶、张、朱三同志本拟在金家寨（立煌）访问廖磊后，在回新四军望江办事处时假道英山与我们相会的，但是当时安庆右派方治等造谣说英山是新四军基地之一，故不便来。”毛主席义愤地说：这是蒋管区一些反动官吏作贼心虚、危言耸听，是不足为奇的。末了，毛主席还问及在商城县和英山县的核心领导有几人？我答：“主要有魏新民（魏文伯）、冯纪新、陈保华、郑重、任达和我共六人。”毛主席又问这些同志现在如何？我答：“全部都撤到皖东、苏北新四军去了。”毛主席和柯庆施都说：很好很好。最后毛主席说：“中原和大别山的工作值得总结，以利将来再接再厉。”

跟随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我到延安马列学院和军事干部学习班学习半年。一九四二年又调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周恩来同志自重庆回延安，由王世英同志陪同我到王稼祥同志家会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参加党中央代表团，参加重庆谈判，并说代表团名单已经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审定，提请毛主席批准了。周恩来同志说：“这次代表团去重庆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相信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这给我以后在谈判工作中克服困难，完成任

务打下了思想基础。

代表团以毛主席为首，周恩来同志任团长，董必武同志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有叶剑英、廖承志等同志，我以高参身份参加代表团，主要是做李济深、蔡廷锴先生和各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兼做一些有关两广的军事策反工作。

代表团在重庆与蒋介石、张治中、王世杰等首次会谈便发生冲突。第一次会谈即不欢而散。以后，在中央代表团的努力下，几经周折，最后达成“双十”协定。

在谈判期间，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十分重视统战工作，每当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即由我护送到李济深、蔡廷锴先生家交换意见。李、蔡先生拜望会见周恩来和董老时，亦由我陪同前往。在往返途中，恩来同志常教育我说，做工作要“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董老也说，我们统战和策反工作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常以此作座右铭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除做好谈判保卫工作外，我还不时奉派乘专机护送军调小组的专用款数十皮箱若干亿法币至有关根据地，皆能安全无误完成任务。

一九四五年秋冬，在和美蒋谈判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带我到毛主席住处，研究豫南大别山西北李先念新四军如何与驻潢川一带的区寿年四十八军搞好统战关系，同时研究如何调走驻海南岛桂系韩练成四十六军，以减少对海南岛冯白驹同志游击根据地的军事压力。研究结果，准备利用区寿年是蔡廷锴外甥，韩练成与李济深的旧关系。按毛主席提示，恩来同志决计命我直接与李、蔡协商，由李、蔡与区、韩两人个别联系。后来，商得李、蔡

同意，他们用化学药品分写密信交我与区、韩联系。我先在上海新亚酒店与韩练成密商后，再和董老两人化装到上海法租界白崇禧公馆三楼与韩练成面商定计。当时白崇禧住在南京国防部，只有其妻马氏住在公馆里，我们乃得顺利进行密谈，终于说服他施计从海南岛撤军。

韩练成回海南岛后，遂速电李宗仁、白崇禧，借口为保存和发展实力，请调到华中华北前线，参加“剿共救国”。结果经国民党军委批准，于一九四六年调到山东。不久，在莱芜战役中，韩部被我人民解放军瓦解消灭，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旅长）被俘，韩练成亦来归我方，得到应有的优待。全国解放后，韩任甘肃省副省长。

一九四六年，李先念同志所部在宣化店附近突围时，区寿年也实践诺言作佯攻，实则掩护突围，使我军能安全顺利转移。

一九四七年春，广西民团总指挥梁翰嵩到南京访我，意欲起义，报请周恩来同志批准。董老和我直接与梁翰嵩会谈三次，决定由梁氏回桂后与地下党联系，在他的老家宾阳县黎圩镇武装起义，公开发表声明，响应我党我军革命号召，提出拥共反蒋救国保家的主张。惜梁氏返桂后，还未与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即首先发表声明单独起义。后来遭广西保安副司令莫树杰派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梁氏之家，梁氏与其秘书周可传率二、三十人仓惶应战，以众寡悬殊，梁氏和秘书均阵亡，起义乃告失败，教训实深。

在香港做统战工作

一九四七年春，国共谈判破裂，代表团撤回延安，我奉调到香港华南分局做统战工作。党中央指定我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

直接领导，主要继续做李济深和蔡廷锴两先生的统战工作，并通过他们进行游击队军事干部培训和策反工作。董老对我说：“必须全力做好李、蔡统战工作，比争取国民党十几万军队作用还大，不可轻视。”我曾陪同方方同志与李济深、蔡廷锴先生会谈共六、七次。李、蔡乃在香港屡次发表公开声明，抨击蒋帮反共内战降日投美祸国殃民罪状，同时重申追随我党创建民主新中国到底，完全同意随时北上参加全国新政协和新中央人民政府。这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我党协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罗便臣道办游击训练班，龙云以中央民革名义捐港币二十万元，李济深、蔡廷锴、方方、潘汉年、尹时中、应云霖和我共七人负责军事小组，我曾负责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课程。训练班前后举办三期，每期训练一个月或两个月，每期训练约三十人，共训练一百人左右。训练班学员受训后都回广东，成为游击队的基层骨干。

在滇桂黔边区纵队期间

一九四八年夏，我完成协助方方同志做李济深、蔡廷锴两先生的统战任务后，便申请去做军政工作，华南分局即分配我去滇桂黔边区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滇桂黔边区纵队是由云南、两广及贵州游击队抽调五千人于一九四八年组成，先在越南的谅山、高平一带农村集中整顿训练（左、右江游击队未派人参加整训），整训一年后还有两千多人，待机配合祖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回滇桂黔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以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我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初离开香港，奉华南分局之命去滇桂黔

边区纵队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先经龙州水口向莫一凡领导的左江游击队传达，后到谅山向游击队传达。传达内容主要是：1、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大军南下；2、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3、搞好统战工作，集中力量打倒最反动的地主，争取开明士绅，中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保护工商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4、积极发展党团员；5、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6、要尊重爱护团结越南胡志明主席的部队，必要时以战斗支援越南人民军。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到滇东罗平县传达桂滇工委决定，成立以罗平为中心的罗盘地委，刘清同志任地委书记，杨江同志任副书记，委员有朱希敏、王纲正、张连琛、甘东、杨汝林等。地委负责领导云南省之罗平、师宗、富沅三县及南盘江、北盘江流域的武装斗争。以后在地委领导下成立边纵三支队（罗盘支队）。至一九五〇年初，三支队发展到一万多人。

滇桂黔边区纵队经一年半的大小战斗，由三千人枪壮大到三万人枪的武装力量，共十一个支队，两个独立团。

广西解放后，我奉命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云逸又手令我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分别到靖西、百色、旧州、南丹等地，直接和赖慧鹏、陈汉流、张光炜、莫树杰等谈判和平改编事宜。张云逸主席并命令兰州支队临时归我节制使用，以作和平谈判的后盾，最后完成了和平改编的任务。

（一九八一年八月）

飞越长江 解放杭州

金 冶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举世著称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一仗，歼灭了国民党在中原、华东战场上的精锐主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使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战线全部崩溃，其残兵败将龟缩长江以南，谋图作垂死挣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着每一个指战员，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人人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齐声欢唱着胜利进行曲，撤离了战场，进入休整地区。

当时，我在山东兵团司令部工作。兵团部于一月十一日撤离了皖北肖（县）、永（城）淮海战场，十五日进驻徐州东北贾汪地区休整。

在贾汪休整期间，华东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野战军辖第七、第八、第九、第

十计四个兵团，共十六个军，原纵队统一改为军。山东兵团改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兵团下辖第二十一军（原华野第二纵队）、第二十二军（原第三纵队）、第二十三军（原第四纵队）、第三十五军（原鲁中南纵队和济南起义的吴化印部合编）。

三野于一月中旬至二月下旬，在贾汪召开了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司令员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他在报告中，对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指挥，由李宗仁出面代理总统，玩弄反革命两手的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与我党进行“和谈”，一方面又在重整旗鼓，加强长江防务。陈毅司令员要求全军作好渡江作战进军江南的充分准备，千万不能松懈战斗意志。他还反复地详细地阐述了进军江南的城市工作和新区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开始期间，我一直跟随陈毅司令作参谋工作，自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山东战场的南麻、临朐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奉命分为东、西兵团。陈毅司令同粟裕副司令率领西兵团进入鲁西南，转入外线作战；许世友司令、谭震林政委率领东兵团，留在山东境内坚持内线作战。我离开陈老总，跟随许世友、谭震林同志在东兵团工作。一段时间以来，我同陈毅司令没有见过面。这次，在会议间隙，我专门去看望了陈老总，他问了一些部队情况后，勉励我要好好工作，今后还要打更大的仗，收复更多更大的城市。

这次会议上，粟裕副司令员总结了淮海战役的主要经验，提

出了一九四九年野战军的六大任务。围绕贯彻中央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从完成作战上，政权建设上，政策纪律上，党的建设与政治上，军队内外团结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要求。会议过程中还展开了关于渡江作战的具体任务，研究了进军江南的各项工作。这两次会议给大家很深刻的教育，很大的鼓舞，使到会的各级干部明确了任务，统一了认识。大家都表示，一定要争取一切时间，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随时准备在中央军委、三野的统一号令下，立即行动投入战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坚决完成解放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光荣任务。

(二)

渡江战役，第七兵团受命指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个军，担任黑沙洲（安徽庐江东）至棕阳镇（安徽安庆西北）一百公里的长江江防的突破任务，突破江防后向繁昌、宣城、广德、长兴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切断宁杭公路，协同友邻兵团，歼灭宁、沪、杭地区之敌，并直取杭州。这个光荣而艰巨的战役任务，鼓舞着全体指战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渡江作战是我军战史上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作战行动，是突破长江天险向富饶的宁、沪、杭地区的大进军，是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战略任务，大家都为自己能亲自参加渡江战役而感到自豪。

兵团部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军，于二月下旬开始，由贾汪地区陆续南下，进至安徽合肥一带，三月上旬又由合肥向长江北岸庐江、无为地区推进，从此，各部队即进入了全面的紧张

的渡江作战的直接准备。

兵团王建安司令员，谭启龙政治委员和其它首长，对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很细很具体。全军上下都清楚地认识到，战役准备充分与否，是关系着战役成败的关键，尤其是面临这茫茫的长江，怎样依靠我们现有装备，顺利地突破“天险”，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上从兵团司令、政委，下至每一个战斗员都在思考着，大家都在不同岗位上，争分夺秒地抓紧一切时间，完成自己的一切准备：各级召开各种会议，传达中央、华东局、三野的一系列指示，并结合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反复进行思想动员，明确任务，树立信心；政策纪律教育，是战前政治思想教育的重点课题，当时华东局统一制定的“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新区政策手册”、“城市常识”等文件，是全军指战员学习的主要教材，从上而下普遍地进行了教育。

这次渡江，主要靠木帆船，几十万大军所需的数量很大，兵团第一梯队展开两个军，第二梯队一个军，每个军需要五百至六百只，这些船只主要靠当地群众帮助，因此，动员筹集船只，加强船只管理、护修、训练，是战前准备工作中最实际最重要的问题。兵团首长非常重视此一工作，他们经常深入部队亲自检查船只的数量与质量，关心船工的思想情况与实际生活上的问题，广大船工在部队帮助教育下，政治觉悟和革命荣誉感大大提高，在战前都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要争取“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

部队在进入长江北岸后，立即掀起了群众练兵热潮，展开了以渡江登陆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广大指战员都知道，面对凭江固守的敌人，没有对付它的一套过硬本领是不行的。从

而，部队练兵劲头很大，普遍地利用河流、湖泊，利用已经控制的长江江面，隐蔽地进行水上射击、救护、游泳、上船、下船、划船、滩头爆破，以及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等课目的训练，训练中紧紧结合各自当面的敌情、地形、水情，广泛地开展军事民主，大家提问题、摆困难、钻技术、论战法，针对前面的困难，研究了种种办法。通过训练，有效地提高了渡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增强了战而必胜的信心。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兵团首长非常重视对敌情的研究，经常召集干部深入第一线，亲自观察长江南岸敌人设防情况。兵团进攻正面的敌人，是第八兵团刘汝明部的五十五军和第七绥区张世希部的八十八军，这些部队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的二、三类部队，战斗力弱，江防工事不强。我军进攻正面又是敌人两个兵团（绥区）的接合部，是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兵团首长召集多次情况研究会，他们总是告诫我们：敌人依托长江，凭借有利地势，以逸待劳，有海、空军配合，我们决不能轻敌、大意，要把“死老虎”当作“活老虎”来打；同时对国民党那些“高级将领”经常鼓吹的那一套，则从本质上揭穿它的虚弱性。当时，国民党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多次在国民党会议上鼓吹：“国军依托长江天险，并有强大海、空军，和后备武装，共军要强渡长江，势必要葬身鱼腹。”还说什么：“我们有美国援助，美国有原子弹，我们有现代化装备，现在我们的后备军，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六月就可以北渡长江反攻了！”王建安司令员在同参谋人员每次研究敌情的时候，总是以“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精神，结合当面的敌情，鼓励部队树立坚强的信心，要求各级深入地研究具体对策。从而，每次情况研究与地形

勘察，对作好战斗准备都是有利的推动。

敌人在长江北岸刘家渡土桥、棕阳镇安设了据点。这是敌人在我兵团正面伸向江北的警戒阵地，以此掩护其南岸主阵地的安全，并保障其海军舰艇往来游弋。每次研究敌情时，兵团首长特别重视这些“桥头据点”敌人兵力、火力部署，工事构筑与阵地编成的情况及其变化，并指示我们，要各部队随时准备，在上级统一号令下立即拔除之。野司命令，限兵团于四月廿日前，全部扫除江北敌之据点。据此，兵团部指示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于三月三十日发起对刘家渡土桥、棕阳镇敌人的攻击，部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一举攻克“桥头据点”，全歼守敌。四月十二日拂晓，二十四军乘江心太阳洲守敌换防之际，偷袭楔入，歼灭守敌，至此，我第一线部队进一步迫近了长江岸边，为渡江作战开辟了攻击道路。

王建安司令员很重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他常常亲自听取参谋人员反映的意见，经常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肃清江北敌之据点后，他同其它首长一起，召集了兵团部参谋人员，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他在听取参谋人员意见后，明确了第一梯队二十四军、二十一军渡江作战的具体任务，规定了渡江当天首先夺取紫沙洲，闻新洲，长生洲，余水洲，尔后强渡夹江，突破长江实施登陆。同时又进一步明确长期争论未定的炮兵任务，规定炮兵在渡江开始时，集中全部炮兵实施炮火准备，掩护步兵强渡长江，登陆作战。这次会议明确的任务与措施，在以后战斗实践中证明，是非常适时与正确的。

渡江战役前，四月八日谭震林政委从野战军司令部到了七兵团，准备随兵团一起行动。当时，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并肩渡江作战，是在总前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统一指挥下实施

的。渡江各部队统一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集团：第三野战军的第八、十兵团为东集团，担任张黄港（上海西）至金河口（南京西南）段的渡江作战任务；第七、九兵团为中集团，担任金河口至棕阳（安庆东北）段的渡江作战任务；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担任棕阳镇至湖口（九江东）段渡江作战任务。谭震林政委来到七兵团，一方面是加强对七兵团的领导，一方面又负责对七、九两个兵团（即中集团）作战行动的统一调度指挥。

谭政委到了兵团部后，召集兵团首长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有关同志，研究了解放浙江，接管杭州的各项工作。他提出：要拟制解放浙江全省的军事纲要；准备接收城市的干部；制定军代表的任务职责；准备浙江通讯社与报纸工作等等。谭震林政委的指示，使我们领悟到七兵团进军江南后的具体任务，就是解放浙江，接管杭州。同时，谭政委又非常具体细致的考虑到兵团部进入杭州后，对于城市接待工作，办公制度，城市警卫，巡逻制度，以及军管会的牌牌、关防、印章等等，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准备，并制定各种细则、样式。这使兵团部指挥机关的工作，从当前着重考虑研究的突破长江的作战计划，进一步到深入研究解放浙江接管杭州后的各项政策和具体工作。

全军上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而又艰苦的努力，各项准备基本就绪，部队整装待命，真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雄师”就要立即开始“过大江”了。

（三）

四月十八日，兵团部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国民党南京政

府拒绝在双方谈判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央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发起渡江作战。随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直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总前委和三野指示，七、九兵团（中集团）提前于四月二十日夜发起渡江作战。东、西集团于四月二十一日夜发起渡江作战。全军接到命令后，个个磨拳擦掌，情绪激昂。我们都深深意识到伟大的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江南广大地区即要解放了！千百万父老兄弟即要重见天日了！渡江作战的时间由于谈判原因，曾经几次推延，广大指战员早已迫不及待了。大家知道，到了四月下旬长江流域雨水增多，江水可能突然暴涨，这将对渡江作战增加更多困难。因此，到了四月中下旬大家都生怕作战时间一再拖延，影响渡江战役任务的完成。因此，中央军委命令四月二十日发起渡江作战，正是火候。全军上下无不欢心鼓舞，热烈欢呼，深感中央决定无比正确，无比英明。

四月十八日夜，兵团首长决定，兵团指挥所立即向前转移，进驻长江北岸襄安镇，准备遂行渡江作战的指挥任务。当夜，主要突击方向的二十四军指挥所，亦由襄安镇向前转移，进至江边凤凰顶。战斗中凡是上级的指挥所向前推进，下级的指挥所随之必须向前推进。“干部指挥提前，深入第一线指挥”是我军的战斗优良传统，也是战斗即将打响的必然的具体步骤。

四月二十日傍晚，夕阳西下，艳丽的晚霞映照着茫茫的长江江面，江水冲击着长长的堤岸，激起的一阵阵的浪花，有节奏地发出哗哗的击拍声。这是不平凡的一夜，也是久已期待的一夜。

然而，朦朦天空，星星闪烁，依旧如故，长江两岸两军对峙，象往常一样平静，南岸蒋军只有来往走动的哨兵，注视着江面的动静，北岸我军已静悄悄地全部出动，准备船只飞越“天堑”了。

二十日十九时三十分，我军炮兵全部炮口对准了南岸敌人的阵地，在一声“开炮”的统一号令下，突然猛烈开火，一道道雪亮的火光，象一把把利剑，划破了黑沉沉的夜幕，一排排猛烈的炮弹，翻腾起滚滚的浓烟。顿时，呼啸的炮弹，密集的炮火，接连在敌群中开花、爆炸，紧接着无数船只，一起由长江北岸，扬帆启航，船只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乘风破浪，向着长江南岸预定的目标疾速前进。二十一时十分，二十四军第一梯队两个师，与左翼友邻部队并肩突破了长江防线，攻占了闻新洲、紫沙洲，接着又强渡夹江，一举突破了敌人南岸江防阵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的反击，建立了滩头阵地，站稳了脚跟，并迅速地向敌纵深铜陵、顺安方向发展进攻，与荻港方向二十七军进攻部队紧密配合，扩大战果。二十一军第一梯队两个师，二十日夜一举突破并占领了长生洲、余水洲，顺利地完成了当天占领江心洲的任务。

二十一日，战斗在继续发展中。二十四军先头师攻占了铜陵、顺安要点，第二梯队又顺利地渡过了长江，投入了纵深战斗。二十四军王必成军长于二十一日午在长江南岸，通过报话机同我通了话，他说：“二十四军全部过了江，南岸敌人防御已被突破，敌纷纷向南退却，我军正向南陵方向发展进攻，追击敌人。”我把情况向兵团首长作了报告，他们知道长江防线已被突破，敌人开始退却，渡江战役第一炮打响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要二十四军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向南陵、宣城方向追歼逃

敌，并要注意与友邻联系，密切配合。

当时，又接到野司通报：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于四月二十一日亲赴芜湖前线指挥，企图堵击我军南渡部队。但是，就在当天（二十一日）夜，渡江作战部队全线发起了强大突击，突破了长江全部防线，敌人堵击计划已变为溃退行动了。

汤恩伯未到芜湖前，防守芜湖以南贵阳一带的敌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获悉“共军大举渡江”，于二十一日中午决定“放弃江防”，命令其所属的五十五、九十六、六十八三个军全部向皖南屯溪、江西浮梁退却。汤恩伯知道刘汝明部不战而退后，命令他：

“就近停止，集结所部协同七绥区二十军、九十九军反攻，围歼从荻港渡过江南的敌人。”但刘汝明为保存实力，根本不理汤恩伯的什么命令，其部队早已由皖南向福建方向溜之大吉了。防守芜湖及其以北的七绥区张世希的二十军、九十九军也已败退，二十一日在芜湖东南湾址附近遭到我军截击，溃不成军，大部就歼。汤恩伯的堵击计划完全成为泡影。

二十一日夜，王必成军长在报话机里又一次同我通了话。他说：二十四军已经占领南陵，并与二十七军取得联系。由荻港方向南逃的八十八军，在南陵附近大部就歼。兵团首长获悉防守长江之敌开始溃退的情况后，要我立即告诉王必成军长，要求部队迅速向宣城、广德方向发展进攻，追歼南逃之敌，与东集团部队密切配合，切断敌人退路，围歼向杭州、浙赣线方向退却之敌。二十四军部队英勇顽强，乘胜向南勇猛追歼逃敌。

二十一军主力于二十一日夜，与安庆方向的第二野战军部队并肩突破了上下江口敌之阵地，占领了沿江各要点。兵团首长指示，要二十一军迅速向泾县、宣城方向攻击前进，并命令二十二

军立即渡江，尾二十四军之后，向宣城、广德方向前进。

战场形势发展迅速，各部队乘胜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扩大战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便于指挥纵深战斗，兵团首长研究决定：兵团指挥所于二十二日夜渡江南进。二十二日夜二十时许，兵团指挥所在太阳洲起航南渡。当时，我在太阳洲码头指挥兵团部的航渡，兵团首长乘坐第一只船，于二十时二十分起航，指挥所的参谋人员、机要人员、电台、政治部干部分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只船，先后起航。正当船只扬帆南驶时，突然间西边江面传来一阵阵激烈枪炮声，枪声愈来愈近、愈来愈激烈，随之江面出现了四艘国民党舰艇，急速从西向东驶来，情况突然，一时显得异常紧张。原来是敌四艘巡逻艇，由安庆方向向南京方向逃窜，在太阳洲以西遭到我渡江部队节节截击，敌仓惶应战，边逃边打，在太阳洲附近巧遇我兵团指挥所各船只起渡。当时，深怕敌艇撞上指挥所各船只，而遭受损失，但敌是惊弓之鸟，唯恐遭致歼灭。当遭我沿途部队层层阻击，竭力加大航速，夺路逃命，无意恋战。因此，敌艇在经过我指挥所各船只翼侧之后，仅仅是激起了一阵阵的浪涛，引起了各船只上下颠簸，而无损我军一发。兵团指挥所于二十二时许，全部安全抵达长江南岸。这时，我回忆起八年前，“皖南事变”前夕，我们皖南新四军军部一千多干部，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从宁沪路丹阳、常州之间化装偷渡长江，三三两两历尽艰险，分批渡过了长江，到达苏北。那时，国民党气焰嚣张，奸计恶毒，有意地把我皖南北上干部的行进路线告诉了日伪军，图谋借刀杀人，消灭我军大批干部于长江两岸。但是，八年后的今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飞越天堑，在短短的二三天内，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真是：“钟山

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摧毁了敌人大肆鼓吹的“不可逾越的长江防线”，回顾昨天的情景，眼看今天的形势，瞻望明天的前景，心情万分慷慨激昂。

二十三日全线战斗迅猛进展。

东集团部队，从浦口渡过长江，胜利地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城。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的复灭。消息传来，全军欢喜若狂，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纷纷表示，以歼灭更多敌人，解放更大地区，庆贺渡江作战的彻底胜利。

汤恩伯在长江防线全部崩溃的情况下，被迫实施总退却。他于二十三日命令各江防部队向杭州总退却。

当时，兵团指挥所正进至繁昌县城。兵团首长在研究了当面敌人溃退的情况后，决定第一梯队的二十四军、二十一军迅速向宣城、广德、长兴方向追歼逃窜之敌；第二梯队的二十二军随后跟进，伺机投入战斗；要求各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猛打猛追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奋勇直前，抓住敌人，迅速歼灭。

从二十四日起，战场连日大雨，部队踏着泥泞，忍受饥寒，冒雨追歼逃敌。敌人处于兵败如山倒的极端混乱的情况下，狼奔豕突。我军则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猛追穷寇，痛扫逃敌。当时，敌人唯一希望寄托其空军轰炸，阻止我军，掩护其陆军退却。连日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我追击部队，但我军在广阔山区，利用有利地形，分路前进，积极加强防空措施。敌机虽然频繁出动轰炸，但无济于事，根本无法阻挡我军奋勇前进。

四月三十日中午，兵团指挥所由宣城进至广德县城附近时，突然发现敌机数架，临空轰炸，我们迅速利用地形，疏散隐

蔽。敌机反复俯冲轰炸扫射达半小时之久，炸弹的呼啸声，机枪的扫射声，在我们身边呼呼作响；爆炸引起的熊熊大火，使四周浓烟滚滚，当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在敌机轰炸结束逃遁之后，我们却无一损失。队伍继续加速前进。

午后，兵团指挥所进到广德县城。广德是安徽与江苏、浙江三省交界的一个中小城市，是通向杭州交通要点。二十四军军部已于二十九日进驻广德城。我们进入广德城，碰见了二十四军王必成军长、皮定钧副军长，他们是在前线打了胜仗的将军，情绪高昂，精神抖擞。皮定钧同志讲话素来很有风趣，一见面就说：这次我们同国民党军队赛跑，他们脚底板擦油，屁股冒烟，我们是“十一号汽车”，一路走来我们总是跑在他们前头，我们占了广德，把几万国民党军队插断在广德以北。事后了解，四月二十九日在广德以北砖桥、独山一带，九、十兵团歼灭了逃敌四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六十六军等八个军残部。王必成军长对我说：我们已接到野司命令，部队全部调到南京，担任南京警备任务，明天即动身北去了。我说，以后到南京总统府再见吧！王必成、皮定钧同志同我去见了谭震林、王建安、谭启龙、姬鹏飞诸首长，他们简要汇报了二十四军部队突破长江后作战情况，兵团首长给予鼓励，并要求他们进驻南京更好地完成警备任务。

三十日傍晚，兵团指挥所进入浙江省境内，进驻长兴县城。长兴是浙江、江苏、安徽三省邻近太湖南岸的一个县。当时忙于查明杭州、吴兴（湖州）一带敌情，了解浙江省蒋军动态，获悉杭州敌人有沿浙赣线南逃之征候。兵团首长研究决定，各部队立即向浙江进军，兵团指挥所经湖州向杭州进发。五月一日，兵团部进至湖州。湖州是渡江的东集团、中集团原定合围敌人的封闭

口。因此，从江阴以西突破长江的二十三军先头部队已进到湖州。当兵团指挥所五月一日晚进至湖州时，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已率军指挥所进至湖州。当时，野司已有命令，决定二十三军调归七兵团指挥，担任解放浙江的任务。因此，谭震林、王建安等首长会见了二十三军首长，决定二十三军立即向杭州进军。原定二十一军进驻杭州，改向杭州以南肖山前进。二十二军进至杭州以北地区担任兵团预备队。根据兵团首长决心，我们下达了命令，并报告了野司。随后，兵团指挥所立即起程，从湖州向武康前进！

五月二日，兵团指挥所进至武康。为了进一步了解杭州市的情况，我们利用原长途电话同杭州通了话。根据杭州市总机报告，杭州国民党军队已全部南逃，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了杭州市区。以后查明二十一军先头部队于五月二日十五时半进入了杭州市。并获悉敌人由杭州南逃时，企图阻止我军南进，迟滞时间，派了工兵部队阴谋炸毁钱塘江桥。由于我先头部队行动神速，突然进入杭州，加上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坚决打击敌人炸桥行动，使敌恐慌万状，匆匆放了一包炸药后便仓惶南逃，因此钱塘江大桥仅仅桥面略有损坏，稍加修理，即可通车，无损南北交通。兵团首长指示，要二十一军先头部队立即控制钱塘江大桥，加强警卫，确保南北交通安全。

(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全部解放了。

五月三日午，兵团首长在武康究研决定，三日夜兵团指挥部

进入杭州、接管杭州。谭震林政委要求所有部队在入城前要列队宣读《入城守则》。兵团部的全体指战员于五月三日黄昏在武康广场整队听了《入城守则》宣读后，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浩浩荡荡沿着宁杭公路向杭州前进。当队伍进至杭州城数里外时，大家看着灯火辉煌的杭州城，边走边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天终于要进杭州了。队伍加快步伐，车辆也加速了，我们沿着西湖堤进驻湖滨饭店。当时，眺望全城，灯光映照着西湖湖面，绚丽夺目。

当晚二十三时许，兵团召开了各军首长会议。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先后到达兵团部。会上研究了解放浙江的计划，明确了各军的任务。决定二十三军进驻杭州市，负责城市警备治安工作。谭政委说：目前杭州市一切工作，均由二十三军出面，待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干部到达后，正式宣布军管会成立，再接管杭州工作。王建安司令员对解放浙东、浙南地区向各军交待了任务，他说：二十一军准备向浙南进军，解放温州，并准备收复浙南各县城与沿海各岛屿；二十二军准备向浙东进军，解放宁波，并准备收复浙东各县城与沿海各岛屿。各军首长受命后，都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

浙南、浙东是我党的老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浙南游击根据地在粟裕、刘英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抗日战争开始时，浙南游击队由粟裕同志率领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的一部。留下的干部仍继续组织武装，在浙南、闽北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浙东、浙西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

亡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皖南事变”后，浙东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成立了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浙东纵队北撤，浙东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保存组织、保存干部、保存武装的胜利。当我大军渡过长江，向浙江进军的时候，浙南、浙东的人民武装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向蒋军出击，配合主力解放浙江全省。二十一军进军浙南中，浙南党与地方武装积极行动，于五月七日解放了温州市及浙南全部城镇。二十二军进军浙东，在地方党与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于五月二十四日解放了宁波市及浙东全部城镇，并投入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五月十九日，七兵团正式宣布兼任浙江省军区，负责全省的军事斗争。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浙江省各野战军的主力，在解放了浙江全省后，立即投入了清剿土匪的斗争，加强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发动群众建设民主政权。从此，浙江成为人民的浙江了。

当我回忆起渡江作战、解放杭州及浙江全省的情景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尤其是当年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热情支持、爱护，使人永远难忘。列宁讲过：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实现。突破长江，进军杭州的征程，完全证明列宁讲得无比正确。

（一九八一年二月）

一枪未发 两战两捷

——湘鄂西苏区战斗生活片断

陈 阳 春

时间虽然已过去将近五十年了，可是每当我回忆起湘鄂西苏区艰难的战斗生活，那些难忘的战斗，首长和战友们笑脸总是那样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

初 见 贺 龙 军 长

一九三二年夏季，湘鄂西苏区荆门县警卫营（实际上是该县的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高桥、新城一带钳制沙洋的敌人。任务完成后，我们撤回万里镇休整。

六月的一天下午，天际无云，地上的树叶禾苗一动也不动，没有一丝风，空气又湿又热，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由于战斗频繁，活动紧张，部队十分疲劳，都在村子的戏台上、树荫下、竹林里休息。

忽然，设在戏台后面大树上的哨兵报告：在三、四里路外的地

方，发现两个骑马的人，向我方而来。连长当即命令一个班迅速埋伏在村西小桥两边的高粱地里，并指示哨兵继续观察。

等两个骑马人跑近了，我们才看清原来是主力红军的两个传令兵（通信员）。他们对营长、政委敬了个礼，说：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请你们二位速去军部。营长靳家香、政委张大明带着我和政委的从兵（警卫员）骑着马，很快来到了军部。

进了前厅，穿过后堂，只见房子里许多人都在睡觉。我们刚出后门，军部从兵班的值班员便迎上来说，你两人就在这里休息等候，贺军长、关政委在谈公事。听说是贺龙军长，我们的心情顿时变得既紧张又激动，不由一齐向值班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离后门十几米远的竹园中，放了两张竹床，一张方桌，两条长板凳。有两人正在那里休息说话。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留有小八字胡的首长，我们立刻猜到他准是贺龙。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但关于他的种种神奇的传说，早就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营长和政委快步走了进去，给两位首长敬了礼，贺军长说：“你们来了，坐下。”说着，他递给每人一支卷烟，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营长说：“有二百四十二人，二百一十支枪，五十余匹马，编为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营部（十二人）。就是子弹太少，每人平均不到五发，洪湖造的子弹简直不能打。”贺军长说：“你们的人、枪、马，比我南昌暴动失败后，党派我回湘鄂西创建苏区的时候强得多。我这里没有子弹，你们要子弹去找敌人要！运输大队长（指蒋介石）不是送来了吗！”贺军长又说：“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苏区失败后，又调集了五十万大军，亲任‘剿共’总司令，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为了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他先以

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苏区进攻，尔后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敌人这次进攻湘鄂西的兵力约十万以上。为了钳制西线的敌人，决定你们去找荆（门）、当（阳）、远（安）游击队汇合，向荆门、沙市、宜昌一线活动，减轻敌人对我军的压力。但是荆、当、远游击队活动地区广阔，位置不固定，执行这一任务困难很多。你们人地两生。那边的大刀会到处都是，地主武装多，土围子、土碉堡各大村庄都有。因此，此去要特别谨慎小心，不要找不着他们，反而被敌人把你们吃掉了，贴本的买卖可做不得。要完成任务，就要很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们是游击队，不能同敌人硬打，拼消耗。”说完，贺军长转过头来，请关政委作指示。关政委说：“敌情、任务、注意的问题，军长说得很详细，我完全同意。我补充几句，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向全营指战员把情况讲清楚，特别要注意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注意三大纪律，做好群众工作，动员党、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行动要机动灵活，既要有勇，更要有谋，严密封锁消息。万一找不着他们，就快些回来。”

送上门的“运输队”

营长、政委回部队后，立即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详细传达了贺军长、关政委的指示，并具体规定了几条行军纪律。

经过短暂的准备，由万里镇出发，经过鲫鱼口、莫芒嘴、李家市、金山寺，在零时左右，通过了由沙市到沙洋的公路，这一夜我们走了一百一十多里。天快明时，部队在一条由东向西的小山梁上，找了几个小村庄宿营了。大家走了一夜，都很累，正准备休息，突然周围几十里路都响起了锣声，这是当地地主武装大刀

会互报情况的一种方法，意思是：红军来了。为了迷惑敌人，营长命令各连也派人赶紧敲锣，使敌人摸不清红军在哪里。这一招果然很灵，真的把敌人迷惑住了。

天刚一大明，一连哨兵就报告：前面（村西）约两里远的地方，发现有敌人骑兵向我前进。营长命令各连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并叮嘱说，不管来敌多少，一定不要先开枪。如果敌人少，最好是捉活的，这样既能了解敌情，又不致于暴露自己。不一会，敌人接近了，就只十几个骑兵。营长政委要活捉敌人的决心更坚决了。他们让营部的马兵（饲养员）王长发继续敲锣，引逗敌人。转眼功夫，这帮家伙便闯到了营部门口。一个敌人问老王：“你敲锣，共军在哪里，有多少？”老王说：“不知道！因为周围都在敲，我不敲行吗？我不敲不是通匪了。”

敌人气得骂道：“她妈的，真是活见鬼！就数你们这里敲得凶，害的老子们好苦，不等天明就出发，连饭都没有吃，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鬼都没有见一个。快下来给老子们开门，弄水喝，做饭吃。”老王赶快从梯子上下来，刚一开门，早已准备好的二连从院子里一齐冲出，夺枪的夺枪，拉马的拉马，解子弹带的解子弹带。这时，敌人才知道上了当，慌作一团，有的跪下作揖磕头，有的举起双手，只喊饶命。唯有那个站在最后的营副，他一看情况不妙，便想夺路逃跑。可是退路已被一连切断，山梁的北面是陡坡下不去，于是，他拨转马头想从南面山凹里逃走。谁知这里都是几尺高的田坎，又是秧田，下了几坎，马连蹦带跳，把他掀了下来，全身滚得活像刚从缸里捞出来的腌鸭蛋，武装带和大盖帽上，马鞭的里里外外，都是泥水。这场战斗仅用了几分钟。我们共俘虏了十三人，缴获了五支驳壳枪，八支七九马枪，十三把马刀，十三匹马

(都是皮鞍), 驳壳枪子弹三百余发, 七九子弹四百余发, 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子, 上写道: 中国国民革命军×旅×团×营营部。这在游击队来说, 是个大的胜利, 大家都很高兴, 但马兵王长发却不像平时那样爱说爱笑, 爱打爱闹。有的战士问他, 打了胜仗为什么不高兴? 老王说: “你们骑马的缴到了马, 背枪的缴到了枪, 我敲锣都敲得胳膊酸痛, 只缴到一面破军旗有么事用。”营部的军需长插话说: “你莫看它现在没用, 这可是个纪念品, 保存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它咧。”没想到, 这话还真让他说着了, 没有多久, 这面破军旗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雨 夜 奔 袭

打了胜仗, 战士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可营里的干部却忙着开会, 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营长在会上对各连参加会议的干部说:

“刚才被消灭的这股敌人, 很可能是敌人一个营派出的侦察部队。现在, 敌人离我们就只二十多里路, 在它的侦察部队没有回去之前, 敌人暂时不会出来。但是, 时间长了, 敌人不见侦察部队回去, 肯定会出来找的。因此, 各连要抓紧时间休息, 并加强观察警戒。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天刚黑, 各连都迅速到营部驻地集合, 政委简单地讲了几句话, 部队又开始夜行军。谁知, 才走了二三十里地便碰上了敌人的一个团和一个营。敌强我弱, 欲攻不成, 加之地形不熟, 没有向导, 想绕路又绕不过去, 我们只好往回撤。

当部队连夜撤到李家市桥头附近时, 碰上了县委的交通员李银山。他说: “我知道你们飞不过这条河, 一定要经过这里, 快引我去见营长、政委。”他见了营长、政委, 从粪筐中抽出一个

小竹筒来，又把竹筒两头的粪掏掉，从竹筒里抽出一张纸条。交给政委。上面写道：你们部队不要回万里镇，待天将黑时到万里镇以西五里路的李家台隐蔽集结。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县委派人来布置具体任务。

部队回到李家台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县委早已派人等候在那里。县委军事部长说：“你们西去后，躲在新城的区团总张国栋带着他的保卫团又回到了张家大湾。他召集保、甲长开了会，要组织反水队，准备扩编他的保卫团。在向群众要粮、要枪捐、要开办费，准备占领万里镇。县委决定：在敌人没有组织好之前，先消灭它。”营长说：“好嘛，只要他不躲在新城，出来就好办。”

天黑后部队出发了，向张家大湾前进。本来万里镇到张家大湾只有五十多里路，但走出不到十里，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眨眼，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风吹得人站都站不稳，雨点打得脸生痛生痛。简单的雨具根本挡不住这样大的风雨，每个人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一拧就是一滩水。雨大，路窄，稍不小心，就会掉进秧田和水沟。大家手挽着手，一个拉着一个前进，四五里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马兵老王和伙夫老张因以前负过伤，手脚本来就不灵活，走这种路就更加困难了。营长让他俩人拉住马尾巴，他俩一边走，一边说：在主力部队时，只要碰上雨天，保险能打胜仗。这次下这样大的雨，说不定也能打胜。我们是贺龙的部队，水愈深龙的威力就愈大。说得周围的同志都笑了。他俩正说得起劲，前面传来了命令：暂停前进。原来前面就是张家大湾了，大家摩拳擦掌，可是摸进去却扑了空。除抓住敌团总书记和一个团丁外，其余的敌人都不知去向。奇怪，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一审问，才知道敌人昨晚也乘雨夜去袭击万里镇

了。他们走的是东面的大道，而我们走的是西面的小路，虽然两条路相隔不过五里，但因风雨太大，双方竟谁也没有发现谁。

将 计 就 计

奔袭扑空后，营长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开会，有的建议杀它个回马枪，有的说就地埋伏，等着敌人回来收拾它；有的说最好在半路上截击敌人。营长仔细听取了各种意见后，提出“将计就计”，他说：昨晚去攻击万里镇的敌人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团丁三十四人，最近新组织的清乡队（反水队）有一百二十多人。团总张国栋去会饼头了，队伍由他的堂弟队长张国梁带去的，队伍在新城集合时，张国栋为了给他的手下壮胆，编造说：驻扎在沙洋的国军已答应派一个营协助“剿灭”万里镇一带的共军。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冒充国军，智歼敌人哩。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个办法好。这时，军需长高兴地喊道：“哎，对了，马兵老王不是还有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的破旗吗？这次可派上用场啦。”营部书记也兴奋地说：“今晚抄了敌人的老窝，团总部的关防、印章、印有番号的信纸、信封，团总张国栋的大印都在我们手里。”于是，营长和政委让营部书记立即以张国栋的口气起草一份命令。书记思索了一下便提笔写道：

奉沙洋守备司令杨旅长指令：命令贵旅二团三营协助我团剿灭万里镇、太和场、鲫鱼口一带共军，在围剿期间，本团所属团队和清乡队均归李营长统一指挥，不得有误。等因奉此，仰照执行。

团总张国栋

中华民国×年×月×日

伪造命令写好后，营长和政委又看了一遍，然后叫敌团总书记用印有团总部字样的信纸誊抄了一份。假命令伪造好后，营长又对明天的行动作了具体的部署：“一连仍做前卫，一定要化装得像个样子，敌军服装不够，由各连支援。行军时各连都不要打红旗，把马刀、驳壳枪上的红绸子、红布、红丝带都取下来。骑兵连长化装敌人的营副。注意，一定要把那双带马刺的皮靴穿上，还有武装带，上尉军衔的胸章也别忘了，另外，还要带点缴获的名片。”骑兵连长一听，说：“我这一打扮成了什么人了？”营长讲：“像个敌人，这是任务的需要，愈象愈好。”接着营长又向他详细交代了行动细节。

第三天，天刚明，部队就集合完毕。政委作了简短的动员，他说：这股敌人，同我们斗了两年了，为什么没有消灭它呢？一是它长期钻在新城不出来，二是有国民党军队保护它，另外这股敌人也很狡猾，偶尔出来活动一下，一到天黑他们就躲到船上，把船划到汉江中间去过夜。这次敌人送货上门，我们一定不能放过它。接着政委还对党团员提了具体要求。政委讲完后，部队便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大模大样地向万里镇出发了。

智 开 顽 敌

我们沿着大路行进，走到离万里镇八里地远的一个村庄附近时，一连尖兵班报告：“前面发现敌人，打的红旗。”营长命令号兵吹问答号。可是保卫团没有号兵，不能答号。营长告诉尖兵，要他们派一个人过来联络。敌人看到我们打的是青天白日旗子，很快就派了一个人来。一连连长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来说：是保卫团的。一连连长故意威胁他说：“你们不是保卫团！是红军伪装的

吧？不然，你们为什么打红旗呢？”来人一听这话，连忙否定说：

“长官，别，别误会，我们是保卫团。队长说打红旗是为了欺骗红军和民众。”没想到敌人也搞了这一手，可惜他们装得太不象了，被我们一眼就识破了。

一连连长问清了情况，知道眼前的队伍真的是保卫团和反水队的人，而且情况和昨晚俘虏供的完全一致。于是向营长、政委作了汇报。营长命令化装的传令兵快把命令送过去，并让化装的营副带着从兵，赶到敌人队长的跟前，递给了敌队长一张名片，告诉他，快把队伍集合起来，营长要训话。这时一连已进到敌人跟前，营副命令一连在大路上原地休息。敌人虽然很狡猾，但这次却被我们蒙住了。他们按照骑兵连长的命令很快集合好了。在敌人集合时我们的二、三连和骑兵连已隐蔽地对敌人形成了包围。这群乌合之众简直是一群土匪，有的左肩挂着枪，右肩挂个大包袱（抢的衣服）；有的是右肩挂枪，左肩上扛着粮食；有的大背着枪，两边肩上都扛的是东西；有的干脆用枪挑着鸡、鸭、被褥和其他东西。保卫团后面的反水队，更是乌七八糟的了，有的顶着大锅，有的用洗衣盆抬着碗筷，抬着母猪，抱着猪崽、小鸡，挑着水桶、马桶。真是除了大粪，无所不抢。

敌人队伍站好了，营长带着从兵、传令兵、军需长等七、八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营长今天穿着一身灰色斜纹布制服，戴着钉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大盖帽，挂着武装带，斜背着手枪，穿着一双浅腰黑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镜，真有点象个国民党营长的样子。敌人队长一见营长驾到，赶快喊了声立正口令，快步跑到离营长三步远的地方向营长敬了礼。并报告了保卫团和清乡队（反水队）的人数、武器等数目，最后他恭恭敬敬地说：“请营长训话。”营长

大大咧咧地还了个礼，迈着四方步走到队伍跟前，先命令士兵们把枪架好，退后三步坐下。然后便神气十足地训起了话：“弟兄们辛苦了。由于你们张队长指挥有方，弟兄们英勇善战，抄了共军的老窠，夺了头功，本营长回去后一定给你们报功领赏。但你们这次行动，有违蒋总裁的‘围剿’方略，有损国军声誉。总裁对共军和共区采取的方针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以瓦解敌军，争取民心。可是你们杀人、放火、抢劫老百姓的财物，这样能取得剿共的胜利吗？嗯？！事情都叫你们给办坏了。本营长坚决执行总裁的指令，对有损国军声誉，违背军纪军令的行为绝不宽恕，一定要按军法从事。”讲到这，营长一挥手，上去了两个从兵和一个传令兵，将敌人队长五花大绑起来，推去砍了。营长还在继续骂，而且越骂劲越大，越骂火越大，吓得那些团丁和反水队员想动不敢动，想跑不能跑，全身骨头都软了。最后，营长命令一连将他们的枪收了。这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二、三连和骑兵连从四面八方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大一会儿一百多个敌人都被解决了。

这一仗，我们没费一弹，又歼敌一百五十七人，缴步枪三十三支，子弹五百余发，粮食七百余斤，衣服八十余件，此外还有刀、矛、鸟枪、鱼钗、猪、鸭、鸡等等东西。一条与我们斗争两年多的毒蛇终于被彻底消灭了。

战斗胜利结束了，营长命令各连打出红旗，火速回万里镇救火。虽然部队三天三夜连续行军四百余里，大家都有点疲劳了，但是一想到贺军长和关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不由得都加快了脚步。

（一九八一年六月）

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编成情况（上）

李国祥 张国琦 殷纯俊编写

这份资料包括中央军委、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游击队等五部分。八路军部分还附有山西新军的编成情况。这份资料整理好以后，曾请在京的部分老同志初步审阅过，提出了许多补充修改意见。但由于我们资料有限，水平有限，又加战争时期军队建制和人员变化频繁，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史学工作者指正。

中央军委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党的洛川会议上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张闻天、徐向前、叶剑英等十一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十月间，新四军的领导机关组成，中共中央决定在新四军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

项英为分会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华北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滕代远、陆定一等六同志为华北军委分会委员，以朱德为主席，彭德怀为副主席。一九三八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中共中央决定他“担任军委工作”，为军委副主席。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军委直属各部也加强了建设。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病去苏联，以任弼时主任，傅钟为副主任。十月十六日，中央军委通告全军各级政治部，“所有八路军和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统一领导之。”政治部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对各部之指示，仍通过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主任未回军委以前由毛泽东代其职。”总政治部机关组成是：秘书长王若飞；组织部，部长方强，副部长胡耀邦（后为部长）；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统战部，部长王若飞兼；敌工部，部长李楚离，政委王学文；编译局，局长曾涌泉。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为统一对外名义，决定“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主任任弼时，副主任傅钟、谭政。”但重申，“前后方及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并调原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为后方政治部主任（前任为谭政）。后方政治部下设组织部，部长吴××；宣传部，部长李兆炳（前任为张际春）；联络部，部长徐彬如；敌工部，部长马玉章；保卫部，部长丁荣昌；军法处，处长莫文骅

兼；总务处，处长熊友刚。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鉴于王稼祥已病愈返国，决定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因公外出，以王稼祥兼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以傅钟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随总部行动，谭政仍为副主任。新成立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其主任一职，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由罗瑞卿接任，傅钟随后到总政治部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经中央决定，傅钟为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总政治部于一九三八年底组成了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总政党务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项英、谭政、方强、陈毅、傅钟、滕代远、袁国平、聂荣臻、舒同、罗瑞卿、张际春、莫文骅、肖劲光、罗荣桓、关向应、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黎玉、林彪、贺龙、刘伯承、张鼎丞、王稼祥等二十六位同志组成，以王稼祥为主席，谭政、方强为副主席，暂以在延安者为常委。十二月十八日，总政治部将党务委员会的名单通告八路军、新四军各所属部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滕代远任参谋长。军委下设一局，局长郭天民（前身为钟赤兵，后任为郭化若）；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铮，副局长朱道松；四局，局长黄春甫（即江华）。一九四一年，奉命与周恩来一起搞统战工作的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二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叶剑英现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驻延安办公。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的后勤机关组成是：供给部，部长张元春，副部长邱会作；卫生部，代理部长孙毅之，政委易受湘，副部长饶正锡；副官处，处长徐服。一九三九年冬，中央军委为了

统一后方勤务工作，决定成立军委后方勤务部，任命叶季壮为部长，杨立三为副部长。

中央军委十分注意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早在一九三七年初，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把“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战初期，抗大校长是林彪，教育长为罗瑞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副主任。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央任命罗瑞卿为抗大副校长，刘亚楼为教育长，许光达为训练部长。二月二十八日，又任命张际春为抗大政治部主任。总校设在延安。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抗大总校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移至晋察冀军区。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因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命令滕代远为抗大副校长，后为代校长。一九四三年三月，徐向前任抗大代校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又任命阎揆要为抗大教育长。为减少西北地区的财政负担，更多地培养人材，使学员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党中央决定，各战略区设立抗大分校。一九三九年初，在晋东南建立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一分校二校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校长阎揆要，副校长昌炳桂），抗大二分校设在晋察冀根据地，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以后又相继在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根据地建立了分校。抗大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的干部战士为主，兼收爱国知识青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为培养具有理论基础能充任师、旅等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材，总政治部决定开办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张际春，副院长肖向荣。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决定调张如心主持军政学院的工作。此外，

还创办了航空学校（校长王璧），摩托学校（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任命胡汉标为副校长）。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为了加强对高级军事干部的训练，决定将军政学院之四区队与抗大三分校合组为军事学院，朱德为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陈伯钧为副教育长。同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以朱德、叶剑英、肖劲光、谭政、许光达、郭化若、叶季壮、王斌、平诚等九同志组成，由朱德负责领导，切实整顿军委所属各学校。抗战八年间，抗大等学校共培养了二十多万革命干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八 路 军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发表宣言，决定“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总指挥部改称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原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日，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通电宣布就职，决心“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九月六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诸同志率领从三原县云阳出发东进，所属各师同时东渡黄河，向华北抗日前线进军。九月十二日，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后仍习

惯称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当时，八路军指挥机关的组成是：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参谋处，处长彭雪枫（后为阎揆要），副处长边章伍，下辖作战科长黄鹤显，情报科长毕占云，通信科长刘鹏，机要科长黄友风；副官处，处长唐延杰，副处长余忠良；炮兵主任武亭；政治处主任李文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设宣传教育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黄镇；组织部，部长谭辅仁；敌工部，部长蔡乾；保卫部，部长杨奇清；地方工作部，部长傅钟。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谢今古（后改名黄达）；兵站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姬鹏飞。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政委张平凯。特务团，团长朱水秋，政委邱创成。

抗战期间，八路军指挥机关负责人几经变化。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二月二十八日，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主任任弼时，副主任傅钟、谭政。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中央和军委发布通知：王稼祥从苏联回国，继续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在前方成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随总部行动，傅钟为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任命罗瑞卿为野战政治部主任，接替傅钟职务；任命王若飞为八路军副参谋长，驻军委办事。后又任命陆定一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鉴于叶剑英已回延安，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仍兼八路军参谋长，驻延安办公，王若飞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在战斗中牺牲。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任命滕代

远为八路军总部参谋长。

一九四二年秋，十八集团军总直机关的编成是：参谋长滕代远。司令部，秘书长韩进；机要科长段连绍，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王政柱，二科科长魏国运，三科科长吴子云，四科科长朱早观；情报处，处长滕代远兼，第一科科长林一，二科科长钱江，三科科长项本立。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下设组织部，部长周桓；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兼，副部长王东明；敌工部，副部长漆克昌；秘书处，处长陈志斌。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下辖供给部，部长周玉成，政委周文龙；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军工部，部长刘鼎，副部长刘鹏；银行，行长兼政委高捷成，副行长熊光炳；特务团，团长欧致富，政委×开胜。

一九四二年，野战政治部成立党务委员会，以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周桓、滕代远、杨立三六同志为野战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委员，罗瑞卿为书记。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中央军委任命杨立三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仍兼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为后勤部副部长兼野战供给部政委，张际春为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四三年三月和九月，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先后离开集总前往延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为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及陕北留守处共四万二千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三个师分别以晋东北之五台山、晋东太行山、晋西的吕梁山以及晋南太岳山一带为活动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壮大抗日武装。十月二十三日，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奉命率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十一月七日，建立了抗日战

争时期的第一个军区——晋察冀军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此后，又创建了晋绥（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冀鲁豫、鲁西、湖西）、山东（鲁中、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军区。到抗日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兼任山东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在八年抗战中，各师扩大了编制，又一度组建了第一至第五纵队以及冀察热挺进军等，总兵力由改编时的四万二千人发展到九十余万人。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同我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和武装了广大群众，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创建了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对敌作战十万余次，毙伤俘敌约一百三十七万人，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五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奉红军总部命令，开至陕西三原泾阳一带，待命改编。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原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全师共编两旅一个独立团数个直属营，一万五千五百人。以红一军团之一、二、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辖六八五、六八六团；红十五军团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改编为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团；红七十四师编

为师直属独立团、骑兵营、辎重营、炮兵营等。九月十六日，集总任命陈光为三四三旅旅长，周建屏为副旅长；徐海东为三四四旅旅长；任命杨得志为六八五团团长，李天佑为六八六团团长，张绍东为六八七团团长，陈锦秀为六八八团团长，杨成武为直属独立团团团长。

一一五师主官任职的变化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集总根据中央的决定，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宣布以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委。十一月七日，中央决定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师政委一职改由罗荣桓担任。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林彪在隰县受伤。三月二日，中央军委电令林彪去延安医伤，其师长一职由罗荣桓兼代。五月，由副师长陈光代师长，罗荣桓任政委兼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黄励为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一九三九年春，王秉璋任师参谋长。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肖华为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八月，为实行对山东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一一五师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工作。同年十一月，一一五师党务委员会成立，以陈光、罗荣桓、肖华、陈士榘、杨勇、苏振华、符竹庭、朱涤新、吴文玉、邝任农等十人为委员，罗为书记，肖为副书记。一九四一年二月，师军政委员会成立。二月十日，中央军委批准陈光、罗荣桓、肖华、陈士榘、梁必业等五人为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央和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指挥，将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以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等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央将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任

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黎玉任军区政治委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江华为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兼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肖华为政治部主任。

一一五师所属部队编制情况演变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师政委聂荣臻奉命率一一五师一部近二千人留于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军区。一九三八年初，第三四三旅由肖华任政委，李天佑为副旅长，陈士榘为参谋长；所属之六八五、六八六团分别由吴文玉、杨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独立团，团长邓克明，副团长杨忠；后又成立补充团，团长彭雄，政委王麓水。第三四四旅在冀西平山地区奉命扩编为三个团的建制，即新建立了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该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副旅长杨得志，参谋长卢绍武。

一九三八年初，一一五师组建第五支队，由六八五团第二营扩编而成，支队长曾国华。五月，第五支队奉命挺进乐陵地区，与孙继先率领的津浦支队和本地党组建的津浦支队（第六支队）一起开展游击战争。九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该旅机关一部前往加强领导，组成了以肖华为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杨清远、李启华等四同志为委员的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十月，将冀鲁边的三个支队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集总任命肖华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符竹庭为政治部主任，邓克明为参谋长。

为了迅速发展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提出“派兵去山东”，中央军委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命令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进入山东、淮北的新老黄河之间（包括津浦铁路

东、西，胶济铁路南、北的广大地区)。十二月二十七日，师之先头部队第六八五团，进入苏鲁豫地区(后改称湖西地区)，与原来在该地区活动的挺进支队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十二月，师部率领六八六团从晋西出发向山东挺进。留下第三四三旅新建之补充团与晋西省委所属的三个游击大队合编成晋西独立支队，坚持吕梁山地区的斗争，支队长陈士榘，副支队长黄骅，政治委员林枫。

第三四四旅于一九三九年二月，由副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一个警卫排、一个工兵排、一个迫击炮排，在汤阴以南，通过平汉线东进冀鲁豫地区。三月初，统编冀鲁豫地区各部队为冀鲁豫支队。支队下辖四个大队：以第三四四旅独立团编为第一大队，以挺进纵队编为第二大队，以黄河支队编为第三大队，以游击第一支队等合编为第五大队。全支队约七一八〇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一一五师团以上主力部队活动地区是：

鲁西北地区组建鲁西军区，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并兼三四三旅政委，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下辖支队长彭雄、副支队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率领的黄河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率领的运河支队；何光宇率领的泰西支队。并统一指挥周贯五、陈兴、杨承德率领的津南支队；杨忠、龙书金率领的鲁北支队。为讨伐叛逆石友三兵团，奉军委、集总命令，组成了华北讨逆野战军，宋任穷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鲁西军区部队和冀中、冀南、冀鲁豫各一个纵队(约四个军的兵力)。

在鲁南地区活动的有支队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率领的鲁南支队，辖六八六团和由冀鲁边区转移来的第六支队第七团。六八

六团团由支队首长兼，副团长钟本才，副政委江拥辉。七团代理团长贺东生，政委覃士冕，有支队长张光中、副支队长吕世安、政委彭嘉庆等率领的苏鲁支队；有支队长梁兴初、政委王凤鸣率领的东进支队（由六八五团一部所发展编成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扩编组成），辖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杨廷兰、褚门峰分任大队长，江燮元、邱贤志任副大队长，李媛、邓龙翔任政委和代政委。

在鲁西南活动的有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率领的苏鲁豫支队，辖一、三大队，胡炳云、周长胜任大队长，庞文扬、冯志祥为政委。

一九四〇年十月，进入山东地区之一一五师主力和所属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至一九四〇年冬，先后编为七个教导旅，其组成是：在苏鲁豫皖地区之苏鲁豫支队编为教导第一旅，辖三个团，旅长彭明治，副旅长田维扬，政治委员朱涤新，政治部主任郭成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该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以在鲁南、滨海地区之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和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二旅，辖三个团，旅长曾国华，副旅长邢汝化、张仁初，政委符竹庭，政治部主任刘浩天、王麓水，参谋长何以祥；以在鲁西地区之运河支队和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二团编为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辖三个团又四个军分区，旅长杨勇，副旅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苏振华，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根据集总指示，教导三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划归八路军第二纵队建制）；以在湖西地区之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区），辖三个团又两个军分区，旅长邓克明，副旅长杨尚儒，政治委员张国华，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以在鲁南郟马地区之

东进支队编为教导第五旅，辖两个团，旅长梁兴初，副旅长吴世安，政治委员罗华生，主任刘兴元（一九四一年三月下旬，教五旅为增援华中新四军，挺进苏北，并编入新四军序列，改为新四军独立旅。一九四二年冬，该旅回山东归建）；以在冀鲁边之第六支队一部与鲁北支队合编为教导第六旅，辖三个团又两个军分区，旅长邢仁甫，副旅长龙书金，政治委员周贯五，政治部主任杨忠；以在鲁西南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支队编为教导第七旅，辖两个团，代旅长赵基梅，政治委员罗华生。根据集总指示，教七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划入八路军第二纵队。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央指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司令部合署办公。八月，将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旅的番号一律撤销。山东军区下辖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六个军区。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主任周赤萍，参谋处长胡奇才，下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平加；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赵杰，政委董炎；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委王一平。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张雨帆，副司令员王麓水，参谋处长贾耀祥，主任曾铭桃，下属两个军分区。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政委符竹庭，参谋处长何以祥，主任刘兴元，下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罗华生，政委谷牧。东北军一百一十一师，一九四四年九月改编为滨海支队，师长万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支队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副司令员吴克华，参谋处长蔡正国（后为贾若瑜），主任彭嘉庆；下属东海军分

区，司令员刘涌，政委仲曦东；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孙端夫，政委王一立；西海军分区，副司令员陈华堂，代政委吕明仁；南海军分区，司令员卜才，政委刘仲华。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景晓村，副司令员刘普愈，参谋处长袁义炳，主任徐彬舟，下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黄有，政委岳九保；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许云贵，政委李曼村；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政委王效禹；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信，政委张缉央；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及洲，政委何月池。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政委王卓如，参谋处长陆成道，主任刘贤权，下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委彭端林；第二军分区，政委曹旭庆；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冯鼎平，政委李广文。一九四四年春，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景晓村，副司令员龙书金，政治部主任周贯五。原一一五师所属的教导二旅、教导五旅、教导六旅与山东纵队所属的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第五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编为十三个主力团。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向敌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月十日、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国抗日部队连续发出七道反攻命令，迫令日伪投降。八月十一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了大反攻的任务以及整编部队等，山东军区将各军区的主力 and 基干部队迅速编成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滨海军区部队编成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及警备第十、十一旅；鲁中军区部队编成第三师（政委周赤萍，后任命曾国华为师长）、第四师（师长廖容标，政委王一平）及警备第一、二、三

旅，保留了原来的两个独立旅；胶东军区部队编成第五师（师长吴克华，政委彭嘉庆）、第六师（代师长聂凤智，政委李丙令）及警备第四、五旅；渤海军区部队编成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及警备第六、七旅；鲁南军区部队编成第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及警备第八、九旅。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军区在县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于八月中旬分为五路大军向敌发起进攻。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重要战略方针，从九月初开始，山东我军主力六万余人，干部四千多人，在罗荣桓率领下，分批由海路和陆路赶赴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留在山东的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

一二〇师

一九三七年八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陕北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全师共编两旅一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一万四千人。以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编为三五八旅，辖七一五、七一六两个团。红二军团四师改为七一五团，红二军团六师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七一六团。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编为三五九旅，辖第七一七、七一八等两个团。红六军团改为七一七团，红三十二军和红军总部特务团一个营合编为七一八团、教导团。以红二十七军军部警卫营

改编为师直属炮兵营、辎重营，以独立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为师直属特务营，以独立二师改为师直工兵营，以骑兵第一团改为师直骑兵营。九月十六日，八路军任命：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所属七一五团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团长宋时轮，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所属七一七团团团长刘转连，七一八团团团长文年生。各旅和团其他负责人是：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政治主任伍晋南。七一五团副团长顿星云，政训处主任黄延卿，七一六团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古，政训处主任伍云甫。三五九旅参谋长刘子奇。七一七团副团长陈宗尧，参谋长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刘理明，七一八团副团长贺庆积，参谋长帅荣，政训处主任罗志敏。教导团团团长彭绍辉，政委苏启胜。

在八年抗战中，一二〇师领导机关有许多变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关向应为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一月，肖克同志任冀察热挺进军司令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四月，为了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帮助整理训练冀中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集总指示，一二〇师出兵冀中。为了统一冀中军事指挥，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集总任命贺龙为冀中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吕正操为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统一冀中区工作。一九四〇年一月五日，中央电令贺关赴晋西北指挥。二月二日，中央批准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肖克、林枫、赵林、陈士榘、罗贵波、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等十三人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统一晋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十一月七日，晋西北军区成立，由一二〇师领导机关兼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司令员续范亭，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

任甘泗淇。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军委决定成立一二〇师后勤部，任命陈希云为部长，刘忠为副部长。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军委通告全军，为了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指挥，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关在休养，高岗为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军成立后，留守兵团与联防军司令部合并，加任肖劲光为副司令员。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由野战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防政副主任，由一二〇师主任甘泗淇兼任联防政第二副主任。根据中央决定，晋绥联防军职权是：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一九四二年十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一九四三年秋，吕正操率八路军第三纵队九个团由冀中到达晋西北地区，随后，吕正操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委，续范亭、周士第仍任副司令员。抗战结束前，成立了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一二〇师所属部队在抗战期间变化较大。一九三八年一月，一二〇师整编。以山西忻崞独立团改为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赖星云，政委彭德大；以河北平山独立团改为三五九旅新七一八团（原七一八团留陕，编为警备第八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奇；以山西崞县独立团改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政委陈文彬。五月下旬，宋时轮支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以七一六团第二营为基础组成宋时轮支队，又称雁北支队，宋时

轮任支队长)在河北省宛平县西部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六月，以七一五团为基础组成大青山支队，支队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一九四〇年二月，大青山支队改为骑兵支队，姚喆为支队长)。

为了巩固冀中，扩大部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二〇师主力从晋西北岚县出发奔赴河北中部。部队有所扩大，以七一五团和冀中独立第四支队合编为独立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下辖独一、二、三团和七一五团；以七一六团和冀中独立第五支队合编为独立二旅(三九年九月，改称张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旅长魏大光，政委王同安，副政委廖汉生，参谋长赵振国，下辖独四、五团和七一六团。一九三九年四月，留在晋西北地区的七一四团、警备第六团和晋西北游击队改编的独立第一、二团合编为彭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九四〇年初，贺龙率张三五八旅由晋察冀返回晋西北，扩大部队万余人。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二〇师主力在晋西北地区配合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二月下旬，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续范亭，政委罗贵波，参谋长张希钦，下辖暂一师、决死第二、四纵队、工卫旅。新军归一二〇师指挥。十一月七日，晋西北军区成立，下辖六个军分区，独立第二旅(四月由彭三五八旅所改)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张平化；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李井泉；独立第一旅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决死第二纵队兼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了军区直属军分

区，司令员陈漫远；五月成立了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政委胡全。

一九四二年三月，为了积蓄力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晋西北军区部队进行了精简，主力部队由近四万人减至三万五千人。十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主力减至二万五千人，并调整了军分区机关。新军总指挥部并入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第四军分区并入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第五军分区合编为塞北军分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以第三军分区一部组成第六军分区，代司令员孙超群，政委刘文珍。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成立联防军司令部，下辖一二〇师、晋西北新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十月，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

为了创建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把中原地区和广东东江地区联结起来，一九四四年十月，以三五九旅第一梯队为基础组建了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支队长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下辖五个大队，还有两个干部大队。第一大队由七一七团的两个营编成；第二大队由七一八团的三个营编成；第三大队由七一九团的一个营编成；第四大队由特务团之教导营编成；第五大队由四支队编成。中央机关及党校调赴新四军五师工作随南征兵团行动的干部编成六、七大队，共四千余人。七一七团一个营、七一九团两个营、特务团之特务营一部和旅直一部，共四千人，由副旅长苏进领导留守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的任务，并作为南征的第二梯队。十一月九日，部队奉命从延安南下，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鄂豫根据地之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三月下旬，南下支队攻占平江。四月

初，毛泽东同志电示，我军要将根据地建立在敌占区，并提出进至湘南郴县、宜章地区。为适应湘赣边斗争情况和便于开展敌后工作，经报请中央批准，南下支队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辖六个支队，并争取伪军左八的两个团三千余人、毕坊清的五个团五千余人起义，分编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二师。为了扩大华南解放区，五月十八日，军委令三五九旅第二梯队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员，张启龙为政委，晏福生为副政委。将延安警备第一旅之一部组成游击第三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雷经天为政委，共六千人。于六月初由延安出发，经晋绥、太岳渡河南下，后因形势变化，开赴东北。南下主力于八月二十四日，到达湘赣粤边的大余县附近。为了避免内战，南下部队于八月三十日开始北返，十月到达礼山地区，第二次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不久，奉命撤销救国军名义，恢复三五九旅番号。

一九四五年七月，晋绥军区组成三个二级军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辖第三、四、七、八军分区；雁门军区，司令员许光达，政委朱明，辖第二、五、六、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辖骑兵旅（旅长康建民，政委李佐玉）另两个团。同时成立晋绥野战军，辖三五八旅及独立一、二旅。三五八旅旅长黄新亭，政委余秋里；独立一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独立二旅旅长许光达，政委孙志远；九月，组成独立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

附：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由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组织的一支抗日武

装。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工卫旅、晋一师、政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和在牺盟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各地游击队、自卫队等革命武装。一般所说新军，主要是指决死队。

一九三六年，阎锡山被迫接受我党抗日的主张，与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九月十八日，由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山西旧军一触即溃，阎锡山不得不同意组织新军。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决死第一纵队的第一总队在太原成立，政委薄一波，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政治主任牛佩琮。一纵队下辖一、二、三团。一团，团长徐吉璋，政治主任周仲英；二团，团长贾毓芝，政治主任梁膺庸；三团，团长李成芳，政治主任王鹤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决死二总队成立。十一月，改编为二纵队，政委张文昂，纵队长陈庆华（旧军官），政治主任韩钧。下辖四、五、六团。四团，团长王英清，政治主任郝德青；五团，团长郭熙春，政治主任廖井丹；六团，团长张开基，政治主任高鲁言。一九三八年二月，相继成立了决死三、四纵队。决死三纵队，政委戎子和，纵队长陈光斗（旧军官），政治主任董天知。下辖七、八、九团。七团，团长王子玉，政治主任马适安；八团，团长白英杰，政治主任纪忠；九团，团长赵世铃，政治主任行建。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纵队长梁浩（旧军官），政治主任李力果。下辖十、十一、十二团。十团，团长朵珍，政治主任王玉波；十一团，团长刘武铭，政治主任刘玉衡；十二团，团长卢宪高，政治主任姚仲康。决死队成立后，开赴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又相继成立了政卫旅（旅长张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鲁言），工卫旅（旅长郭挺一，政治

部主任侯俊言)，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政治部主任李成林），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政委程国梁，政治部主任朱佩瑄），暂一师（由山西第二保安司令部所属的五个支队改编而成，师长续范亭，参谋长张希钦）。

一九三九年，阎锡山以六个军进攻我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为粉碎敌人进攻，便于统一指挥，晋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翌年一月，新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续范亭任总指挥，下辖决死第二纵队、决死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三月初，晋西北新军进行整编，续范亭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委，下辖十一个团（七个大团四个小团），一万二千余人。决死第一纵队清除了阎锡山的旧军官，由薄一波任纵队长兼政委，牛佩琮为副纵队长兼政治主任，严天民为参谋长。决死第三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三个多团外，其余也在我党掌握下，仍坚持太南斗争。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以便使武装建设、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正式成立了晋西北军区，暂一师、决死第二、四纵队、工卫旅都编在军区序列内。决死第一纵队编入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决死第三纵队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就已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

一二九师

一九三七年八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原红四方面军之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和陕北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及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陕西三原泾阳地区集中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四方面

军的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全师共编两旅一个教导团及五个营，一万三千多人。以红四军之第十、十二师编为三八五旅，十师改为七六九团，十二师改为七七〇团；以红三十一军之第九十一、九十三师改编为三八六旅，九十一师改为七七一团，九十三师改为七七二团；编余干部和西路军归队干部组成教导团；红二十九军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陕甘宁之一、二、四团改编为工兵营，红三十军改编为炮兵营，陕甘宁第三团之二、三连和关中警卫营合编为辎重营，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骑兵营。九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任命：三五八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所属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所属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各旅和团的其他负责人是：三八五旅参谋长耿飚，七六九团副团长汪乃贵，政训处主任丁先国；七七〇团，副团长曾广泰，政训处主任肖元礼。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七七一团，副团长韩东山，政训处主任黄振堂；七七二团，副团长谭德云，政训处主任谢富治。

在八年抗战中，一二九师的主官略有变化。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我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为政治委员。翌年一月五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邓小平接替张浩为政委。三月，宋任穷率部赴冀南地区，副主任一职由师政宣传部长刘志坚担任。六月三日，集总任命蔡树藩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李达接替倪志亮任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七月，副师长徐向前奉命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一九四〇年时，蔡树藩为政治部主任，黄镇为副

主任。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决定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黄镇、王树声六人组成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军委总政治部批准一二九师党务委员会由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黄镇、宋任穷、王新亭、张南生等七人组成，邓为书记，蔡为副书记。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二九师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

一二九师所属各部的情况变化较大。三七年十月十六日，为执行侧击西犯之敌，增援正太线作战任务，以教导团一部组成挺进纵队，由孙继先、胥光义率领挺进冀南。十月十八日，以秦基伟、赖际发率领教导团第五连及部分干部组成一二九师第一个游击支队——秦赖支队。十二月十二日，以七六九团一个连为基础组成了汪乃贵支队。此后，又以七七一团的一个步兵连及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织了赵（基梅）涂（锡道）支队。不久，又以谢家庆、张国传率领的教导团一部组织谢张大队。在师参谋长倪志亮的率领下，以这些游击支队为基础开始组建军区和分区的工作。三八年四月间，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对外称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由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由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在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的率领下，进至平汉路以东，开展冀南工作。二月八日，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地区。三月中旬，由师骑兵营扩充的骑兵团，在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下也到达南宫地区。后副师长徐向前和副主任刘志坚也率领四个团东进，打开了局面。四月间，以南宫为中

心建立了冀南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参谋长文建武，政治部主任王光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集总任命王宏坤为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辖五个军分区。

一二九师在战斗中不断充实扩大。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部改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段海洲，政委李聚奎。六月十二日，新的三八五旅成立，陈锡联为旅长，谢富治为政委。六月二十三日，民众抗日自卫军赵辉楼部改编为冀豫支队，赵辉楼为支队长。此外还扩充了特务团、补充团、新兵团，收编了许多地方抗日武装。七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一二九师的部队进行整编，共编为两个旅一东进纵队。第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参谋长卜盛光。下辖七六九团，团长孔庆德，政委黄振堂；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干，政委曾广泰；独立团，团长张贤约。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下辖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七七二团，团长易良品，政委肖永智；补充团，团长韩东山，政委丁先国。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兼，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第一团，团长陈启光，政委桂承志；第二团，团长郑炳银；以及津浦支队（孙继先），挺进队（冷赤哉），独立大队（刘振河），冀南游击大队（楚大明），冀南游击第二、第三支队（谢思荣、赖光普）。还有收编的地方武装青年游击纵队（段海洲），平汉游击支队（赵勤甫），冀豫游击一支队（赵辉楼），独立第一、二支队（徐绍恩、曹转太），冀鲁第一支队（李继孔），模范二支队（赵青芝）。此外，在路西有黎潞游击支队（赵基梅），独立游击支队（汪乃贵），正太游击一支队（秦基伟），津北游击支队（张国权），独立第四支队（纪德贵），道清支队（王卓如）和平汉支

队（李玉瀚）。主力部队由一九三七年十月进入晋东南根据地时的四千一百四十四人激增为二万三千五百余人，加上骑兵团、东进纵队、路西地方武装等，总人数在三万以上。

一九三九年初，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编为五旅、六旅、青纵、东纵、先纵等五个集团，分区作战。其中东进纵队，陈再道为司令员，刘志坚为政委，参谋长卜盛光，主任钟汉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由师独立旅与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合编为八路军青年抗日纵队，段海洲为司令员，徐深吉为副司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在冀鲁边活动的津浦支队与在冀南的青年纵队一部合编成先纵，李聚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一月，以十支队为基础，将原范筑先部第六、七、十六支队各一部，合编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由张维翰任司令员，袁仲贤为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〇年四月，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对一二九师实行整编。五、六月间整编工作开始，除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及原属二纵队之新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归一二九师建制未变外，新编了六个旅：以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旅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以东进纵队为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政委文建武；以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改编为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以冀南各分区部分基干武装改编为新九旅，桂干生任旅长（十一月二十三日，该旅番号撤销）；以边纵一、三团，保安六团及平汉纵队改编为新十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副旅长汪乃贵；以冀西游击队、边纵二团等部队改编为新十一旅，旅长尹先炳，政委黄振堂（一说郭锋），副旅长秦基伟。师特务团编为三十四团。同时，撤销了晋冀豫边

纵机构，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三八六旅兼太岳军区，冀南军区改以陈再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全师共辖九个正规旅，三十四个团，三个军区。

一九四一年以后，各旅又有新的变化。一月五日，新四旅由冀南出发南援新四军。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冀南军区以七十一团、二十团及骑兵团又组成新四旅，新十一旅编入太行军区，新十旅编入太行军区二分区。八月十一日，三八六旅及决死纵队另一部组成太岳纵队，以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集总命令，太岳纵队及太岳军区归一二九师建制。三十日，师令王新亭、聂真率南进支队进入中条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春，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为八个旅，即：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参谋长王智涛，主任卢仁灿；三八六旅，旅长王近山，政委聂真，参谋长周希汉，主任张祖谅；新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参谋长冯精华，主任何柱成；新四旅，旅长徐深吉，政委文建武，参谋长陈明义，主任袁鸿化；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政委钟汉华，参谋长雷绍康，主任刘诗松；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参谋长周光华，主任王幼平；决一旅，旅长李聚奎，政委顾大川，第二政委兼主任周仲英，参谋长李成芳；决二旅，旅长孙定国，政委马英，参谋长涂则生。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辖一至六分区，秦基伟、曾绍山、鲁瑞林、石志本、皮定钧、宋凤洲等任各分区司令员，高扬、赖若愚、王一伦、王孝慈、王维纲、朱穆之任各分区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一至六分区，分别以桂干生、吴成忠、高厚良、

杨宏明、赵义京、邹国厚为司令员，以刘志朝、王贵德、李定灼、×××、杨树根、夏祖盛为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由太岳纵队兼，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谢富治，副政委王新亭。辖一至四分区，分别以李聚奎、王近山、孙定国、唐天际为司令员，以顾大川、刘忠、刘聚奎、李哲人为政治委员。

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一二九师决定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此后各旅机关分别与分区合并，部队分别编为各军分区基干团。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一二九师与集总合并，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与一二九师分开，司令员李达，政委李雪峰，副政委兼主任黄镇；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黄敬，副政委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主任崔田民。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冀南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政委黄敬，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副政委兼主任苏振华，参谋长曹里怀。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玺，副司令员刘志远，副政委赵健民、潘复生，参谋长潘焱，主任王幼平；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李菁玉，副司令员王光华，副政委刘志坚（兼主任）、马国瑞，参谋长陈明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雪峰，副司令员黄新友、赵辉楼，副政委黄镇，参谋长何正文，主任袁子钦；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副司令员孙定国，副政委曹孟飞，参谋长邓仕俊，主任桂绍彬。不久，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

晋察冀军区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进至正太

路以南地区，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该师独立团、骑兵营及另两个连近二千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十一月七日，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不久孙毅为参谋长，唐任副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部队以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一师）为基干；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部队以总部特务团两个连为基干；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部队以骑兵营为基干；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部队以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一个连为基干。十二月十二日，部队进行整编，原第一军分区部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杨成武，副队长邓华，下辖第一、二、三大队；原第二军分区部队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赵尔陆，下辖第四、五、六大队；原第四军分区部队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陈漫远，副队长王明，下辖第七、八、九大队；原第三军分区部队编为第四支队，支队长周建屏（后为熊伯涛），副队长刘道生，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大队。部队发展很快，至一九三八年三月整编训练完毕，同时，将平西的国民抗日军调往阜平整训，并改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赵侗。以后又开辟了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对巩固与发展晋察冀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你们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集总为了使部队得到更快的发展，决定以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三月间，以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为主组成）合编为一个纵队，“深入热察冀区活动”。五月二十五日，宋支队由雁北到达平西的宛平县杜家庄与邓华支

队会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四月，由人民自卫军（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改编而成）与河北游击军（一九三八年夏，由驻徐水之伪军一个区队约二千人改编而成）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王平（后为程子华），副司令员孟庆山，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时，成立了冀中军区，军政首长由第三纵队首长兼任。下辖四个军分区，将各地游击队统编为七、八、九、十支队，独立第一支队，游击第一师，第五、十路等部队。

为了开展冀察热地区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集总指示，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基础上，成立了冀察热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武装斗争。部队进行改编，以邓华支队为十一支队，以宋时轮支队为十二支队，以及一个抗日联军。后来，以第十一支队和房（山）涞（水）涿（县）游击支队编为第七团，团长陈仿仁，政委李志远；以第十二支队和平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九团，团长黄文明，政委覃国翰；以抗日联军和平西游击支队一部编为第十团，代团长王亢，政委吴涛；以由冀东调至平西整训的部队编为第十二、十三团，十二团政委刘诚光，十三团团长沙森。

一九三九年二月，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整军计划。三月至九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训令，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整军。北岳区部队编为九个团，七个游击支队，两个特务营，连同军区直属的特务团、骑兵团、教导团、游击军等，共约四万六千人。冀中部队整编成十五个团，六个游击总（支）队，共约四万九千人。挺进军整编为六个团，连同游击队共约三万二千人。一九四〇年六月成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十

二月成立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段苏权；这两个分区同归挺进军指挥。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按军委指示，部队实行精兵简政，主力军逐步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晋察冀军区部队有如下变动：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北岳区部队一九四三年一月进行大整顿，辖四个军分区，约三万二千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发，副司令员高鹏，参谋长徐德操，主任王道邦；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参谋长赵冠英，主任汪之力；三分区，司令员黄永胜，政委王平，副司令员詹才芳，参谋长唐子安；四分区，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郑维山，副政委王宗槐，参谋长易耀彩，主任王紫峰。冀中部队下辖五个分区，一个警备旅，警备旅兼六分区，司令员王长江，政委旷伏兆，参谋长叶楚屏，主任龙福才；七分区，司令员于权申，政委吴西，参谋长刘玉章，主任甘春雷；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金城，主任张逊之；九分区，司令员王凤斋，政委吴立人，副司令员李弗畏，主任方国南；十分区，司令员周彪，政委帅荣，参谋长肖新槐，主任方国南。原挺进军番号取消，平西、平北、冀东各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平西为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寿发，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熊奎；平北为十二分区，司令员覃国翰，政委段苏权；冀东为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全军区兵力近十万人。

一九四三年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精简，总兵力减少至五万四千余人。八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对晋察冀分局及军政人员变动作了如下决定：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肖克、杜理卿、赵振声、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

后聂荣臻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由程子华同志代理书记。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肖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委（一九四二年八月程、刘任现职），聂荣臻在延安期间肖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委。为保卫党中央，晋察冀军区先后调出十二个团，于一九四三年秋和一九四四年春分两批由吕正操和邓华等率领开赴晋绥和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指示，因冀中形势好转，冀东部队也大大发展，同时军区直属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决定成立四个二级军区。九月至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冀晋、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军区，并以地区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新的野战部队。冀晋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委王平，副政委兼主任张连奎，参谋长张开荆。下辖四个分区，即二分区，司令员曾美，政委张连奎；三分区，司令员李湘，政委黄文明；四分区，司令员马龙，政委丁来夫；五分区，司令员陈仿仁，政委刘达。新编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团。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兼主任刘道生，参谋长易耀彩。下辖四个分区，即一分区，司令员肖应棠，政委杨士杰；十一分区，司令员肖文玖，政委杜存；十二分区，司令员熊奎，政委段苏权；十三分区，司令员何能彬，政委吴光。新编了四十四、四十五团。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林铁，副政委兼主任李志民，参谋长沙克。下辖五个分区，即六分区，司令员王先臣（王牺牲后由叶楚屏代），政委魏震；七分区，司令员于权申，政委张庆春；八分区，司令员贾士珍，政委周彪；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政委陈鹏；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委旷伏兆。新编了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团。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副司令员詹才芳，参谋长彭寿生，政治部主任李中权。下辖五个分区，即十四军分区，司令员何能彬，政委李子光；十五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政委傅西河；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王延春；十七军分区，司令员王耀南，政委王世煜；十八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委焦土（即焦若愚）。新编了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团。二级军区的建立，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及全面反攻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一九四五年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向敌发起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八月，响应党中央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城市的号召，夺取并占领了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为适应作战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扩编主力部队的指示，晋察冀军区迅速将所属各军区之主力团扩编为大团（下辖有营），将地区队、支队、区小队逐级升编成团（团直属连），新组建了五十九个团，连同原有部队共拥有一百个团。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晋察冀军区抗击和牵制了日寇侵华的大量兵力，对敌作战三万二千余次，毙伤俘敌伪军三十五万一千余名，军队由抗战初期的不足二千人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在敌后开辟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任务。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留守处成立，随即组织留守部队。八月三十日，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〇师第七一八团，一二九师第七七〇团，红第七十四师，红第二十七军、独立第一、

第二两师，第三十军，第二十九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各师留守处，均由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指挥，各部经理、教育、卫生、人事等亦由该留守处负责。

九月六日，八路军总部率部东进。陕甘宁留守部队为适应战争形势，便利直接抗战的军事行动，指挥与扩大补给起见，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将部队改编：原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副团长李祥；原红二十九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原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三团，团长阎红颜，政委杜平；原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四团，团长陈先瑞，副团长刘国桢；原独立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原独立二师王兆相部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相；原陕甘宁一、二、四团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原陕甘宁三团及关中警卫营改编为酃甘独立营，营长陈国栋，政委刘永培。还有孔全甫、刘永源领导的骑兵营。七一八团（十二月，改为警备第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三八五旅之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干，政委肖元礼）均照旧不变。各警备团一律恢复营的建制及团的政治、供给、卫生各部门的组织与工作。留守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十月十二日，成立五县警备司令部，何长工为司令员，郭洪涛为政治委员，张际春为政治部主任，王观澜为动员委员会主任。成立两延河防司令部，陈奇涵为司令员，白志文为副司令员。年底，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决定边区各兵团部队统归留守处指挥，并任命：肖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指挥员，毕占云为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

(曹后为参谋长)，张元春为供给处长，邱会作为副处长。孙毅之为卫生处长，饶正锡为副处长，易受湘为副官处副处长。二月二十八日，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的任务是：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军委决定两延河防司令部下属六个河防区，即第一河防区，由黄罗斌负责；第二河防区，由贺晋年负责；第三河防区，由文年生负责；第四河防区，由阎红彦负责；第五河防区，由白志文负责；第六河防区，由陈先瑞负责。一九三九年七月，军委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并于十月与鄯甘独立营合编为特务团。八月八日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十月，三五九旅奉令返回边区，以加强抗日与自卫力量。十一月十九日，陈奇涵奉调军委任参谋部长，王震兼五县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一九四〇年底，留守兵团直辖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委耿飏；三五九旅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旅长兼政委王震；警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委阎红彦；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副司令员王世泰。共三万一千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留守兵团归联防军统一指挥，部队进行整编。此时，留守兵团下辖三八五旅、三五九旅、警备一旅（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编成）、警备三旅（由边区保安司令部警一、五团、保安第二团合编而成）、骑兵旅（由骑兵团、三五九旅骑兵大队合编而成）。为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迎接抗日战争全面反攻新形势的到来，一九四三年中央军委又调回三五八旅、独立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七分校。一九四四年四月，又从前方调来教导一

旅（一九四四年元月由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组成西进支队，八月改称教一旅，旅长杨得志，政委张仲良，副旅长赵承金，参谋长李英武，主任邱先通）和教导二旅（一九四四年二月，由晋察冀军区独立团和地方武装编成机动旅，八月改称教二旅，旅长黄永胜，政委邓华，参谋长陶汉章，主任袁升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三五九旅（欠一个团）由王震率领从延安开赴华南敌后，三八五旅之七七〇团亦随该旅南下。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骑兵旅奉命开赴绥远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与开辟解放区。六月，警一旅一部、独一旅、教一旅南下开辟新解放区，炮兵团、三五九旅一个团开赴东北。此时，留守兵团下辖三八五旅（下属四、五团），警三旅（下属警七、八、九团），警一旅（下属警三团、保安大队），新四旅（下属十六、二十五、七七一团），教一旅（下属第一、二、三团和回民支队），教二旅（下属第一、五、九、三十四团和骑兵团、独立团），共三万二千多人。

第一纵队（山东纵队）

毛泽东同志指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那里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告中央书记处，建议派徐向前、朱瑞两同志到山东地区，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肖华区（即肖华领导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作战活动的地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队。五月四日，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正式通知，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七月一日，徐向前、朱瑞率一部分干部到达鲁南沂水，同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八月一日，组成了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第一纵队下辖陈

光、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肖华率领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及一些游击部队。八月九日，山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张经武为委员，朱瑞兼书记。以军政委员会为统一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第一纵队属于山东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十月十三日，为指挥作战之合理，原八路军第一纵队司、政、供、卫机关与山东纵队司、政、供、卫机关合并。因山东纵队在山东有历史意义，故其名义不取消，只是徐、朱、张、黎等领导人合在一起办公，统一指挥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部队。

山东纵队是由山东地区的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遵照毛泽东同志“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山东党在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山东地区的一至八抗日游击支队和挺进、南进等支队合编成山东纵队，经中央军委任命，张经武为总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王建安为副总指挥，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一九三九年春，山东纵队按集总指示进行整军，整编后下辖六个支队和一南进支队及第四团。一支队，支队长马保三，政委张文通；二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委高克亭；三支队，支队长马耀南，政委景晓村；四支队，支队长廖容标，政委周赤萍；五支队，支队长高锦纯，政委宋澄；六支队，支队长刘海涛，政委张北华；南进支队以钟辉任队长兼政委；第四团团张光中，政委李乐平。一九四〇年九月，山纵先后编为五个旅、两个支队。第一、四支队各一部和山纵特务团改编为第一旅，旅长王建安兼，政委周赤萍；第

二、七、九支队编为第二旅，旅长孙继先，政委王叙坤；第三支队改为第三旅，旅长许世友，政委刘其人；第一、四支队另一部编为第四旅，旅长廖容标，政委汪洋；第五支队改为第五旅，旅长吴克华，政委高景纯。在鲁中沂蒙区之基干部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胡奇才，政委王子文；胶东军区基干部队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王彬，政委王文。一纵连同地方武装总计五万余人。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指挥。翌年一月二十日，军委又指示：“将山东纵队司政机关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八月一日，山东纵队正式改用山东军区名义，司令员罗荣桓，政委黎玉，副司令员王建安，主任江华。山东纵队机关大部组成鲁中军区，第一旅改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第二旅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第三旅改为清河军区，第四旅改为鲁中第一军分区，第五旅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指挥，第五支队改为胶东军区。

第二纵队（冀鲁豫军区）

为击退国民党军的反共逆流，进一步巩固太南根据地，集总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在太南地区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以集总副参谋长左权兼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杨得志为副司令员仍兼冀鲁豫支队司令员，韩振纪为参谋长。下辖三四四旅、新编第一旅（以六八八团和晋豫游击支队编成）、决死三纵队、独立游击支队、民军第四团等部。

冀鲁豫支队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成立的。早在二月十六日，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进入直南，将特务团、独立团（以六八八团两个连为骨干编成）、黄

河支队（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由河北民军二路第四支队一部与游击队编成）、冀鲁豫第五支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由曹县抗日自卫队与几支游击队合编而成）等部合编为冀鲁豫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到一九三九年底，支队由四千余人发展到七千余人。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第二纵队主力离开晋东南东进，三十日，到达冀鲁豫地区。四月底，二纵队和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成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黄克诚，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兼，政委崔田民。第二纵队下辖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委李雪山；新二旅（由冀鲁豫支队一、二、三大队合编而成），政委吴信泉；新三旅（由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与独立游击支队、豫北大队合编而成），旅长韩先楚，政委谭辅仁；民一旅（由民军四团、民军十三支队编成），旅长朱程，政委闻见志；南下支队（由冀中调来），司令员赵承金，政委谭冠三。冀鲁豫军区下辖第一、二、三三个军分区。

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二纵队主力由黄克诚率领南下支援新四军。六月，该旅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另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的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便于统一领导和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根据集总批准，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二纵仍兼军区机关，军区司令员崔田民，政委苏振华兼，下辖七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政委李冠元；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周桂生，政委刘显；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委王乐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政委石新安；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政委王凤梧；第六军分区，政委裴志

耕；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张耀汉，政委张应魁。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杨勇。下辖教三旅，代旅长王秉璋，政委曾思玉；教七旅（新二旅四团与新三旅合编），代旅长余克勤，政委赵基梅；南下支队，司令员赵承金，政委谭冠三。一九四二年初，冀鲁豫军区进行精兵简政。六月进行第二次精简，第二纵队番号取消，一切武装归冀鲁豫军区指挥。

第三纵队（冀中军区）

第三纵队是以河北游击军和原国民党东北军一部为基础扩编而成的。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派孟庆山到冀中举办军事训练班。在中共平汉线省委（后改为保属省委）的领导下，冀中安新、无极、藁县等地的抗日武装组成河北游击军，到年底，部队有独立一、二、三师和一至十二路武装部队，游击第一师，三个独立团，共约七万人，号称十万人。同年十月十四日，由吕正操率领的东北军五十三军三八八旅六九一团主力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到年底，部队已发展到三千人，分编成第一、二、三团和特务团。一团，团长赵承金；二团，团长于权申；三团，团长沙克。不久，两部抗日武装会合，在冀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军委指示，吕正操部可改编为一个纵队（如军）。四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等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后中央派程子华接任政委），副司令员孟庆山，孙毅任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冀中军区，纵队首长兼军区首长。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部队改编后曾发展为第七、八、九、十支队，独立第一支队，共二十一个团及一个回民支队。一分区（第七支队），司令

员赵承金；二分区（第八支队），司令员于权申；三分区（第九支队），司令员沙克；四分区（第十支队），司令员孟庆山兼；独一支，司令员朱占奎；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政委郭陆顺。第三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以后又组成第五军分区。改编河北游击军第五路高士一部为独立第一支队，约四千人（八月改称第四支队）；改编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柴恩波部为独立第二支队，约三千八百人；改编河北游击军第十路赵玉昆部为游击第三支队；改编联庄的武装为独立第十二、十三、十四等三个团，约七千人；改编华北人民自卫军二十七支队为三纵队独立第五支队。到十月，部队发展到六万多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为了巩固冀中部队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中央军委指示一二〇师一部出师冀中。贺、关到冀中后，吕部即归其指挥，建制系统仍属晋察冀军区。

一九三九年，部队经过两次整编，到年末，下辖六分区（由一分区改称，兼警备旅），下属一、二团；七分区（由二分区改称），下属十七、二十二团；八分区（由三分区改称），下属二十三、三十团；九分区（由四分区改称），下属十八、二十四团；十分区（由五分区改称），下属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团；七支队，下属十六、二十一团；还有回民支队、骑兵团。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已发展为有一定战斗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正规部队，除所属五个分区外，还有直属警备旅（旅长王长江，政委旷伏兆）、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政委谭冠三）、抗大第三团（团长刘忠）、骑兵团。一九四二年春，实行精兵简政，冀中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详见晋察冀军区）。一九四三年秋，吕正操率部到晋西北地区，第三纵队建制即撤销。

第四纵队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八路军一二〇师以第七一六团第二营组成支队，宋时轮任支队长，于二十九日出发，到敌后之大同西南，怀仁以西，朔县以北，平鲁以东，右玉东南地区进行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为了进一步开辟平西地区，取得向冀东发展的基地，即以晋察冀军区一支队三大队为主组成了邓华支队，挺进平西地区。当时，根据两个支队活动的情况，集总决定宋邓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五月二十五日，宋支队由雁北到达平西的宛平县杜家庄与邓支队会合，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苏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党以七人组织纵委，以邓为书记。改编后的第四纵队归聂荣臻司令员指挥。六月八日，为扩大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集总指示，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宋邓纵队）基础上，成立了冀察热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武装斗争。

此外，一九四〇年六月底，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新四军第六支队与八路军南下之三四四旅、新二旅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四、五、六旅及一个游击司令部。第三四四旅改为第四旅，第六支队三个直属团合编为第五旅，第六支队第一、第三总队合编为第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又以第二旅及四旅第七团、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组成了第五纵队。原四纵队在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

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是由原八路军新二旅及六八七团与新四军第六支队

四总队合编而成的。

新二旅原为冀鲁豫支队一部。一九四〇年编入八路军二纵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六八七团原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之一部，第四纵队成立时为第四旅第七团。一九四〇年秋，黄克诚同志率此两部进抵皖东北，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部）会合。

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原为我党掌握的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署的武装，一九三九年七月，张爱萍同志率少数干部进入皖东北，进一步加强了党在第六专署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三月，该部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这两支部队会合以后，随即组编了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主任邓逸凡。下辖三个支队九个团，总兵力约二万人，分别以彭明治、田守尧、张爱萍为支队司令员，朱涤新、吴信泉、韦国清为支队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该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